

玉环文史资料

姜东序



第四辑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玉环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浙江省玉环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八月

前 言

《玉环文史资料》第四辑，共收集了三十一篇文章，是一期综合性的史料，内容较丰富。为深化改革、开放、搞活玉环经济服务，从本辑开始，增辟了《工商史话》专栏。

今年是创建抗日时期玉环县党组织的领导人董仲升同志逝世十二周年，我们选载了舒林、服伺合写的《回忆父亲几件事》和《董仲升年谱》以及胡今虚写的《忆董仲升同志》三篇文章，他们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介绍董仲升同志的风范和品貌，以纪念他对党的事业与人民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本刊上辑载的《玉环县竞选国大代表经过》一文，曾介绍过毛光熙先生，他现在怎样？读者未免悬念。《毛光熙先生简介》一文介绍毛的过去和现在，以资参阅。

《王泉隆打钓店》作者是王泉隆的后裔，他在文中历述了祖辈们在一枚小小的钓鱼钩上下功夫，干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对当时的渔业生产起了较大的作用。《玉环近代航运简况》记述我县近代航运兴盛和衰退的情况，值得一读。

《说海塘》作者对玉环的古今海塘，接述得既内容丰富，又具体翔实。《捕鲨史话》叙述我县坎门渔民捕鲨的经过；《玉声社始末》记述玉环第一个京剧戏班的兴衰情况，这些史料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屿旧事》是国内著名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刘啸在患病期间写成的，文中忆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断，难

得与读者见面。女作家叶文玲在百忙中为本刊撰写了《漫谈故乡习俗》，他描述故乡月节，如数家珍，且文笔优美，内涵丰富，令人百读不厌。

《身世漫谈》和《小方言》是曹仲渊先生的遗著。《身世漫谈》是作者追忆在青少年时期求学、找工作的事；《小方言》全文近十万字（本辑选登一部份），内容涉及我县的地理地貌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对坎门的方言，论述精辟，颇有见地，为我县地方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玉环籍在外地的著名作家、教授、学者，他们都有较深的造诣，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本辑《乡音转载》栏目里，转载《刑法学家高铭暄》和郑祖武写的《墨香飘四海》两篇文章，介绍了玉环籍刑法学家高铭暄和画家叶尚青在法学和国画方面的成就。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转载这方面的文章。

自1986年创刊以来，承广大读者关心和支持，先后寄来了一百多封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进意见，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并予采纳、改进，在此谨表感谢，恕不一一作复了。

本辑在编纂过程中，承有关领导的重视关心，兄弟单位积极协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参加本辑编辑工作的有余必煜、朱仁巴、黄云鹤等同志，限于水平，定多疏误，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编者

《玉环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 人物春秋 ·

玉环厅同知陆玉书·····	金新寿 (1)
天香书院创始人王屏藩·····	林礼唐 (4)
回忆父亲几件事·····	舒林 服伺 (6)
董仲升年谱·····	舒林 服伺 (13)
忆董仲升同志·····	胡今虚 (19)
怀念叶克东同志·····	叶 亮 (25)
林菊人生平事略·····	张子训 (27)
毛光熙先生简介·····	毛礼联 张炳文 (31)

· 工商史话 ·

王泉隆打钩店·····	王思清 (32)
北监场的“盐廩”与“廩商”·····	郑招友 倪馥臣 季世铸 (38)
天富北监年考·····	郑招友 倪馥臣 季世铸 (41)
坎门三钱庄·····	郭辑中 肖善志 邱秉钧 (43)
元和酒坊·····	张炳文 陈遂雄 林礼唐 冯妙兴 泮昌顺 (48)
玉环近代航运简况·····	林兆佩 (50)

· 榴屿纵横 ·

说海塘·····	董诚安 (59)
----------	----------

捕盗史话·····	王克宏 (67)
“玉声社”始末·····	章奎元 (75)
“别动队”的来龙去脉·····	张仁坤 李 平 (82)
居士林旧记·····	叶兆先 (85)
玉环三青团组织史·····	朱仁昉 (88)
民国时期玉环县历任知事、县长·····	朱仁巴整理 (93)

· 往事漫忆 ·

陈屿旧事·····	刘 嵘 (96)
漫说故乡习俗·····	叶文玲 (99)
身世漫谈 (节录)·····	曹仲渊 (108)
玉师回忆·····	谢振泰 (117)

· 名胜古迹 ·

楚门八景·····	陈力平 (119)
济理寺·····	陈遂雄 林礼唐 冯妙兴 泮昌顺 (122)
灵山寺·····	王咏樵 (124)

· 玉环文苑 ·

小方言·····	曹仲渊 (125)
----------	-----------

· 乡音转载 ·

墨香飘四海——介绍玉环籍画家叶尚青·····	郑祖武 (142)
刑法学家高铭喧 ——摘自《浙江法学》1987年第五期·····	江 石 (145)

玉环厅同知陆玉书

金新寿

陆玉书，字簪田，江苏江宁府六合县人。清朝乾隆壬子科（1792年）举人。历任浙江富阳、钱塘（今杭州市区）知县。道光二年至七年（1822~1827年）前后两次任玉环厅同知，皆有政声。后升处州（今丽水市）知府。光绪六年（1880年）《玉环厅志》将其列为名宦。

陆玉书为人持廉，不苟取，制事以诚。篆治尚宽，不轻鞭撻，而驭胥吏独严。曾采访贞寡事实，得一零四人，为请旌于朝。择吉日设宴，令其妻执觞，以宾礼待诸妇。宴毕，鼓乐导归。

陆玉书诗才横溢。公余之暇，与文士唱和，或出城游览，随处留题，写有许多佳作。

《玉环厅志》记载了陆玉书的三十多首诗。其中有著名的“四叹”。《贫民叹》写的是玉环厅贫苦农民、盐民和渔民，诗云：“地僻民贫实可叹，蚩蚩贸贸且欣欢。长年作苦耕盐网，四季分尝暑湿寒。赤足坦行鹅卵石，饥肠饱啖薯丝干。竟无术致苍生富，惭愧身为父母官”。《舆夫叹》叹的是“前倭后俯胸摩膝，东转西旋背当肩。握手直无挥汗处，当风即是纳凉边”的轿夫。《渔船叹》叹的是“雾里帆樯云里棹，汗淋头面水淋腰。直将性命争鱼蟹，能耐饥寒度暮朝”的渔民。《灶

丁叹》叹的是“坑灰尽漉新潮水，灶火频添蔓草烟，盛暑祈寒都露处，茱檐破壁任风穿”的盐民。陆玉书还有不少描写玉环厅乡土风情的诗作。如“茅房密密瓦房稀，矮户低檐石壁围”、“男事耕耘妇织麻，此乡风俗谢纷华”、“山多地少海隅偏，尺寸山都辟作田”的玉环；“清晓城门扇扇开，贩鲜人趁海潮来。黄鱼白鲞同鱼虾，都把樵苏换得回”的厅城西青街；“百数人家茅瓦屋，一隅廛市蟹鱼棚。小山最喜亭台敞，镇日犹闻诵读声”的楚门；“泥坎终年储剩水，土堤随处占茅蓬。十里方圆无别业，摊灰烧卤日匆匆”的盐盘；“潮汛回旋山动荡，水云封锁月黄昏。闽樵越舶来多少，都为鱼盐习坎喧”的钓糟岙。陆玉书在离任前，分别为玉环同寅诸公、学中多士、众耆庶写了留别诗：“文武和衷欣共济，兵民杂处喜无争。瓜代匆匆惜分手，赠言交勉为苍生。”“我亦寒窗诵读人，斯文骨肉易相亲。明年桂子飞香日，伫看群英贡席珍。”“好将孝悌绵先泽，莫忘诗书启后贤。更有一言须记取，讼庭不到是神仙。”

陆玉书与玉环厅十四都蒲田（今属田马乡）岁贡生戴湘云有深交。戴湘云学问渊博，文诗典赡，性又慷慨好施，是嘉庆年间岁贡生。陆玉书每造庐相访，与戴湘云唱和终日。有一次访戴湘云不遇，陆玉书就以此为题作了两首诗，把自己和戴湘云比作晋代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和博学高洁的戴逵。诗云：“好山尽处一重山，安道还应住此间。老树婆娑清荫合，小亭轩厂白云环。此乡淳朴因人著，胜地高超待我攀。略似剡溪空返棹，爱而不见阻烟鬟。”诗中的“安道”，即戴逵，“剡溪”在今嵊县境内，即曹娥江上游。“剡溪空返棹”，指的是王徽之居会稽（今绍兴）时，雪夜泛舟剡溪，访戴逵，至其门而

返。人问其故，他说：“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耶！”

陆玉书不但是个诗人，而且是一个著名画家。他在《环山杂咏》诗中写道：“讼庭无事公门敞，写竹由他百姓看。”他工画兰竹，得之者珍如拱璧。他名列清朝《墨林今话》、《清画家诗史》、1934年版《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1981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这些辞书称他“工画兰竹，颇能自出新意”。陆玉书的亲笔竹画（见本辑封面插画——编者），画中题的诗是：“亭亭老干卓青霄，任是狂风不折腰。傲骨峻嶒刚节劲，千钧重山力能挑！”

天香书院创始人王屏藩

林礼唐

王屏藩（1750——1822），字元德，号慎庵。祖籍福建漳州，迁居楚门龙王村。出身农家，少时从师求学，屡次赴试，名落孙山。郁郁不得志，曾抛书十余年，从事田园。后又发愤攻读，常废寝食，年三十七考中秀才。乾隆五十一年（1786）公为桑梓造就人才，于龙王渡创办“龙津家塾”，居家授徒讲学，凡十五年之久。其间，楚门贫家子林芳，聪颖好学，趁师授课，每日倚窗旁听，皆能背诵。公惊异，遂亲临其家劝导入塾，不取脩脯，助以薪水。尔后，林芳乡试中举，春闱进士及第，科甲联登，人称“海角奇才”；王粲二十一岁举庠生，二十四岁补廪生，二十五岁考取岁贡，均赖公一手栽培。

为此，公声望大振，办学益炽。曾与莆田贡生戴全斌共商诸友好，力谋筹募资金，创建书院。其议深得众望，终于集腋成裘，购基于西青山，先建文昌阁，后设天香书院。营建期间，公年逾花甲，躬身督办，不辞辛劳。嘉庆十九年（1814）大厦落成，中有八间敞为讲堂，两横厢可为师生寝室及厨房。公亲自执鞭，求师者日众。春风化雨，桃李成荫。从而文风蔚起，英贤辈出，后跻有人。

同治二年（1863），贡生王正南承师启迪，续建天香书院前进屋舍一座。此后书院规模更具宏大，文房益加舒适。

道光二年（1822），公积劳而逝，享年七十三岁，一生执教三十七年，坐“龙津家塾”爱才育才；创建“天香书院”奠当年“玉海书完”（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改称）而今“楚门小学”之基石，距今一百七十四年，启迪后人，具有高瞻远瞩之卓见，教育者树人，师之尚道，悯贫助学，众师所莫及。《厅志》赞云：“设塾训徒，循循不倦，教之成名，乡里义之”。

所幸，公之裔孙王纲，赞助镇志编纂，搜笈奉献资料，并提供《王氏宗谱》参考，故悉其详，爰笔书之。

回忆父亲的几件事

舒林 服伺

时间过得真快，父亲董仲升离开人间已经十二年了，然而父亲的容貌与姿态，犹历历在目；遗憾的是：我们在地求学和工作的时间长，侍候在父亲身边的日子短，所以无法为父亲的一生，写出较全面的传略，只能就自己所接触所了解的几件事，作片断的回忆。

他从书本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父亲在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求学时，正碰上“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的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父亲不仅积极地参加这场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中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他开始阅读当时风靡全国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以后他又订购了《语丝》、《创造月刊》和《小说月报》等杂志和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解放前，我家几只旧衣橱和旧箱子里，甚至在床顶与阁楼里，都堆满了书。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直到解放前夕，在长达十多年的岁月中，经常接触这些书，所以对书刊的种类、名称、版本、封面的装帧图案，都有较清晰的记忆。

杂志约有数十种，大多是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如《语丝》、《奔流》、《莽原》等。其中以鲁迅编辑或参与撰稿的居多数，《语丝》几乎是齐全的；创造社编的是一本中英对照的十六开本的杂志，名称可能叫做《中国论坛》，（没有封面）内有一篇宋庆龄写的文章，谴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译著几乎是齐全的，连在全国只销售了二十一本的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家中就有一本，其余的可想而知了。还有其他作家翻译的世界文学作品。安徒生的童话，我不止看过一次，美国辛克莱的《石炭王》和《屠场》，由郭沫若以“易坎人”的笔名翻译，译笔流畅，少洋味而多中国味，我曾看了好多次。

还有不少社会科学的著作，有《资本论》的早期译本，有马克思的《贫困的哲学》与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前者是为批判后者而写的。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等。

到了三十年代，父亲的藏书中，增添了不少新书，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西行漫记》等。

总之，家中藏书的数量约有几千册之多，而且都是较为进步的书刊，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日子里，父亲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乐观，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抱任何幻想，其原因，和他从书本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有密切的关系。

他从教育着手为玉环培育人才

父亲从上海美专肄业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先在玉环，后到厦门、东南亚，后又回到玉环。在玉环任教时间最长。父

亲之所以长期在玉环从事教育工作，主要原因是深感玉环缺乏人才！

玉环在当时确实缺乏人才。全县没有一个中等学校，没有一所医院，后来办了一个县立医院，有几任院长（兼医生）都是外地人，连护士也是外地聘来的；文盲充斥，愚昧落后，生病求巫，天旱求神。父亲曾对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在南洋时，有同事对他说：“董仲升，你的名气真大，给你的信，只要写玉环董仲升，就可收到。”父亲回复他说：“不是我名气大，而是玉环缺乏人才！”

父亲不论在环山小学、玉环简师任教，或在民众教育馆工作，他都是既当教师，又当园丁。他传播文化科学知识，讲解民主革命道理，是个启蒙教师，又是个小心扶植幼苗的园丁。

他在民众教育馆工作时，除了创办一所具有大量新书的图书馆外，还开辟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阅览室，里面有大量由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出版的进步报刊。这些书刊，如春风化雨，滋润了玉环青年一代人的心田。

当时由民众教育馆编印的《新言》杂志，在玉环可能是开天辟地首创的刊物，父亲常给《新言》写文章，每当深夜我一觉醒来，仍见他的房间里亮着灯光。有一次，他高兴地说：《新言》已经远销到上海去了，如果出版的地点改在杭州或温州，读者可能会多一些，销路可能要好一些。

约在1936年上半年，他在民教馆内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招收一批失学失业的青少年免费学习，还供应讲义与书籍，他兼授国文和英文，也讲点时事课。这个补习班培养了不少进步青年，如杨炎宾（烈士）、陈增佳（烈士）、董南才等。

酷爱体育运动

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人吃过晚饭，在前面晒谷场上乘风凉，只见一个又高又大穿着西装的人向我们的方向走来，大家都在纳闷：这个外国人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及至走近时，三婶叫了起来：“这不是二伯！”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从小喜爱体育运动，在中学时，就是个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在南洋时，更是积极地参加各种球类运动。游泳是他喜爱的一个运动项目，他说自己在南洋时，常游到远离海岸直至有鳄鱼活动的危险区才游回来。在玉环工作时，夏季几乎每天下午都在操场边的那条小河里游泳。他还常和陈全斌、朱瑞元等人对打网球，打上个把小时不觉得疲劳。

在任民教馆馆长时，他开辟了篮球场、网球场，还有浪木、千秋、单杠等。在他的带动下，环山小学很多学生和县城的一些青少年，都踊跃地参加了各种体育活动。

有一次，父亲与朱瑞元、吕昌鼎（吕平）、林松寿，还有环山小学的老师等组成一个球队，叫做“老牌队”，和环山小学毕业生陈能和、董南才、朱瑞森、于祖统等组成的少年球队进行篮球比赛。这两队，无论是技术、经验或体力，都是“老牌队”强。球场看热闹的观众也不少，大家都认为“老牌队”必胜无疑。谁知比赛起来，“老”队骄傲轻敌，而少年队，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勇猛异常。上半场比赛下来，“老”队已力不从心，开始输分，到了下半场，“少”队越打越勇，结果“老”队输得相当惨。那次比赛，似乎给父亲一个教训：后生可畏。从此，他更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与教育。

因为父亲从小喜爱体育锻炼，所以练就一身好体魄。抗战初期，他在县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我家已搬迁到楚门芳杜陈愚庭先生家中暂住，那时祖母还健在，妹妹西林刚出世，我们兄弟年纪还少。父亲在工作之余，来芳杜住一、二天就回城。从县城到芳杜约有五十多里路，父亲步行来往，从无劳累之感。

把革命的火炬再点燃起来

父亲有一次说，新加坡那个地方非常敏感，消息灵，反映快，只要世界上有什么新书出版，很快就会买到。父亲在南洋，阅读浏览了不少在国内无法见到的进步书刊。据他自己说，有位叫马宁的作家曾经鼓励他写作，并介绍他与马共领导人认识，加入了当地反殖民斗争活动。

1937年10月，父亲在温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在玉环建立党组织。如前所述，当时的玉环，愚昧落后，人才稀缺，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谈何容易！必须做许多准备工作，首先要培养建党的对象。早在1936年春天，他就在民教馆内办了文化补习班，并启发环山小学毕业生杨炎宾、董南才等秘密组织“读书会”，后又组织“烽火社”，出版《烽火》刊物，进行学习和一些革命活动。抗战爆发，他组织玉环县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从中进一步考察与培养建党对象。1937年12月，他选送一批先进青少年，到平阳山门中共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几个月后，他在从平阳学习归来的人员中，介绍杨炎宾、吕平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玉环县抗战时期第一个党支部，重新点燃起革命的火炬。

在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之后

据父亲生前写的文字资料和玉环县党史办的资料来看，父亲失掉党的组织关系，是由于组织原因造成的。

当时的父亲，就象一个掉队的战士，孤立无援，但“孤军”仍可奋战。据父亲生前手稿及其它有关资料，他在教师的岗位上，利用“合法”的讲台，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对青年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支持简师学生反贪污、反校长侵吞学生公粮，反对开除进步学生阮积炎，设法保释被捕的学生盛从冲等活动；他资助学生朱义人等人路费以进入游击区；他把进步书刊借给学生盛世樵、李杰华等人阅读；他把所获知的反动政府内的情报及时转告给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介绍蔡鸿芳到警察局任情报员，作为我地下党的耳目，通过他的情报，及时掩护了地下党员和革命家属的人身安全，了解敌人的实力部署情况，对解放玉环，起了较大的作用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相信会有当事人写出第一手的材料的。

1948年暑假，父亲在同我们闲谈中，仍如过去那样，不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有一次，他说国民党做官的有八个口袋，他边说边做手势，用左右两手拍着自己的中山装口袋，说上身有四个，又用左右手拍着长裤的左右口袋和臀部，说裤上也有四个。他常说，国民党腐败透顶，非垮台不可。

解放后，父亲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玉环县中校长。父亲在任职期内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家中有一文稿可资证明。玉环县中可保送一名学生入温州高级工业学校，全校师生推荐我们的弟

弟董新篁,可是父亲在校长批语中写着:“该生资质中上,不予保送,另改他生,”这张公文稿在1975年父亲病危时还放在抽屉内。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公正无私,忠诚党的事业的人,却在1956年蒙受不白之冤,受到错判,直至1976年父亲含冤而死的二十年中,他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但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仍然坚定不移。我们从未听到他讲过半句对党不满的话,也未曾听到他对党发牢骚。他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诉,家中留下他的七份申诉书的底稿。在极左思潮的统治下,办案人员只相信敌人的供词,不相信同志的证明,父亲的申诉,无人受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在玉环县委、党史办以及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1987年省委发了文件,恢复他的党籍,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董 仲 升 年 谱

舒林 服伺

1899年(清光绪25年 己亥)1岁

阴历正月初七,生于玉环县城南斗门头村(今上段村)董家老屋。名诚钊,又名运铃,字仲升。有兄弟三人,仲升排行第二。祖父名政新,父名南霭

1917年(民国6年 丁巳)19岁

8月,考取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

1919年(民国8年 己未)21岁

5月,“五、四运动”发生,与十中同学一起积极参加罢课游行,宣传演讲,抵制日货等活动,并开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各种进步书刊,寻找救国救民真理。

1921年(民国10年 辛酉)23岁

是年春,与塘里盛氏完婚。夏,省立十中毕业后,考取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8月入学。

1923年(民国12年 癸亥)25岁

1月,由于祖父、父亲及长兄相继病故,家道衰落,且美专学习费用昂贵,家庭无力负担,即自动退学。

2月,在本县环山小学任教,此为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之开始。

1924年(民国13年 甲子)26岁

8月，经友人介绍，赴厦门大同学校任教。

1927年（民国16年 丁卯）29岁

1月，经友人介绍，到马来亚安顺培华学校任教。

1928年（民国17年 戊辰）30岁

2月，在马来亚峇眼华夏学校任教。

1929年（民国18年 己巳）31岁

1月，离马来亚返国。2月，又在环山小学任教。

1930年（民国19年 庚午）32岁

1月，携胞弟叔振同去南洋。2月，再到峇眼华夏任教。

8月，转至马来亚太平振华学校任教。

1931年（民国20年 辛未）33岁

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出兵进攻我东北。仲升即在校内外采用发表诗歌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约在此时，经作家马宁（共产党员）介绍，他参加了马共领导的反殖民斗争活动。

1932年（民国21年 壬申）34岁

他在马来亚继续从事反日宣传，马来亚为英属殖民地，英日两国，沆瀣一气，年底，当地英殖民政府，将他驱逐出境。

1933年（民国22年 癸酉）35岁

2月，转到荷属殖民地苏门答腊亚沙汉培善学校任教，仍受荷兰殖民政府的秘密监视。

夏，学期结束后，被迫返回祖国，从此结束了多年在海外谋生的日子。

8月，三进环山小学任教，继续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

1935年（民国24年 乙亥）37岁

10月，玉环县设立民众教育馆，他为首任馆长，即利用旧

孔庙为馆址，拆除孔庙大殿，改建孔庙旧屋，开设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琴棋室、乒乓室、运动场、花园等，使民教馆成为玉环人民正当的文体活动的唯一场所。

同年秋，开设初中补习班，免费为失学失业青少年补习文化，自兼语文和英语课教师，有时也讲时事课。入学学生有二、三十人。

1937年（民国26年 丁丑）39岁 抗日战争爆发，他发动热血青年，以青年学生为骨干，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10月，在温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派遣玉环进步青少年董南才、杨炎宾、陈增佳、潘微宏、柯爱菊、吕平、朱荷香、胡义夫及他的二个儿子共十多人，去平阳山门我党创办的抗日游击干部学校学习。

1938年（民国27年 戊寅）40岁

4月，介绍从平阳学习归来的杨炎宾、吕平二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玉环支部，这是玉环县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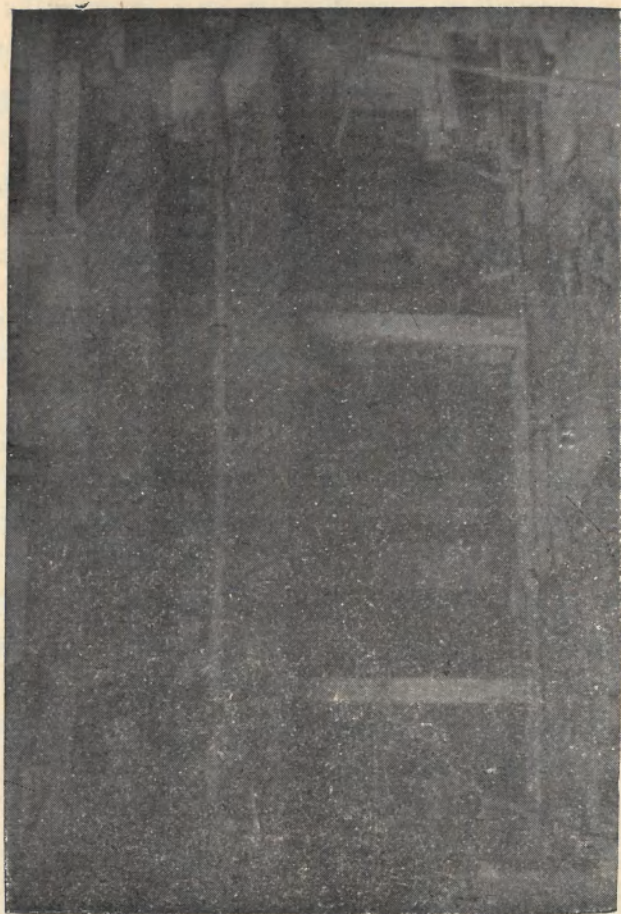
8月，遵照党的指示，出面担任环山镇镇长，以利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但由于县自卫队总队附薛靖的迫害，四个月，愤而辞职。

10月，由于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玉环县县长方引之免去民众教育馆馆长之职，失业在家。

1939年（民国28年 己卯）41岁

8月，受楚门东方中学校长林任望之聘，赴该校任教。不久，发展了该校学生钱启敏、知识青年王咏樵、北监盐场青年职工钱启厚为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秋，玉环县主要集镇出现了地下党散发的抗日传单，他和同



胡义夫供稿
抗战时期中共玉环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址

校教师叶克东被县方列为嫌疑对象，受县长方引之的非法传
询，并被迫离开东方中学，又一次遭到失业。

1940年（民国29年 庚辰）42岁

下半年，因组织原因，他与党组织失却了联系。

1942年（民国31年 壬午）44岁

2月，四到环山小学任教。

1943年（民国32年 癸未）45岁

2月，受聘在玉环简师任教直至1948年底。在简师任教期
间，他继续对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鼓励
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1947年（民国36年 丁亥）49岁

6月，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简师师生的迫害，发动全校教
师举行大罢教，以配合全校学生的罢课运动。

1949年（己丑）51岁

2月，在瑞安温州师范任教。

4月，玉环解放，他从瑞安返回玉环，找到尚处于半公开
状态的区委领导人盛世樵，向盛表达了欢庆解放的心情与要求
恢复党籍的愿望。

7月，任玉环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即楚门中学之前身）。

1951年（辛卯）53岁

1952年（壬辰）54岁。

3月，调赴杭州参加华东浙江分校学习。

8月，调到永嘉中学任教。

1954年（甲午）56岁

2月，调到平阳师范任教。

1955年（乙未）57岁

8月，调到黄岩灵石中学任教。

1956年（丙申）58岁

夏，在肃反中，蒙冤受屈，被黄岩法院错判，一年后刑满释放，失业在家。

1966年（丙午）68岁

十年动乱开始，精神与肉体进一步遭受摧残与迫害。

1976年（丙辰）78岁

3月7日，由于蒙冤受屈达二十余年，精神抑郁，经济困难，有病不能及时诊治，终于不治而逝世，享年78岁。

（关于董仲升同志政治上错误处理的问题，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已由黄岩法院予以彻底改正：宣告无罪，前判错误，应予撤销。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共浙江省委发出文件，同意恢复他生前的党籍，党令自一九三六年秋算起。——编者）

忆董仲升同志

抗日救亡，早酬壮志。

振兴改革，长慰忠魂。

胡今虚

四年前，董仲升同志逝世八年之后，得知他早先所受的政治上的错误处理已经主管部门予以彻底改正了；接着，又是一个更大的喜讯，党组织经过深入的查证，仲升同志远从1936年冬开始的党龄也终于被确认了。多么光荣的革命历史，多么艰辛曲折的道路，多么叫同志们兴奋。仲升同志的一生，特别是革命斗争的业绩，近几年，各方已有多篇资料记录或正在继续编录。这里，避免太多的重复，只把抗战前夕至抗战中期同仲升同志接触的经过——早被四十多年时光冲洗得零零落落的印象追记下来。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在温州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董仲升同志在玉环即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从事并带动本县各岛屿的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开始筹建本县的共产党组织。那一年寒暑假中，我差不多每天到温州城区鼓楼上民众教育馆去看报寻书。图书室管理员陈又东是我中学同班。仲升同志刚在筹办玉环县民众教育馆，也几次来这

里参加访问，都同我会面。仲升同志比我大十多岁，但我两人兴趣与志向相同，便逐渐成为忘年之交。

卢沟桥事变爆发那几天，我同仲升同志又在民教馆会唔。这时本城中小学美术教师张明曹同学也常来这里。仲升与张明曹是同学同行，我们就共同收集、制作和传播抗日宣传品。我把近年在上海所收集的这方面的资料——最新的图画和歌曲都供给他们选用。

抗战初 参加青年救亡团体

卢沟桥事变第二月，“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与浙南共产党的指导下，温州城区的爱国学生首先发起成立了永嘉（亦称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永战青团），轰轰烈烈地在城区开展抗战宣传和服务。永战青团工作的开展，给本城和各县抗战工作以很大的鼓舞，它很快地成为本地区各县青年抗战团体的带头者和中心。

玉环县当时属于温州地区（浙江第八行政专区），大小岛屿分布在瓯江口外的乐清湾，可是它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并不落后于本地区僻远的山城。当地原由董仲升同志支持，县民教馆供给费用的抗日刊物《烽火》，在抗战第二月停办之后，即由原来人员另创《快报》，每日油印报导前线战讯和地方动态。仲升同志的侄儿服群是本地救亡工作骨干。他原是省立温州师范学校学生，先前在省立温州中学读书时，与在永战青团的主持者胡景域、孙经邃、马骅等是同学。九、十月间，服群和玉环几个搞救亡的同志先后来永战青团看望老同学，寻

取宣传资料，两地青年抗战组织开始建立起联系。

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周年，永战青团在温州城区隆重举行数千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和大游行。接着，永战青团即扩大并加强了组织，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干事会。新干事会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加紧筹建温州、台州各县青年抗战团体的联合机构。干事中的叶龄银，团的骨干郑梅迪，两人原籍乐清，担负乐清县青年抗战组织的联络任务。后来他两人又先后辅助玉环县青年运动。

永战青团的演剧队曾经到附近区乡流动演出，也准备前往邻县。十一月初，董仲升同志特地来温州，以玉环县民教馆开展抗战宣传的名义，热切邀请永战青团演剧队去演出。永战青团以演剧歌咏人员大多是在校学生，不能过多外出旷误学业，而且他们都还年少，家长不允许他们远出江口，所以未接受邀请。仲升同志这次来，也为的商量各县的联络问题。当时干事会秘书长郑嘉治曾向他了解了玉环同台州各县的情况，要求他多同各县联系，准备短期内举行各县联席会议。

在乐清 温州商议各县联合问题

十一月中旬，永战青团负责干部多人，应约带同演剧队全体同志共约十六、七人到乐清县城演出。

我们到达乐清县城的当晚，仲升同志由侄儿服群陪同，赶到乐清。第二天早上，三个县的同志聚集在乐清青年服务团负责人王良恭家的厨房举行座谈。参加的有王良恭和乐清青年服务团另一负责人李方成，玉环的董仲升和永战青团的胡景域、郑嘉治、马骅和我。“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温州组

织的负责同志连珍（家住乐清虹桥，解放后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长）也从家里赶来参加。王良恭的哥哥良俭在日本研究美术刚回家，这天也来与我们会晤。这次座谈是各县战时青年团体代表会议的准备，先互相了解情况，初步交换意见。联合的范围预定为温台两地区各县。玉环同台州的温岭和黄岩两县的交通联络比同温州方便些，仲升同志是玉环教育界前辈，所以台州方面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座谈会商议准备先在温州城区设立联合办事处，定于本月下旬在温州城区举行各县代表会议。

永战青团从乐清演剧归来才十天，这个筹备会议即如期举行。会议地点在府前街生活书店三楼郑嘉治住处。召集匆促，台州各县都来不及推派代表，仲升同志代表玉环和台州的温岭、黄岩两县来参加。这时玉环的战时青年服务团正在加紧准备正式成立，温岭和黄岩也曾为防御沿海日寇侵袭同玉环商议成立青年武装组织，统一行动。会议很简单，讨论半天，各代表即很快返本县部署当前紧要任务。

次年1938年元旦，即农历十二月间，温台各县战时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在温州生活书店三楼成立，因为交通及其他情况，各县代表没有到齐。玉环董仲升未到，来的代表是叶克东，同来的还有温岭代表叶亮和黄岩代表林泗桥。

这年下半年，九月间，温州地方反动军政当局悍然通过决议并公开宣布取缔永战青团等五个救亡团体，各县的同性质团体有的早已被扼杀。十月间，反动武装突然袭击查封设在温州城内九柏园头的新四军驻温办事处，逮捕它的工作干部及其他革命青年。形势日益恶化，当年底，永战青团总团被强迫解散。各县青年团体所受的摧残比温州城区更早、更重。

此后两年，在严酷形势下，仲升同志在玉环的原来工作已

经调动，但他也还在玉环和临海同温州的救亡同志通讯联系。1939年初起，我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文艺宣传和编印报刊方面，再没有同仲升同志会面。至1940年，我被迫离开温州。关于仲升同志此后的情况，经过漫长而纷乱的岁月，到今天，我脑里所残留的影迹也日益模糊。

拨乱反正 振兴改革 长慰忠魂

每一怀念仲升同志，我总不禁立即联想起与仲升同志好多方面相同或相似的管文南同志。他两人年龄相近；同是永战青团从筹建开始的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同是在抗战前夕至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加入党组织；同是擅长美术；同是一入社会即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同是在新中国诞生时而受党的嘱托而担任本县中学校长；两人又同是那末地正真、纯洁、勤恳；同是后半生再历万坎坷，而终于同在逝世后的八十年代得到彻底改正错误处理并恢复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党籍。两人的一生，竟是这么多方面的相同或相似！

前年，1986年清明节，管文南同志悼念会在他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校长的瑞安县立中学隆重举行，出席瑞安党史座谈会的浙南和瑞安县的几十位革命老同志都来参加，浙南党的早年领导干部胡景域在会上讲了话，他並同前永战青团干事会健在的老同志向管文南同志遗象献上一副挽联，表示不尽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

抗日救亡，早酬壮志。

振兴改革，长慰忠魂。

今年清明，当董仲升同志逝世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还要

用这两行联语，谨献于仲升同志的灵前，以此悼念並告慰这位曾经与我们並肩战斗的忠贞的战友。

1988年4月 清明节

怀念叶克东同志

叶 亮

想起多少革命志士离开人间，被人们遗忘了。想起多少革命志士，遭受浩劫，没有得到澄清是非，作了饮恨千古的人，想起多少革命志士……楚门叶克东同志，久久无闻了，今旧友中偶然谈及他，寻觅到他的极其简单的历程，今将公之于世，以示革命志士中有他的一员。

叶克东同志1913年生于玉环县楚门镇，1926年小学毕业，曾在楚门东晖医院、平湖茅拔医院当练习生。

1930年前后，叶克东得到他舅父林任望先生的资助，入上海东南医学院求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久义勇军解散，原义勇军领袖冯庸在北平创立冯庸大学，他入该大学肄业。二战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担任冯庸大学基层组织负责人，“一二、九”运动中被捕，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经林任望先生奔走营救，得免于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被释放出狱。

叶克东回到楚门后，正值祖国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之际，沿海一带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他心甚焦急。一天，在林任望先生家听其友梁耀南谈到温岭有个叫青年战事服务团的组织，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心有所动。梁介绍他去温岭找到了我，听取工作经验。我说：首先必须取得救亡团体的合法地位，免遭顽固分子的阻挠；可由我写信致玉环得力的人士支持。这个想法

在他回县后获得成功，先在楚门镇建立起战时青年服务队，克东同志被选为队长。继续扩展至县城，总领导机构改为团，叶克东被任命为副团长，当时玉环属温州专区，由于毗邻温岭，工作上双方是互有联系的。

1937年底，温州方面在中共地下党授意下，由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主持召开温台两区各县救亡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商讨两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问题，温岭事先接到通知书，我即告之黄岩林泗斋，我们一起去楚门会同叶克东，乘机动船去温州。会议时间正好是1938年元旦，在这次会议上各县交流了工作经验、並部署了今后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收获很大。

叶克东同志在玉环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並担任了玉环抗日动员会委员、楚门抗敌剧团常委、自卫中队指导员等职。38年上半年曾多次来温岭联系工作。

1938年10月，形势逆转，救亡团体遭到摧残，被迫停止工作，部分积极分子转入地下活动。克东同志鉴于当时形势，只得离开家乡，曾在丽水当过军医，后又转到浙西安吉县工作。1943年秋，安吉沦陷，他跟随他的工作单位，退至昌化，偶然在路上和我碰到，久别重逢，格外亲切。相谈之下，我知道他已患肺结核及其他疾病，在这缺医少药的贫脊山区是难以生活下去的，我劝他还是回楚门老家治养为好。我们分手之后，他找伴向浙东方向走去。长途跋涉当时交通又不便，大多数旅程都是靠步行的，这对他的病情十分不利，转辗费时，回到楚门，病入膏肓，难以救治，于1943年秋末，不幸离开人间，享年仅三十一岁。

林菊人生平事略

张子训

少年好学 首诊成功

林菊人，又名论书、号善乐，字菊金，玉环县沙门镇（旧称桐丽乡）都墩村人。生于一八九七年，卒于一九五六年，享年六十岁。祖籍温岭，祖父林中甫，晚清岁贡生，行医乡里，名闻全县。父亲林植斋，也是岁贡生，研习岐黄，医术高明，温、玉两县享有盛名。兼营林益生中药店，生意兴旺。

菊人生于祖传医家，十二岁开始学医。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加上父亲指点，通晓《伤寒论》、《温病条辨》、《内经素问》诸医学经典。

乌岩村沈某患病，派人前来请植斋先生出诊，恰巧先生卧病不起，来人再三言明患者病情危急，请先生坐轿出诊。植斋考虑乌岩是个渔村，地处海角，缺医少药，只好派十六岁的菊人出诊。临行时嘱咐轿夫说：“服药一剂，病有见效，可继续医治；若是无效，迅速回程。”结果，患者一剂服后病情减轻，四剂病愈。病家十分感激，逢人就夸“小郎中”医术高明。菊人首诊成功，学医信心更足，从此，医术不断上进，医名与日俱增。

业精于勤 对证下药

菊人二十余岁时，父亲辞世。他为了提高医术，博采众

长，只身赴沪，辗转宁、粤，拜访名师，专研医理，二年始归。曾受聘于温岭岙环镇徐同泰中药店坐堂行医。其间，温岭琛山有一金姓财主，闺女患病，数月未愈，遍访名医，求治无效。闻得菊人医术高明，特地前来邀请出诊，同时还在温岭县请来五位名中医一起会诊。金姓财主，自己略识医理，心中早有打算：谁诊断准确，医案有理，处方对症，就用谁的处方。菊人对金家闺女详细切脉、查看舌苔后，告诉她：“你起病是月经来潮时，伤入风寒，所以经闭三月，有寒热往来，四肢乏力。”患者忙回答说：“真的。三个月前，我刚月经来潮，坐在大路边的茅坑小便，忽然一阵冷风，吹得我毛骨悚然，当夜就发热了。服药至今，仍然无功。”金姓财主听后十分佩服，就选用他的处方服治。闺女连服十余剂，终获痊愈。病家以重金酬谢。从此，他医名益盛，临床之际，大刀阔斧，善用复方，屡见奇效。

一九四六年，他受坎门郭源顺药店聘请，每日门诊人次上百。其中，坎门人郭左（今坎门中学退休教师），患肠伤寒三周不解。证见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并病腑实，委顿床第。中、西诸医束手无策。菊人急投“银翘散”，调胃承气汤合方，一剂知，二剂愈。温州人章右（今已故），患蛔厥，病在厥阳，证见阳明。菊人即处“乌梅丸”，大承气汤合方，霍然而愈。病家奉之若神。他一生验方、秘方甚多，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著有《麻疹专论》一书，曾于一九五八年在温州展出。

由于他医术超群，药店业务猛增，他个人经济收入也十分可观。店方按他处方业务量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工资。另外，门、出诊费归他自己收入。有人为他计算，每日平均收入价值

一钱黄金左右。菊人的兴盛，必然影响当地同行的生意，使他们的收入骤减。个别同行遂生妒忌之心，便借题发挥，捏造事实，有意中伤，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菊人只身作客异乡，深受排斥，被迫离坎返乡。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他在沙门街民生药店继续坐堂行医。当地群众闻讯，纷纷赶来就医，连岙环、江缩、楚门、干江等远隔二、三十里以外的病人也前来求医，有坐轿来的，有竹椅抬的。总之，他走到哪里，哪里的药店就应接不暇。

一九五〇年十月，温岭县江缩乡孔某，家境贫寒，无钱看病而死，七天后复活，患者请菊人医治。菊人同情他的困难，免收出诊费，自理轿钱，并赠送药费，使其病体全愈重活人间。

一九五二年，有一中年农妇前来就诊。菊人经过详细切脉，诊断她已经怀孕三个月。妇人顿时面红耳赤，低声反问：

“林医师，我是没有丈夫的，你要看准！”菊人回答：“看来不会错。”农妇神色紧张，请求菊人开秘方堕胎。那时的政策，医生给人堕胎是犯法行为。菊人只好向她宣传婚姻法，说明寡妇改嫁受法律保护。后来，这位寡妇改嫁生下孩子，非常感激林医师对她的帮助。

振兴中医 热心带徒

菊人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振兴中医事业，就从自身做起，在业务万忙中，热心带徒传技。

一九四六年，他在坎门行医，收郭世钊为徒。当时有人劝他，世钊已经学得许多医理，恐怕你要自找麻烦。菊人说：

“越有基础越好培养。”在他热心教导和传授下，郭成了玉环中医后起之秀，任县人民医院中医师（现已退休）。

一九五二年，菊人在楚门行医，曾带叶国才（干江人）、张子言（桐丽人）为徒。后来，叶在楚门、干江一带诊治，享有盛名；张在当地也很有声望。

菊人晚年，自己患肺结核病，经常咯血，长期喘咳，为了培养中医接班人，仍然不遗余力。有时门诊病人多，还是不厌其烦地边看病，边传授，临床应用与书本论理相结合，使学生融会贯通，进步很快。

一九五三年，他在楚门中医联合诊所担任副所长。当时，中央卫生部提倡中医科学化。有些人误解，认为中医不科学，却搞开了中医西医化。在社会上中医受到歧视和排斥，用中药连公费医疗也不能报销，迫使许多中医纷纷转业学西医。西医吃香，身背药箱，手拿打针筒，能赚钱，又神气。菊人眼看祖国医学遗产遭到严重摧残，后继乏人，十分痛心。他说：“中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国宝。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有些人专门想赚钱，抛弃中医而不用，是不学无术的半桶粪！我要大声疾呼：中医事业要振兴！为子孙后代造福！”

现在，中央很重视中医事业，卫生部专门成立中医局，各省、市都设立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党的中医政策完全符合林菊人医师生前之宏愿！

（本文蒙郭世钊医师提供部份资料整理而成）

毛光熙先生简介

毛礼联 张炳文

毛光熙先生，1906年12月11日生于玉环县楚门区密溪乡山里村。少时家有薄产，生活小康，延聘玉环秀才陈子英（大聋父亲）在家专授课业，熟读四书五经，年长后转至楚门养正书院就读，谙通古籍，弱冠负笈杭州，就读于宗文中学，及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嗣考取上海法学院，修业期满，获政治学士学位。1932年出国，留学比利时鲁文大学法学院，攻读政治外交，四年毕业，获政治外交硕士学位。

1936年回国。次年抗战军兴，在乡任玉环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服务桑梓。1938年《温州日报》创刊，任国际版编辑兼写社论，1939年赴上饶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以设计委员衔，任《前线日报》电讯主任及总编辑，兼撰写社论。1942年日军窜扰浙赣沿线，上饶沦陷，随报社撤退至铅山、建阳等地，沿途备受颠沛，1943年辞职返回故乡。

1947年当选为玉环县国大代表，参加南京国民大会会议，选举以后客居上海，从事航运商业，1949年下半年去台湾，1986年台北玉环同乡会改选，推荐毛光熙先生为荣誉理事长。

王泉隆打钓店

王思清

王泉隆打钓店是一位名叫王意智的手工业者创办。追溯近一个世纪来，它不仅在闽、浙沿海一带负有盛名，同时在玉环坎门地区盛久不衰，曾对渔区的生产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锐意开拓

王意智，出生于福建晋江县一个贫困的渔村。在1883年间，为避瘟疫，只身跟随一个变戏法的小班逃到异乡。在他十八岁那年，飘流福州，偶邂逅一位来自温州籍姓黄的人在此学钓钩业手艺，便结伴从艺，满师后随他漂洋过海，辗转至温州，开设一爿叫：“黄泉源”的打钓店，遂吸引了毗邻海岛四方渔民，顾客纷至沓来，营业甚昌。

一次，王意智受店主之遣，前往教场头销货，发现这块地盘虽乃弹丸，人烟不稠，却为渔业发展天然所在，来日定是渔民生息繁衍之地。一旦认准之后，王返温辞去黄泉源店主，只身迁徙坎门，选择在前街，独设一爿小钓店，聊以谋生。时年仅二十一岁。

通过一番苦心经营，王意智的钓钩生意慢慢做活，由坎门

影响到沿海各地，销售量扩大，资本积蓄日益增多。这时，他考虑到经营扩展，重新从又新街物色房屋，购置了连同店铺计廿余间，命名为王泉隆。

二、面临挑战

1905年初，年届四十的王意智在坎门立下根基，固定资产已达数十万元，即将一贯生息晋江的家眷全部迁来定居。开始把钓钩手艺授其长子庆招，次子庆顺。当时，坎门的渔业、商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福建、温州、洞头等地移民纷纷来此定居，初步形成渔农工商昌盛局面。由于坎门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钓钩业这种生产工具成为必不可少的经营项目，总会受人注目。这时，一位姓朱的手工业者携带徒弟跻身坎门，在西头街开设一爿钓钩店，意欲与王泉隆争夺市场，大大冲击了王家的经营地盘，为谋求生存与发展，王泉隆考虑同对手的竞争，务必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对生产工艺精益求精；二是经营合理作价，采取薄利多销；三是经营品种、规格齐全，由原来的单一品种，扩大到大花（鳗鱼钓）、二花（白鱼钓）、三花（鳊鱼钓）、沉绳（黄鱼钓）等花色品种，一应俱全。由于改变了经营方式，尽管面对同行者激烈挑战，王泉隆的营业额与赢利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立于不败之地。历经数年角逐，那位姓朱的钓钩店终于不击而溃，并宣告倒闭。

三、兴旺发达

二十年代后期，王泉隆日趋昌盛，资产雄厚，他们立足于以

钓钩业为主体经营,采取“横向发展,合资联营”的方针,范围扩大到木材、百货、南北货、粮食等,同时,和坎门郑德兴等商号合资购置大中号商船,具名谓:大排、南顺、乌榄等规格不同的船号数对,每只船一般运载量为400—800担,从事于台湾、福州、泉州、山东等沿海港口贸易。由于多渠道的横向经营,当时王泉隆的声誉与名噪一时的郭源顺、王源兴、三阳泰、周天成等商号齐名。

由于从事其他商业的效益一般均高于钓钩业,在兴盛时期,有人主张放弃薄利的钓钩业经营,遭到户主王意智的异议。在他临终时曾告诫:“吾辈之所以兴隆发达,其发家根本,亦来自钓钩业。今后不论家业如何,其本行绝不可废。”王公享年七十一而终,他建树的王泉隆打钓店由次子庆顺掌业。

庆顺继业后,坎门近洋的披山等渔场已经开发,每年吸引福建崇武等地大量渔民前来捕捞。旺季时,他顺应了天时、地利,并未因独家经营而掉以轻心。因此,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顾客的光顾,皆热情接待,不论当地或异乡的新老用户,均一视同仁。并始终抱着“质量与信誉共存”这条宗旨。在渔业旺季,顾客如流,门庭若市,钓钩往往供不应求。但庆顺对产品质量仍不放松,在生产环节上,从落料、打弯、造形、直至淬火、热冷调节等几道工序,从不忽视。产品验收,由专人负责,均一枚枚逐一加以认真检验,符合要求,才上油包装,每包产品上均加印王泉隆的标号。凡发现变形或抗拉强度不符的,均作报废处理,从不以次充好,损害用户。

由于王泉隆经营有方,取信于用户,该商号盛誉不脛而走,故经营额倍增,以往生产规模已远远满足不了用户的需求。

三十年代,庆顺操揽的其它商业经营日益扩展,商务应接

不暇。为了适应渔区市场的需要,他恪守先严之训,对钓钩经营不仅未加削弱,反而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再生产。在面临工人紧缺的情况下,他並未向外聘请人员,而是着手从家族内部挖掘潜力。开始把操作工艺先后传授给同胞兄弟夫妇与子媳等人,直至五十年代、王家不论男女老幼皆学会钓钩操作工艺,偌大的一月商号除招收个别学徒外,全由王泉隆祖孙三代操作。

四、历尽坎坷

三十年代后期,王泉隆除从事钓钩本行外,把主要资本投入到其他贸易方面,经商范围在福建、舟山、台湾、旅顺等地,经营水产、药材以及红白糖、桂圆、荔枝、罐头、红枣、黑枣等南北货。经营额往往扩大到数十万元,对当地的商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0年3月,坎门遭受日寇飞机的袭击,民房、店铺多次被炸,化作废墟。这时,座落又新街的王泉隆廿余间店铺、库房,住宅和全部财产毁于一旦,损失惨重。这场浩劫,使王泉隆元气大伤。庆顺面对着这付残局,锐气未减,于是,他将座落于其他街道的剩余房产和数十亩田地变卖,拼凑资金,执意东山再起。翌年,他终于在又新街东侧(今中市街工人路)重建楼房连同店铺五间,又打起王泉隆商号,重操旧业,将数十年的钓钩业传统沿袭下来。通过几番周折,艰难拼搏,终于扭转了局面,再展宏图。

当时,日寇侵华,政局动乱,盗贼蜂起。海面上土匪横行,抢杀掠夺,无所不为,构成对通商贸易的来往商船的严重

威胁。与此，王泉隆与郑德兴合营的通商每次均冒极大风险。

一九四一年，一对大排商船由旅顺返航南下途中，遭日寇舰队的袭击，满载的白糖、药材货物连同船只皆被掠夺，近二十名水手、船员惨遭杀害，无一生还。四七年，一对乌榄商船载鱼货由舟山至福州洋面遭土匪袭击，全部货物洗劫一空。四八年，一对大排商船由台湾返回，在离坎门仅咫尺之距的黄门海上遭劫，王泉隆的家眷在海滩上眼睁睁看着这对船货被海匪抢劫……。从四六年至四八年短短三年间，王泉隆的商船先后遭受土匪掠夺廿余次，直接损失计数十万元。

由于连年屡遭浩劫，致王泉隆产业受沉重打击，处境每况愈下。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危局，庆顺心忧如焚，他实不忍于一生惨淡经营，开拓维艰的产业坐视衰亡，决心作最后一番的拼搏。于是，多方筹划，四处奔波，勉强拼凑数万元资金，决定亲自出阵，企图东山再起。

1949年7月，庆顺偕同三子心良，破天荒驾驶一对乌榄号商船，满载水产品抵台湾基隆贸易，9月返航于福建下关洋面，不幸又遭到土匪袭击，除船员生还，船货全被洗劫一空。再度的失利，雪上加霜，导致了王泉隆惨淡经营一生的产业，遭到彻底破产。

五、勤俭创业

从四十年代起，王泉隆的家族人丁发展达二十余口，论当时背景，经济实力可谓家财万贯，是坎门殷富大户之一。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却是鲜为人知的。

身为一户之主的庆顺，民俗称谓“头家”（即老板），平

日衣着极为简朴，一生从未穿过绫罗绸缎。通常，他与老伴徐氏，不论风霜雨雪、寒冬腊月均赤脚，直至逢年过节，才难得穿上鞋袜。庆顺掌管商务后，经常外出洽谈生意，住宿专挑一些低廉的小客栈落脚，从不多花一文钱。一些初次接触的客商，不谙其人，看他那付寒酸的打扮，以为是一个“乡巴佬”，根本不在意他是一位老板。平时，这个家族一日三餐，均以稀饭为主食，而且，吃的菜肴也十分简单，如不逢年过节，一家人难得吃上一顿干饭和稍稍象样的菜肴。尽管庆顺持家如何严谨，尽管节衣缩食，但对外来客商不论来历，一概酒菜款待，从不怠慢。对于庆顺一家的勤俭创业，当时地方父老十分景仰，众口皆碑。

解放后，随着渔业生产工具的更新，机帆化基本取代了古老的钓钩工艺，人们对王泉隆打钓店的印象亦渐渐淡忘。

北监场的“盐廩”与“廩商”

郑招友 倪馥臣

“盐廩”与“廩商”是两种含义不同的盐业俗语。“盐廩”顾名思义即盐仓，是指盐场储盐之仓房（仓库），秦汉魏时在敖山（今河南荥阳北）上置谷仓，名敖仓，故沿称仓为“敖”，又写作“廩”或“廩”，解放前两浙盐场储盐的地方，均称为“盐廩”。所谓“廩商”即从事盐业产销经营业务活动的商人，是指中国旧时盐商的一种，它在盐专卖制度下具有高度的垄断性。

我县北监场始自宋初，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纳土，置两浙路，先设杭州、秀州、密鸚（在玉环乡）、永嘉四场。元大德三年（1299）天富北监场曾设司令（从七品）司丞（从八品）管勾（从九品）各一员专司盐务。至此以前有无“盐廩”置设尚无定论。但自明朝开始已有设廩储盐，夷考隆庆五年（1571）天富北监场盐课大使王大宾劝谕各灶照盐丁捐资，重建旧有子场华严仓五间，清港仓十二间，白沙仓八间，智字团仓三间，峡门仓十间，岁办盐一千六百四引三百六斤一钱（温台每引为四百斤）。据清史记载雍正六年（1728）玉环建厅时整理盐务，灶户填牌编入保甲，并并灶聚煎，官收官卖，是年设塘洋，后垵，盐盘三廩，谓之“三煎廩”，设坎门、鸡山、三盘（今洞头县）三廩，曰“三卖廩”。以上“盐廩”置设，

均由官府发币收买盐斤和发盐发配渔食用户。乾隆二十九年（1764）塘洋。后垵盐盘三处每（年）约产盐百余万斤，煎盐币本一千五百两不敷覆准加银五百两，仍令玉环同知官收官卖。直到嘉庆元年（1796）以后，因温台两府连续两年遭风水为灾，多处盐廩倒塌，冲失官收币盐计银三万八千二百余两，题请豁免，旋于嘉庆六年（1801）奏归商办。嗣道光咸丰年间，又曾一度变通票引兼行及试行官运，由于私枭结集，私风素盛，于同治元年（1862）时，又将官收停办，改缴盐课，玉环年缴盐息银二百余两。沿至光绪十五年（1893）盐务开办，仍循旧制改商收为官收，以迄宣统三年（1911）为开征盐税，激起外塘盐民抗税，烧毁盐廩数间。上述垂一千多年以来，溯维玉环历代盐务之大概。

民国初，创盐务实为大利之所在，军饷民食均赖于此，当局深感盐产于场，散漫难稽，倘非将所产之盐悉数归仓，则偷漏流弊滋深，长此以往，后患不堪设想，故行政策，凡各场之有引商、运商者，督令兴建仓房和租用民房储盐，以便缴盐适中及易于管理，若无引商、运商者，则责成“伕户”或“团首”资格充任“廩商”或招殷实商人办理，该法对场产管理颇著成效。厥后，北监场“廩商”日趋涌现。民国三年（1914）浙江在军阀统治时期，准予商人包税，玉环、乐清、平阳三县进行承包，订立三年合同，包商年缴省盐税二万五千元。民国五年（1916）北盐场公署创建。民国七年（1918）北监称放局开办。该两机构新置虽主管场政及场产，税收属两浙盐运使署和两浙盐务稽核分所管辖，盐税直接由中央控制，但下设的后垵下新塘、新陡门、新富塘、盐盘五个称放分局的产盐仍由“廩商”设廩收购、储存、运销、纳税。斯时，北监场“廩商”辟

坦旁隙地按区建造盐廩三十八间,称之为“复兴”、“四利”商廩。民国十六年(1927)因“复兴”廩无力维持,于七月停办。民国十七年(1928)随之产盐增多,盐廩也不断增筑,是年全场计廩屋九十五间,草厂五座,总容量达十八万担。仓主有金英昌、赵季磊、王洪宝、高子智,其中以金英昌占有最多。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四利”廩又与停办之“复兴”廩合并,称之为“复利”商廩。民国二十一年(1932)坎门、洞头渔盐分销处奉令撤销,在渔区招商开办盐店栈十五处。民国二十三年(1934)商廩资金困难呈请退办。民国二十四年(1935)又撤盐店,由永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会同地方党部组织温属渔盐收运所,办理渔盐收运事宜。民国二十六年(1937)中央财政部盐务总局核准成立两浙盐务管理局,并将前设之稽核所及盐运使署一律取消。此时抗战军兴,两浙各地盐场先后论陷,仅存温台两地,产盐供不应求。于是,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全场产盐统归北监场公收(复为官收),其原有收运所承办的渔盐部份亦收归场办。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渔盐业务全部收回。民国三十七年(1948)北监场鉴于物价飞涨,资金枯竭,局势紧张,对部份鞭长莫及的产区,如海岛、芦浦两处,一面准许盐民组织公司或商号自产自收,一面招商承办收购,经多次磋商,才于七月间由吴起芳(芦浦人,原玉环县参议长)筹设“海利”商号,收购海岛芦浦产盐,后因盐本长期拖欠,引起场方、劳方、资方均不满意,勉强拖至翌年解放。

过去“商廩”剥削盐民,手段恶劣,压价收购,低买高卖,拖欠盐资,高利盘剥,勾结场官,动辄以停晒为威胁。他们还雇有一批“栈司”、“伢郎”在收盐时明扣暗折,还采用“双广”秤(即一百二十斤为一百斤),牟取暴利,置广大盐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任其宰割。

天 富 北 监 年 考

郑招友 倪馥臣 季世铸

天富北监设置于宋初,后称北监场。

据《玉环厅志》(光绪版)载:王十朋送凌(霄)知监赴任玉环诗按注,“宋时有天富北监在玉环南监在平阳”。《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载:“天富北监宋初与南监并置”。可见,宋初玉环就有天富北监。又据《乐清县志》十六下卷《考证篇》载:玉环北监“诸言盐场者多作天富北监,惟巡检可单称北监”。由此,宋时天富北监系指盐场。

据《宋史食货志》载: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两浙有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鸚永嘉二(两)场”。又据《浙江通志稿》载: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两浙曰杭州场岁鬻七万七千余石(五十斤为一石),明州(鄞县)昌国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秀州场(嘉兴)二十万八千余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鸚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查证所指密鸚即玉环乡五都“密鸚”地方,与后垅相邻,“鸚”与“莺”字,音同无疑。

据《盐法通志》十六卷《政迹篇》载:“胥致尧字正臣抚州南丰人太平兴国癸未进士咸平间监温州天富盐监治盐三岁。”《元丰九域志》载:“州东北一百里六乡柳市封市二镇

天富一盐监有雁荡山芙蓉大江”。此时，玉环归属乐清县管辖，文中“盐监”即是天富北监。

据民国时期曾任中央盐务总局副局长的曾仰丰氏所著《中国盐政史》记述：“宋初，吴越纳土，置两浙路，先设杭州秀州密鸚永嘉四场”。故密鸚立场自宋初，是吴越降于北宋即在太平兴国三年间（公元978年）。

据《中国盐政实录》第四辑载：北监场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设置。位处玉环县之楚门镇，距城约三十里，其产地分楚门（外塘）、盐盘两区。

综上资料研究，认为天富北监始置于宋初，应在太平兴国三年间（公元978年），有《中国盐政史》为据。后因年代变迁，机构更迭，直到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才正式定名于北监场，相传迄今。

坎 门 三 钱 庄

源 源 钱 庄

郭 辑 中

坎门地处海滨，面临东海，居民大都务渔，大小渔船（远近洋）数以百计，渔业经济，居全区首位，客帮鱼款兑汇，数字巨大，往常须经温州钱庄转折兑汇，既费时日，又须派人赴温提领，且时有缓不济急之虞，其他各行业货款往来，也感到十分不便，主要是本地缺少金融机构调剂经济，沟通兑汇。

二十年代中期，郭源顺南货店店东郭国芳第六子名云林，字希陶，自幼学贾，认为欲繁荣坎门经济沟通兑汇，发展生产，首先要填补金融业的空白，特发起筹资创设源源钱庄，股金共约一万多元，股东有郭希陶、郭绩任、郭汉川、马庆甫（楚门源和酒坊经理）、童仲方（温州源孚钱庄经理）、沈良圭（海门永丰钱庄经理）等人，郭希陶任经理，内设内帐房兼信房，外帐房各一人，学徒数名，开业以来，由于郭源顺老招牌素为外地人所熟知，立即跟上海、宁波、沈家门、石浦、海门、温州等地钱庄挂上了钩，並得到各地钱庄的信任和支持，在兑汇业务中，双方均本着为客户服务精神，信守商誉，尽力做到兑汇及时迅速，使客户称心惬意。同时，各地钱庄，在款项往来中，为活跃金融，搞好兑汇业务，并订定常年给予一定的透支金

额，促进双方营业发展增加收益。该庄一面办理存贷款，截长补短，哀多益寡，使地方经济获得良好调剂，大大起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作用。经营数年，款项进出，总收支一年比一年扩大。源源钱庄之设立，在本县境内，可称开金融界之先河。之后，在源源钱庄业务日趋兴盛的影响下，坎门汇通钱庄，怡康钱庄，楚门怡源钱庄步其后尘，相继开设。从此，本县金融业更上一层楼，地方经济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约在一九三五年间，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社会经济趋于极度不景气，百业衰颓，民生凋敝，各地钱庄陷于绝境，以沫相濡，终于相继倒闭。源源钱庄因与外地同行业息息相关，不可避免地随即遭受了严重影响，消息传开，不脛而走，存户闻风，争先恐后纷纷前来提款，顿时发生挤兑，该庄因营业进出范围过于庞大，一时失控，同时，该庄本身已处于瘫痪状态，贷款回收更见困难，致使周转不灵，无法支持，宣告倒闭，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后来郭希陶在赏付存款过程中，经求得部份存户的同意后，采取折扣分期偿付，但因存户多，款数巨，尚没全部解决，直至解放后，部分债权人提起申诉，由玉环县人民法院受理宣判，将债务人财产查封抵偿了结。

怡康钱庄

肖善志

怡康钱庄，创业时间大约在1931年间，由当地士绅泮作波邀请亲眷庄悦成什货店老板庄道桥合夥开设的，自有资金银圆一万元，另由亲眷两户长期存入八千元，还与本地源源钱庄以及温州五马街永丰、钱丰等钱庄有交往，相互支持，立有往来存摺。如有大笔现金收入，及时乘上海轮船送往温州钱庄存储。存款来源主要靠本地几家大商店及个人。商店进货时，需要资金，随时可提取存款或借款。放款对象主要渔船主，八月头修船添置渔具，需要大笔资金，分别向钱庄借款，钱庄缺乏现金时，要向温州中国银行分行借款，银行借款手续，要有相当经济信誉的人担保，当时怡康钱庄就依靠本地人在温州五马街身兼五家钱庄经理的沈良圭（坎门钓艚人）为保证人，因此当时资金周转，尚很灵活，对支持商、渔业生产，起一定作用。

放款利息2%，有时还内扣2——3%作为去沈家门收帐费用。

怡康钱庄也经过三次搬迁营业所。第一次设在前街庄悦成店内，不久搬到后街泮良福街路店屋，时间较长，最后搬到泮作波新建住所（后街）营业。

经理泮作波，聘有账房朱达文（温州人），先后带有学生（学徒）詹必金、泮云来、月棋（温州人）等数人，詹必金三年

出师后，升为外帐房，主管柜台上现金收付（出纳），备有墨笔字记的草登帐一本，晚上交内帐房（会计）分别登龙门、总清等帐册。

每年8月渔汛旺季，北上捕鱼，经理泮作波借詹必金两人去沈家门，临时设立办事处，主要催收渔船主借款，收到款送当地钱庄汇回坎门。

借款人凭借条：

凭票於○年○月○日即付

怡康钱庄国帑○○元正 附注：其中包括利息及内扣
此据

借款人

担保人

中华民国○年○月○日

嗣后，大约在1936年间，随源源钱庄倒闭影响而倒闭，因数万元存入拿不回，最后还有壹万元拿不回而了结。

汇 通 钱 庄

邱秉钧

一九三〇年台商林一理布店主林渊如，鉴于坎门地区渔、工、商经济发展需要，合股开设坎门汇通钱庄，股东林一理棉布店、王泉隆打钓店、郑德兴鱼行、庄悦成船什货行各投资5000元，计股金贰万元。人事组成：经理林渊如，内帐房朱瑞德，外帐房邱秉钧，银房陆如源，跑街王心锐，下设学徒2人。经理工资150元，店员30元，另发月支2元，补贴理发、洗衣。膳食由店供给，专用厨师烧饭做菜，饭菜丰盛，超过其他各业，可称生活优惠。

汇通钱庄存款年息一分二厘，放出二分，差额八厘，利息收入作为全店总开支外，余作年终分给股东八成，店员二成。由于林一理、王泉隆、郑德兴、庄悦成是坎门独资经营商行，资金足声誉高，汇通收存款逐年扩大，至一九三二年存储高峰竟达20万元，仅次于郭希陶开设的源源钱庄，高于潘作波开设的怡康钱庄。

好景不长，至一九三五年春，因国民党政府腐败，财政处于极度困境中，中央银行收归银元，停止市场通用，政府滥发纸帮，物价飞涨，影响所及，人心惶恐，温台地区钱庄客户纷纷提款，出现挤兑风，造成钱庄破产、倒闭。这股风潮波及坎门，源源、汇通、怡康三钱庄亦相继停业，清理债务，宣告倒闭。

源 和 酒 坊

张炳文 陈遂雄 林礼唐 冯妙兴 泮昌顺

楚门的“源和酒坊”（旧址在南塘头，即现在的玉环酒厂），开设于清朝光绪年间，老板叫姜建辰，系海门（今称椒江）葭芷人。他聘请黄岩的马庆甫为经理，俗称“老大”。马庆甫为人忠诚老实，善于经商，因地制宜，深得姜氏的器重和信赖，因而全权独掌“源和酒坊”。他在楚门历时三十余年，经营有方，使其逐年发展，资金积累达十万银元，购买土地三百余亩，职工增至五、六十人，冬酿黄酒千余大缸，并兼营豆制品（元酱、腐乳、豆腐干）、南货（桂圆、荔枝、糖类）、豆饼、猪羊骨等。在楚门西大街又开设“源和副号”（门市部），店面宽大，经销酱酒、南货，为楚门市场第一家殷商。

“源和”之名，远近传遍，“马先生”称号，人所共晓。

“源和”制作的豆腐干成为楚门特产，质量好，销路广。它的主要操作是黄豆磨得细，浆汁压得燥，切成方扁形块叫“白坯”，既结实，又干韧，通过大茴、桂皮、五香粉、食盐、元酱调煮，成品色泽深黄，味道鲜美，咸香可口。每日小贩一早前来抢购，挑送各地，无不在午前销售一空。

因抗战影响，“源和酒坊”停业，后有东亚，同兴等酒店相继仿制，保持其传统优质。楚门豆腐干，坎门“源顺糕”，留名齐传，两地媲美。

农民冬种苜蓿，猪羊骨是少不了的肥料。每年秋前，马先生就派人往扬州仙女庙采购。货物运到，只要张贴告示（用木板印印在红纸上）：“猪羊骨定×月×日在斗门头开秤。源和号告白”寥寥几字，各乡农户闻讯，就纷纷前往购买，往往只需十天时间，全数便可销空。当时，一元银洋可买三、四十斤猪羊骨，卖方固然有利可图，但对支援农业来说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马庆甫懂得酿酒要用粮食的缘故。

过去，福建商船时常运货停泊在楚门斗门头销货，客商销不了货，大为发愁。马庆甫给予接收上栈代销，或议价顶受自销。他严守信用，及时偿款，“源和”声誉益盛，广开门路，货源不绝，生意兴隆。

“源和”问世，异军突起，对当地一些小酒坊有压倒之势。外地殷商在此开业，难免要受人欺侮和凌辱。马庆甫要想在楚门市场生根立足，非有靠山不可。他灵活机动，敦聘当地两位老爷头坐镇“源和”，为己撑腰壮色。一位是筠岗的耿灿东（武举出身），给以干股酬劳；一位是楚门的叶佩璩（晚清拔贡），则以巨金馈赠。此外，逢年过节，对当地士绅均行请酒送礼。姜氏能获利，全赖经理马庆甫的交际有术，经营有方。

玉环近代航运简况

林兆佩

清末民初，玉环主要港口有坎门、楚门两处。坎门港以渔船居多，亦商亦运的船舶次之。船只小，商运很少远航，活动范围大多在温台沿海和乐清湾，但也有至福建、台湾的。楚门港船舶多数在10吨以下，以乐清湾航行为主，去温台各埠营运不多。坎门运出货物主要为水产品，其次为农副产品；运入的为木材、薪炭、渔需品、南北货等。楚门外运的以原盐、蛎壳为大宗，茹丝、禽蛋、生猪为次量，水产品又次量。楚门是原盐产地，除自给外，需大量运往温州转口；深浦港的蛎壳，得天独厚，烧制成灰，不但是建筑材料，而且是冷水田的必需肥料。乐清县东部多冷水田，仰赖玉环供应大量蛎壳。当时漩门内外因潮流冲积，蛎壳取之不竭，十几只车壳船每日捞获量不下50吨。所以要十余艘三、五吨的小卷底，川流不息地运往乐清县东部各口岸。玉环需要大量的竹制农具、家具和薪炭要从乐清的大荆等地运来。因此，海上交通逐日开展。

民国初，温州曾有“鸣发”、“永环”等小轮行驶坎门、楚门，此后陆续有“运大”、“利泰”、“祥丰”、“金国”、“泰安”、“复兴”等小轮营运，因船只吨位甚小，不适载货，货物仍靠帆船运输，所以这些小轮的经营效益不是很好，时停时续，船只屡屡更换。到了民国3年（1914），开始有温甬线的

轮船在坎门停靠，本县航运面貌始起了重大的变化。

民国三年，温州、宁波等地的一些轮船局和轮船公司，应坎门郭源顺商号的要求，先后将行驶甬温线的“广济”、“永川”、“永宁”、“宝华”等轮船在坎门停靠，承接客货。民国5年（1916），上海一轮船公司申请开辟坎门航线，经交通部批准，咨浙江省政府，以“行驶上海——海门的‘平安’轮准予新辟航线，兼弯坎门。”上海其他轮船公司经郭源顺店主郭云翔的游说，也看到坎门有利可图，陆续将行驶沪温线的“新宝华”、“大华”、“益利”、“新海门”等轮在坎门停靠营运。一个时期坎门日有过往上海、宁波、舟山、海门及温州的轮船停泊港口接运客货，出现未曾有过的繁荣景象，为此也促进了本县各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郭源顺店主郭云翔善于经营，郭源顺号在他接手后蒸蒸日上，不仅在本地名噪一时，而温、台一带也颇有名气。他锐意进取，懂得要发展自己的商业，必须有交通运输业的配合，玉环地处海岛，依靠的是海上航运，为此他躬亲奔访各地，游说轮船来航，首创北线海轮与本县连结。他在本县的航运史上，是作出过贡献的。

自坎门沟通了沪、甬、椒、温航线后，举凡本县境内的客货运业务、船期挂牌等事项，一概由郭源顺号代理，并指派专人司其职。从开辟航线以来，客货运输畅通发达。郭源顺代理进出口船务，办事认真，服务周到，博得了本县群众和各地轮船局的一致好评。

坎门航运得到空前的发展，楚门也急起直追。但两地的发展途径不同，坎门是靠外地的力量来发展航运，楚门则是靠自力来发展航运。

民国10年(1921),楚门航商陈楚材、韩约渔,领头倡议建轮船公司,开辟上海航线,得到外地同人的响应和本地殷商的赞助,遂以13万元购得469吨的海轮一艘,名之为“瑞平”在平阳、瑞安——上海一线营运客货,往返均在楚门的花岩浦停靠。瑞平轮船公司设在瑞安。不久,南线拓展至福建沙垵,营运十分兴旺。五年后,再置一艘326吨的海轮,名为“新瑞平”,在同线营运。两轮交替在楚门停靠,始终保持十天一班的上海航期,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停航。

在此以前,楚门市场供需,都仰赖于温州,自开辟上海航线后,大宗货物流通就不再靠温州转口了。楚门大商号有同和、元美、公记蛋行及中小商号有数十家。同和、元美经营南北货,门市以外,还对附近集镇的商家批销,生意做得很大;公记蛋行虽然经营单一,但收购全港北的鸡蛋,直接运往上海,单就这一项,营业额便已很大,而它还销化肥、豆饼、煤油,全楚门化肥为其独家垄断。豆饼、煤油虽然同和、元美两家也经营,但销量不能与公记伦比。楚门仅鸡蛋运沪,一个航期就近50吨,加上其他农副产品出口,合计达百吨之谱。上海和福建运入的煤油、豆饼、化肥、南北货、黄豆、面粉、布匹、卷烟、洋杂货等,其数量也可与运出量齐观。楚门有充足的货源和纳量很大的需求,所以两轮在楚门线,客货运输十分兴旺。

1937年抗战爆发后,沿海轮船全部停航,本县因地处海岛,航运攸关民生命脉,所以帆船运输不曾停止,工具也不断的有所补充和更新。只是海上不靖,既有日寇军舰横行霸道,又有如毛的土匪劫人越货,航商船民处境十分险恶。抗战八年,玉环航运业步履维艰。

1945年日本投降,与祖国隔绝了50年的台湾光复,大陆航商竞相前往经商,坎门航商率先前往,首航得利。信息传开,全县纷纷建船,大船小船竞相出动。坎门人梁祥焕父子,驾驶了5吨的“乌良船”,漂洋过海直扣基隆。他运去带鱼,运回红白糖,一次便获利甚丰。坎门运去的是水产品、黄酒,楚门运去的是黄酒和土制卷烟,都告获利。一时,台湾海峡船舶往来如梭,全县掀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台湾经商热。航运业由长期的压抑而得到复苏,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下半年的一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

台湾光复通航后,楚门毛止熙、毛光熙兄弟置150吨的机动船“航琛”,并置70吨的帆船“天益”;殷商金英昌建100吨的机帆船“金鹰”;坎门叶木富原已拥有7条帆船,为竞争优势,1946年再建一艘152吨的“新建兴”。至于别家营建中小船只,就难以一一罗列了。

叶木富是坎门的航商大户,肩挑小贩出身,1931年起始建船商运。他兄弟七人,全家28口,几个主要成员能经营,善管理,又仗着自己脚手多,生意越做越大,家业积累得很快。他的船舶,南达福建广东,北到江苏、山东,都有它的航迹。他前后共建船9艘。

另一家是郑显元,他自福建迁居坎门不久,曾和福建人合资建了5条船,都定港在坎门。其他人建一两只亦商亦运的,或者是建大钓船亦渔亦商亦运的,为数众多。

在楚门,航商大户为陈楚材、韩约渔两家。

陈楚材,原无恒产,青年时知遇于楚门源和栈帐房马先生,受其赏识和资助,先租小船走内港芙蓉,后租大船走宁波,一帆风顺,发迹很快,几年后便建起了几十吨的“金益发”,并几度扩建至100吨。1921年他与韩约渔等筹建了瑞平轮

船公司。在此前后，他还为外地同人合建了各为125吨的“金同益”、“金三益”、“金永益”等三条帆船，在福州、温州设有行号；在上海有公司股份。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是他的航运事业鼎盛时期。

韩约渔，楚门山外张人，出身世家，父辈建有船舶从事航商，韩氏继业时有百吨大船“韩通利”号。因初执业不谙管理，曾经大受挫折，以至典卖田产抵补。后就教于陈楚材的悉心指点，使韩航运入门，终成行家，很快便扭亏转盈，尽复旧业。其后韩陈两家配合密切，协作有年，故有共建瑞平公司，开拓上海航线的宏举。

韩氏的事业主要投资于瑞平公司，后期瑞平公司改组为美利公司，韩氏股份占有40%。

抗战初期，玉环到上海、宁波、温州航线的轮船，仍为过去一样照常行驶。“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全国规模的抗战开始，日本海军对我沿海实行全面封锁，全国各港口的华籍轮汽船全部停航，玉环的航运业处于停顿状态。

各地的航商和轮船公司，为了保障自己所属的轮汽船的安全，陆续和一些外国，特别是和日本同盟的国家的轮船公司挂钩，由他们出面经营，改变所属轮汽船的国籍，悬挂外国旗帜，并雇用一名外国人担任船长，继续航行于沿海。此时，瑞平公司的两艘轮船也入外国籍，瑞平轮改名为“美达”，新瑞平轮改名为“美发”，由葡萄牙航海公司经营。瑞平公司也改组为“美利公司”。

但是，两艘瑞平轮改籍外国后，仍然没能幸免战争所带给的厄运。“美发”轮改航上海——南京线后，在南京陷落之前，仍遭日机炸沉于长江；“美达”轮虽则喘延到抗战胜利，

在1945年下半年行驶沪甬线时，也不幸在吴淞触美军敷设的水雷沉没。据说这一航次载客近千，仅二百余人获救，大副亦在殉难之列。

陈楚材在损失了轮船股份财产之后，虽然元气有伤，但他还有独资船“金益发”和其他合资船的股份和岸基公司股份，实力还相当雄厚。无如灾祸接踵而来，继“美达”轮丧失之后，他的船舶接连出了重大事故，有的触了礁，有的遇风损失了承运货物。船舶损失以外，还要负责巨大的货物赔偿，这才使得他智穷力竭，难以招架了。1947年，他忍痛卖掉最后一条船，也就是他最先建造，象征他发迹的“金益发”号。

陈楚材卖掉“金益发”之时，正是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初，“金圆券”以1:300万回收“法币”，政府想以此来抑止物价上涨，挽救频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物价仍然扶摇直上，涨风较前尤烈，没容陈氏清醒过来作出反应，转瞬之间，他手头百吨大船的价款，已不能买一只小舢板的币值。他惨淡经营一生，建立了颇具规模的航运事业，至此也就悲惨地结束了！

韩约渔主要投资于瑞平轮船公司，失去两轮后，经营美利公司一些岸基财产，后期在船运业上没有大的作为。

毛光熙兄弟的“航琛”，临解放在上海被征用，撤退军政人员去台湾，遇风沉没。

坎门叶木富经营的9条船，在战争年代丧失了6条（其中1条系因风沉没），仅3条幸存到解放。郑显元建的5条船，被日军烧毁1只，海匪劫去1只，幸存3只。

解放前夕，楚门船舶只有40只，总计不到500吨；坎门除渔船外，不到30只，约计400吨。

玉环航运业的发展,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航商船户经历的漫长岁月,是在多重的压迫下呻吟地过下来的。他们有“四怕”,那是:

一怕日寇。抗战期间,日本海军封锁沿海,横行霸道,绝灭人性,商船遇上无不遭殃。因此航商船只出航都尽量靠岛屿山边行驶,以便躲避和逃生。如果被敌舰追及,船上人挨个儿一顿毒打后放掉,那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要是被搜出一点可疑的东西,如中山装一类衣物,那就凶多吉少;如果被搜到防匪的枪支,更是必死无疑,休想能留一个活命!楚门鲍定招运货到沈家门经商,途中遇上日舰,全船人被关进舱里放火活活烧死;坎门有条船遇上日舰,全船人被铁丝穿上锁骨,成串的推下大海。侵略军杀人不眨眼,其手段之残忍,旷古未闻!

抗战八年,本县船舶被日寇烧掉的仅坎门一地就达两百余艘。

二怕海匪。民国时期,海上土匪如毛,在星罗棋布的岛屿之中,到处有海匪潜形露迹,有十几人、几十人一股的,也有三、五人一伙的。大股的在航道拦劫,出动三、五只船围猎过往商船;小股的,驾轻舟“河泥溜”,在支流小港追猎小船孤帆。海匪劫人越货,手段也很凶残。这批“跳帮”上船后,对被劫者先是一顿“发财柴”,然后迫令交出隐藏的钱财,达不到目的,再敲打,常常有被敲打致残致死的。船上的财货,好歹都被劫走,至于人和船是否“带走”,则视有否被赎取的可能来决定。对于船质还好,则人船都要“带走”,只有对那些破漏不堪的旧船,船上人又是穷苦力,才放掉。被劫去的人船,“分等论价”,并威胁限期不去赎取,便撕掉“肉票”(“肉票”是指抓去的人,“撕”就是杀害)。楚门一个姓方的商人,有个

小孩落入匪徒魔掌,因筹款一时困难,没有如期去赎,匪徒就残杀了小孩!坎门郑显元一艘55吨的“乌榄船”,春间被劫一次,他凑足黄金、银元赎了回来。到了秋间,这条船又遭匪劫,他无力赎取,只得牺牲了船。船员只好“听天由命”。海匪见他们都是穷船工,在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来,在荒岛上关了一些时间后也就放掉。16名船员历尽艰辛,乞讨半月才返抵家中。民国十几年,行驶于温州、楚门、江夏的小轮“运大”、“利泰”,都曾遭匪抢劫。“海水不燥贼不断”,这是航商、船民对海上永无宁日的同声浩叹。

为了对付海匪,航商们曾一度购置了枪支,请发“枪照”,在大船上配置七、八支、五、六支不等,并且结队出航,成为一支可观的武装船队。海匪也不敢贸然再去碰它们,而袭击的矛头却专门指向没有抵抗力量,孤帆独航的中小商船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线停航,我县商家都在温州进货,货船不时在瓯江口的大门山和岐头海面遭匪洗劫。船民摸到了海匪出没的规律,采取了规避措施,拣黑夜或坏天气(海匪不敢出窝)出航。这样,遇匪的频率虽然减低。但是航行自身带来了危险性。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冒风险。

三怕官军。官军名曰“剿匪”、“护航”,实则扰民祸民,敲诈勒索,为其惯技;公然抢掠,亦为常事。官军上船检查,目的是为钱财,如果达不到目的,或得不到满足,就要诬民为“匪”,也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航商船民之惧怕官军,甚于惧怕盗匪。1948年坎门叶木富的“新建兴”号从山东返航途经舟山时,原拟稍事逗留,补充给养,但风闻张乐部队即将到来,就不顾气候变化,仓皇起锚南归,结果在积谷山洋面遇台风沉没。“新建兴”152吨,只知船员32人罹难。此航

空船南返，遇埠停靠，一路搭客，因全船无一生还，搭客若干人，就无从查悉了。

四怕风害。解放前，没有气象预报，灾害性气候转变，全靠老大的经验看云色、海水去估测，一般说，近距离发现预兆，尚能避免。要是远航的即使估测准确，往往灾害已临眼前，在苍茫大海之中，大祸也就无法避免了。所以说，“撑船人和阎罗王只隔一层板”。在渔村，风害到来之前，滩头满是伫望归帆的人，总有一些盼不到亲人归来的不幸者。这一点，航商船户同渔民，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年年有海损，年年有新的寡妇孤儿。

说 海 塘

董 诚 安

一、沧海桑田话海塘

玉环位于瓯江口外，地邻温台，由大小岛屿及半岛构成，大半土地处于茫茫的大海包围之中。古诗曾有描述：

永嘉江外水连天，一望苍茫不见边。

海岛孤悬别有村，潮来潮去水当门。

挡潮御咸，主要靠海塘。海塘是我县沿海地区农业盐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屏障。

从史志资料及实地调查可知，玉环沿海的几块小平原，都不是天然生就，而是无数先辈以精卫填海的精神长期辛勤劳动的血汗结晶。他们一代一代挖土运石，填筑起一条一条海塘从“海龙王”手里一亩一亩地夺来的。

《玉环古诗选》(1982年版)三百首，其中直接和间接写海和海潮的将近三分之一，从中也可窥见沧桑变迁的历史痕迹。试看清代的几首诗所述：

林羹梅《听潮楼》：“几番听到潮声急。”

楼在芳杜钱岙（今前赵村），宋时建。芳杜古称荒涂，原是荒凉的滩涂。

王指南《天马山即景》“尚有残坊遗迹在。”

注释说，山上有观潮石遗迹。世传南宋著名学者朱熹曾在

此观潮。

张英风《南浦渔舟》：

“南浦泛渔舟，钓得鲈鱼至。”

楚门山后浦旧时通海，一直通到南门城脚，故称南浦。

章鼎《渔舂》：

“何来渔艇泊山前？剩有桃花开水边。”

表明环城渔舂，到清代早已沧海变桑田，只存其名而已。

海潮给沿海人民带来渔盐之利和海运交通之便。所谓“海天日暖鱼堪钓，”“潮涌帆樯商舶集。”

海潮赋予玉环独特的自然胜景，引得多少诗人吟咏赞叹：环以大海根太阴，空青水碧淡相映。

激扬潮影秋风里，指点蓬瀛晓日边。

海山胜景，令人向往。

但是，海潮对沿海地区也曾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损失。

《玉环厅志》关于潮害曾有多次记载。最严重的一次是八百多年前的“并海”。

公元1166年，宋乾道丙戌二年秋分夜，天富北监（今干江盐盘一带）飓风骤雨，水暴至，没膝及屋沿，顷刻“并海”。千余家市肆皆尽，死者数万人。（死者人数可能有误——编者）

建国后，1953年8月16日台风登陆，冲塌海塘16条，损坏水闸2座损失船只38只。

1956年9月3日，11级强台风侵袭，正逢大潮，海塘、陡门遭受重大损失，海塘被冲刷一半，约57条，共长54公里，占78%。全部倒塌10条共长11.82公里。陡闸严重损坏2座。

1962年14号台风登陆，冲倒冲坏海塘106处，损失渔船75只。

1974年8月17——20日，天文大海潮加13号台风，潮位高

达黄海高程4.22米，高出历年最高潮位0.5米以上。全县海塘80%计61.74公里过水，海塘倒塌、缺口共12.378公里，海水倒灌，淹没田地10086亩（其中地2700亩），经济作物2716亩，盐坦1万多亩，淹没房屋1016户，2592间，其中倒塌121间。原盐损失4047吨，船只打沉打坏112只，冲走网框1500个。咸潮水侵入内塘，致使农作物枯萎，严重的使土地盐碱化，不能耕作，成为贫脊之地。

《玉环厅志》水利志载：

“陡门头庄天安塘、密莺塘……浦口建成木陡闸以御海潮。”按语：“此闸岁修不固，加以毗连盐塘，斥卤贯注，河渠浅狭，蓄水无多，稍旱则水落半河，即成咸浸，不堪车荫，往往各乡丰稔而此独歉收，最为脊苦之区。”

又如：1946年桐林野猪坑塘倒塌，咸水淹没农田700亩，三年不能种粮。并使内塘1816亩严重减产，损失稻谷64万斤。人民生活极为贫困。

建国初，下陡门后塘闸板破旧，短缺，漏水严重，塘股低矮单薄，51年咸潮从塘顶涌进，全塘200多亩田严重减产，每亩只割100多斤谷。

沿海群众为了御潮抗台，每年要花大量劳力、物资培修海塘、疏浚浦沟，防汛抢险。

二、“楚门塘捍万顷田”

海塘的历史，据周魁一《农田水利史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见于文字记载的海塘是浙江钱塘，钱塘的来历，有几种说法，主要有二：

1、说钱塘是花钱买土筑成，故称。

2、钱武肃王射潮筑塘。为纪念钱镠之功，故名。

玉环何时筑海塘？不详。有文字记载的，据《玉环厅志》有三塘一闸，都在楚门半岛，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1370）筑，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它们是：

清港徐都塘、田马东岙塘和楚门南塘，以及凡塘九眼斗门。

玉环大规模围筑海塘，开垦涂地，当在清代。雍正年间玉环第一任同知张坦熊，在《展复玉环论》文中，力主围垦，指出：“在玉环各岙口涂地玉环乡老岸须筑塘坝渐次成田者约六、七万亩。”他不仅积极主张，而且躬身实践。

1727年（清雍正5年）3月，张任太平（温岭）知县兼理玉环垦务，招募永、乐、瑞、平、太等县之民，计口授田，围涂开垦，先后达七万余亩，并发动兴修水利。

这一年在四都陡门头（今环城）筑塘，长4里，遇山洪暴发，大水将海涂冲开一条沟浦，便利运石筑城，以为天助，故名天开塘（河）。

增修十五都（今田马）东岙塘。

1730年上半年招垦民戴可玉等修筑楚门南塘自马屁股至丫髻山北，长5里。在西青山右建三眼陡门。

三、解放花开幸福来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建国初，党和政府大力发动群众维修加固海塘，修理、改造陡闸，锹河浚浦，提高防汛能力。

1951~52年个别小规模围垦，53~54年着手较大规模围垦的前期准备工作。

51~52年桐林乡围野猪坑塘长0.7公里，面积100多亩。

围垦千亩以上的第一条海塘是解放塘。

解放塘北起环城乡礁头，南至西台乡车水头，全长4.25公里，加上塘套共4.6公里。分南北二段施工，围涂面积共2810亩。其中北段1410亩，建海闸3座共6孔。其中北闸3孔，中闸1孔，南闸2孔。

北段于1955年2月25日开工。先建闸、挖浦，后筑塘，斩港。55年8月初步完成。紧接着于55年秋南段开于工，于56年竣工。完成土石方10多万方，花工11万工，资金13万元。

1974~76年继续围解放二塘，塘长2780米，面积3200亩，于南端建海闸1座3孔。

县成立兴筑解放塘指挥部，县府秘书林国祥任指挥，城区张帮才具体负责，县长黄乐平带领农村水利局，城区、环山、环海等有关单位和区乡代表到现场蹴泥涂、涉浦沟，勘察塘线，组织座谈等。

海塘一筑成，即着手开发利用，试种咸青、大麦、水稻、番薯，获得成功。兴修排灌河渠、涵闸、简易公路、宿舍等。

1963年6月筹建农垦场。逐步发展成农、林、工综合性农场。

1956年开筑干江洋坑塘，该塘位于干江东部，从棺材岩到小岙咀，塘长2.2公里，设海闸2座，围涂2400亩。筑成后，58年5月续围外塘，塘长1470米，塘顶高程6.37米，围涂面积里外合计5800亩，均晒盐。

围塘工程先后由杜可勤、林大增、阮福民等负责。

1956年2月开始围桐林(今沙门)幸福塘。同时开工的有陈屿古顺合筑的长屿塘。

幸福塘自馒头屿至灵门,长1500米,围涂1500亩,1958年2月建成。涂500亩种棉花外,晒塘100亩。幸福塘工程由余天顺负责。

幸福塘,是桐林人民继兴筑翻身、建设二塘后的一条大塘,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寻求幸福的一项大事业。筑塘初,有民工在木溜板上刻上字句表达心意:

人民力量胜过天,修筑海塘变良田。

海塘筑成变白米,人人心里都喜欢。

幸福塘建成,确实造福人民,泽及子孙。不仅增加土地面积,还改善灌溉排涝条件,发展生产,为以后大规模围垦五门万亩工程积累经验,培养技术力量,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但在筑塘过程中,由于自然气候和政治情况种种原因,历经艰难挫折,备尝辛酸苦辣。

该塘土质为沙性海泥,塘址风大浪狂,两年中连遇五次台风,刚筑离水的海塘3次打塌,几乎全部冲毁。当时水利条件差,产量低,群众生活困难,不少人带茹丝汤来打塘,一时间,干群思想波动,灰心丧气,埋怨叫苦。塘名幸福塘,群众说筑塘人苦死,说这是“筑万里长城”,我们是万喜良。有迷信思想的人说“灵门是沙龙地,”除非用童男童女“祭塘”,否则塘是筑不牢的。然而乡、工地领导不动摇,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塘筑成。这不仅要有热情,更需要科学精神。“沙龙地”固然是无稽之谈,但取土坑愈来愈远,土料愈来愈少,都是严酷的现实。工程领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用领导、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吸取老农筑塘经验,进行

科学分析,改进施工方法,针对当地沙性土,水深浪大的特点,不能照搬一般的内港筑海塘的方法——先筑土,后驳石,改用碎石铺基底,土石并进,边填土,边驳石用大块石,重二、三百斤,土石之间充填一层碎石作为滤层,改进了设计,土堤保住了,海塘终于筑成,筑成后在内坡和塘顶全线种上鸡干草护坡。幸福塘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造福人民的海塘。筑塘领导人余天顺在群众的心目中也由“秦始皇”变为“夏禹王”。

建国后围垦规模最大的是桐丽五门工程。五门塘位于幸福、建设、立新塘外,包括灵门、步门、小门、大门、西沙门。原计划塘线长2.2公里,围垦1万亩,一个公社兴建。1966年开工,通过施工实践,修改设计,为避开深水堵港,大门段塘线上移,塘线增长到3公里,塘高7~8米,围涂面积减为7636亩,但缩短了施工期,提前于1986年12月23日合龙。

堵港工程规模最大的是漩门深水截流,全省罕见,全国小有。

漩门港在玉环岛和楚门半岛之间,港面宽144米,口门最深负43.5米(航海高程),潮流湍急,原始最大流速5.4米/秒。当潮水涨落交替流经狭窄的口门时,漩涡回流,汹涌咆哮,声闻数里,素称“龙窝”“险峡”。船只过港峡,稍有不慎,潮候掌握不准,即被漩入涡中,连船带人葬身海底。

漩门堵港是开发乐清湾的基础工程,乐清湾水域面积辽阔,可围垦5.6万亩,海涂促淤13万亩,蓄淡4000万立方米,潮汛发电55万瓩。开发利用漩门湾是玉环人民祖祖辈辈的愿望。早在1954年县里就向省地报告,要求堵港。

一九五八年县组织堵漩门,不久下马。

1975年5月漩门堵江工程开始筹建,11月成立漩门堵港工

程指挥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省科委、省水电局（即厅）的指导下，水电部十二工程局、省钱塘江工程管理局等14个单位通力协作，对勘测设计抛坝方法等课题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和科研工作，全县人民经两年艰苦奋战，于1977年5月23日大坝合龙，同年国庆节比原计划提前一年胜利竣工，公路通车。

漩门大坝总高50米，顶宽12米，顶长144米，土石方52万方，投工76万工。大坝建成，使险峡变通途。

经过建国后30多年建设，全县海塘有所发展和提高。建国初1956年调查，全县海塘（第一线）63公里，其中驳石仅21公里，只占1/3。海闸60座。到84年止发展到81.152公里，其中驳石长62.078公里，占77.8/%。并兴修了长屿塘、干江南塘二条“标准塘”。海塘防台御潮能力提高。

到1987年底止，全县共有大小海塘205条（包括二、三线内塘），其中清代及清代前建134条，民国19条，建国后52条。

捕 鲨 史 话

王克宏

一提鲨鱼，人们不禁会立刻瞠目结舌，大有“谈鲨色变”之概。故而，民间流有这样的说法：“将你沉海喂大鲨鱼！”；查《玉环厅志》，还有一段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

“道光年间，鸡冠山渔船出洋，有海鳅浮毙水中，割其背肉，满载十余船。始用钩索大商船尾曳上滩头，剖其腹得人手足爪甲数升。肉不敢食，煎油以燃灯，锯断脊背，每节可容谷数斗，人皆取之为白……”

文中“海鳅”即为大鲨鱼。因此在文人墨客的一些文章中常见有“恶鲨”等用语，无形中给人的印象，似乎大鲨鱼就是当今大洋中最凶残无比的霸主！——“剖其腹得人手足爪甲数升”，岂非令人寒心裂胆？

其实，为鲨者又名鲛，并非一概如此凶悍残忍。查鲨鱼家族多达七十余种。体小形平的“真鲨”、“星鲨”、“角鲨”、“白鲨”、“虎鲨”之类，自然构不成对人类的威胁，就是体长二十余米，体重万余斤，被列为现代海洋中最大鱼类的“姥鲨”、“鲸鲨”，其实也是一种性情温和、感觉迟钝的板鳃鱼类。它们虽然口大若桶，但牙小且短，专食洋中的浮游生物。即使有人体进口，它也根本无法嚼食，何能“以人为食”？特别是“姥鲨”，玉环渔民称它为“憨鲨”。传说有“憨鲨”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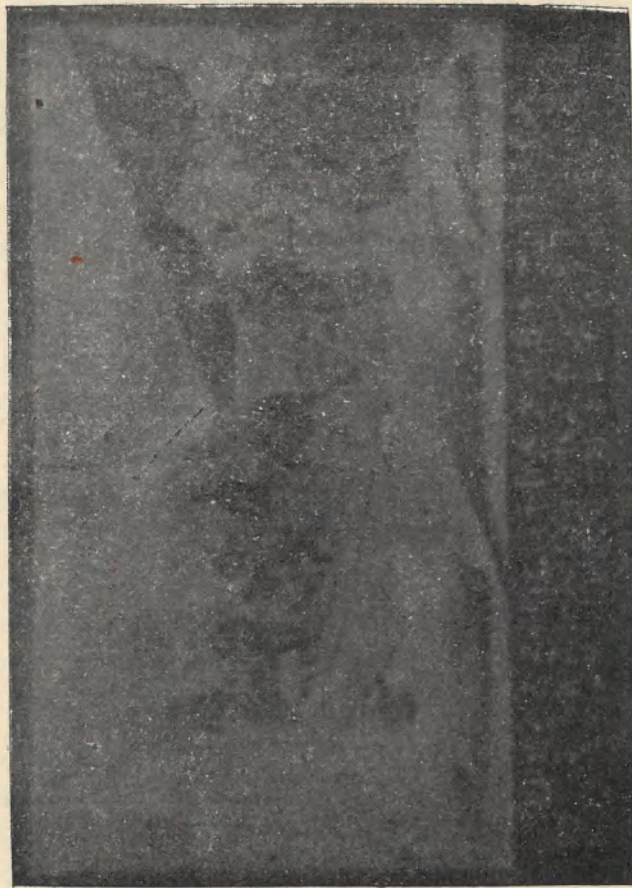
游海面憩息，被渔民误认为小山而靠“岸”去烧饭，结果在挥斧劈柴时惊醒“憨鲨”，渔民早已逃之夭夭了，“憨鲨”才开始渐渐沉没海中……当然，传说的可信性我们毋须去追究，但“憨鲨”之“憨”，我们从中足可略见一斑了。

每年清民前后，是大鲨鱼来我县沿海活动频繁之时。原因是此时春暖花开，近海洋面“虾几”、“黄鲫”等浮游生物盛发，大鲨鱼就乘机从热带大洋迴游到沿海来觅食。它们悠然地飘浮在海面，张开大嘴，让一片片红褐色的“虾几”、“黄鲫”群，毫不费劲地顺着潮流流进它们的口腔，让它们美食个痛快。这时它们背脊上那枚三角状的灰色“背鳍”，高高耸插在波涛之间，远远望去活象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有经验的渔民一见就知是遇上大鲨鱼群了！

但是，自古以来我县渔民每每遇上鲨鱼群，都是绕道而行的。这不是说渔民“怕鲨”，而是他们苦于手中无术，还不知如何去擒捕大鲨鱼。

我县历史上，第一次用文字记载清道光年间“捕获的“海鳅”，是“浮毙水中”而获的。

据我县国内著名无线电专家曹仲渊先生回忆，民国初年坎门渔民曾捕获一巨鲨，“长及十丈”，“乡绅李福寿以三元购得脊骨一段，直径与八仙桌同”；1932年3月初八，坎门教场头渔民捕获一大鲨，据当时原始记录：长348寸，高99寸，口大56寸；1937年12月，坎门东首头（今西台乡）渔民捕获一大鲨，体重约2,500余斤……这些大鲨鱼当时曾赢得“渔商争以巨金相构”，轰动了整个玉环城。但据老渔民们回忆，这些大鲨都不是渔民主动去捕获的，而是大鲨自身“浮毙海上”或误入定置网框，实属“自投罗网”的。



玉环渔民正式开始捕鲨作业，那还是解放后的1950年春汛。

当时西台乡灯塔村有一名老大叫郑达法，他从十二、三岁起就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二十岁开始当老大。长年累月，战风斗浪，他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海上技能。只因解放前为资本家出力卖命，连糊口都有困难，自然没有去与大鲨鱼拼搏的兴趣。解放后，渔民们当家作主了。郑达法想，一条大鲨鱼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又是从事渔业生产时垂手可得的，何乐不为？他向父亲郑显根说了自己的想法后，立即得到父亲的全力支持。

原来郑显根也是一位从年轻开始就名闻乡里的红老大。他早年曾因受不住村里渔霸的欺压，逃往福建省晋江县的青乌避过难。青乌是海上渔业生产的起源地。青乌渔民历来有十分丰富的海上捕捞经验。就在那段时间，郑显根亲眼看过青乌渔民捕获的一条条大鲨鱼，还亲眼见了他们的捕鲨工具，这是一枚形同“带鱼钩”、长约50余公分的大铁钩；钩后绑着一根约四、五米长的大竹竿，用于操作；竿后系着一条长达六、七十米的粗麻绳，当作“钓线”。据说这工具既灵光又方便，巨鲨很容易被擒获。

郑达法听了父亲的介绍，就象得了一把开启智慧宝匣的金钥匙。他再根据自己多年的海上经验，当即动手仿制了一枚捕鲨铁钩，并将它配备成套，当年春汛就带着出海试产起来。

那一次，他在披山洋水深约二十余米处遇上了大鲨鱼群。因缺乏经验，他只瞄准其中一条较小的“老鲨”，小心翼翼地驾驶小钓船靠了上去。小“姥鲨”傻头傻脑，只顾自一股劲地在品尝着“虾几”、“黄鲫”的美味。

古话说，大鲨鱼在端午节前都是瞎子，待到端午节划过龙

船它才会开眼。当然这只是传说。但大鲨鱼眼小又无瞬膜，视力十分微弱，加上感觉颇为迟钝，因此小钓船靠身，它也漠然无知，这完全是事实。

当时郑达法身立船头，手提捕鲨铁钩，说时迟，那时快，对准小“姥鲨”的下腹就是狠狠一钩！却不料，鲨鱼皮厚且粗，任凭郑达法已花九牛二虎之力，铁钩还仅扎进几公分。这时，小“憨鲨”似乎也感到有几分疼痛，就摇着尾巴向大海深处钻去了。郑达法牢记父亲传授的办法，立即抛了手中操纵的竹竿，拼命拉住竿后的粗麻索，借助巨鲨下潜的一股傻劲，只听“嘣嘣”几声，铁钩就顺利扎进鲨鱼腹深处了！只见船侧洋面，顿时泛起了一股股红色的鲜血。郑达法知道得手了，立即指挥副手，迅速放开舱中绳索，小钓船就象装上马达，跟着大鲨鱼飞速地向外洋驶去了……

首次试验，旗开得胜。郑达法成功地捕获了一条重约二十多担的小“姥鲨”。“鲨姥”虽小，但开创了我县渔民有史以来利用工具捕获大鲨鱼的记录。他的行动证明，大鲨鱼并没什么可怕。渔民完全可以去征服它！捕鲨铁钩虽然还显得有点土气，但捕起大鲨来却得心应手，很容易在渔区普及。故而，自此后四乡六岙的渔民兄弟都纷纷前来向郑达法领教、取经，郑达法均一一加以耐心传授。就这样，一个捕鲨热潮很快在我县坎门渔区兴起了！特别是灯塔村的渔民热情更高，几乎人人动手制作捕鲨铁钩，船舶必备捕鲨工具，每当在洋面碰上大鲨鱼群，他们就争先恐后，纷纷竞相试捕。据统计，仅1953年的一个春汛，坎门渔民就捕获了一百多条大鲨鱼。郑达法一船就捕了七、八条，开创了我县历史上捕鲨产量最高记录。

这些大鲨鱼重的有二百多担，最小的也有二、三十担。当

时四乡渔贾，纷纷云集坎门前沙海滩，穿梭在如山的鲨群之间，与渔民们磋商着鱼价；各地赶来看热闹的更是人山人海，整个海滩人群熙攘，笑语连天，渔民们个个欢天喜地，畅怀豪饮，就象遇上了千年难逢的大喜事。更有小孩们戏闹在鲨鱼群间，高兴地用梯子爬上鲨鱼脊背玩耍，就象在骑动物园里的大象。

大鲨鱼的经济价值十分可观。一条鲨鱼的收入往往超过渔民一风收入的四、五倍。加上鲨鱼肉可食用或制作鱼粉、鱼松；肝可制鱼肝油；皮可制革、作菜；骨可制胶；鳍干可制鱼翅；唇可制鱼唇；吻侧的软骨还可制明骨，这些都是十分名贵的珍馐佳肴，其经济价值就更显得昂贵了。大鲨鱼确实浑身都是宝呢！

郑达法为坎门渔民首闯了捕鲨作业的致富门路，为我县的渔业发展史写下了光辉一页。为此，他在1955年，光荣地被评为全国首批劳动模范，还曾代表全县人民赴京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为玉环渔民争了光，为全县人民争了光！

当然，捕鲨也并不象我上述所说的那样轻松、简便。捕鲨也是充满艰难与风险的！

首先，因当时的生产工具较为落后，渔民们又缺乏捕鲨经验，往往在提钩扎鲨时，因不慎双脚踏在绳索堆上，这样当大鲨鱼急速潜逃时，就会连绳带人被拖下海去，轻则手断足残；重则葬身鱼腹。因此，在坎门地区因捕鲨而造成终身残废或破家荡产者甚多。

后来，捕鲨稍有经验了，渔民们的胆量也随着增大，他们就改用小舢板前去捕杀。结果小舢板被大鲨鱼拖翻，造成船沉

人亡事故的屡见不鲜。

有时铁钩没扎准大鲨鱼的要害，大鲨拖着绳索在外洋畅游几天几夜还不见精疲力竭，渔民们只好跟着抛风颠浪，遇上风暴则无法逃身；即使风平浪静，小钓船又拿精力旺盛的巨鲨奈何不得。这样，渔民们最后只好忍痛挥斧砍断绳索，放大鲨鱼去逃生了。渔民们在大洋广海中白白辛苦几昼夜不用说，还要赔上鱼钩、绳索，真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呢。

有时鲨鱼上钩了，而且也钩准了要害。但就在大鲨鱼奄奄一息之际，突然绳断鲨逃，原因是鲨鱼皮糙如锉，绳索在其身上受波浪的推磨，早已不知不觉被磨断了。遇上此情此景，渔民们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就是退一百步说，大鲨鱼已被捕获了，也已被顺利捆上船舷。但小钓船要将近万斤的庞然大物从远洋拖回港口，又谈何容易？无异就象蚂蚁在搬动一只缘头大苍蝇！洋上有风，小钓船尚且还可张帆前行；碰上静风平浪，就只有靠几个伙计苦摇大橹了；若是遇了顶风逆浪，那苦状更是不言而喻！灯塔村老大廖岩生，一次曾捕获二条大鲨，他将鲨鱼分捆在小钓的左右两侧后，仅从披山洋驶回坎门港，就足足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一路上，伙计们摇肿了手臂熬红了眼，现在回忆起来他们还往往不寒而栗呢！

当然，要是在现在，机帆隆隆，劈波斩浪，捕鲨自然是方便得多了。可惜自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县沿海的大鲨鱼就几近绝迹；八十年代后更是罕见了。渔民们自此以后，出海生产就再也不带捕鲨工具了，捕鲨作业从此销声匿迹。

究其原因，老渔民说这与近海连年横遭污染大有关系。眼下成片海域油渍泛滥，脏水横流，大量的“虾几”、“黄鲫”濒于

灭迹。即便有旺发的日子，它们一般也不再浮游海面，而是活动在半水状态。这样，就是有鲨群迴游到沿海一带觅食，它的“背鳍”再也不会象旗帜一般耸插在海面，人们就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了。

再说近年各地捕捞技术不断现代化，滥捕滥杀的现象屡禁不止，致使水产资源惨遭破坏，这也不得不说是导致大鲨鱼几近绝迹的一大缘由。

近年，我县沿海的张网渔民，偶还捕过几条大鲨鱼，但均属“自投罗网”式的。象53年前后那样，在坎门前沙的海滩上，一眼望去有近百条大鲨静卧滩头的壮观，恐怕日后再也难能复见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玉声社”始末

章奎元

玉环地处浙东海隅，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自清季至民国初年本县向无戏班组织，1926年，城关东门於公远先生首创京班“玉声社”。演员均属后起新秀，艺术水平，不在当时温州府京班之下，遐迩闻名，现将“玉声社”从组班教练起，至没落解散止之盛衰过程，忆述于后。

一、组建京班 聘师教练

玉环县坎门镇艺人杨阿林，原温州“胜阳春”京班琴师，因染不良嗜好，解雇归里，穷途末路，无以谋生。一九二五年寄居里岙（今里黄乡）东山妹夫家，结集当地青少年，教唱京剧，意图学有基础，携徒外出卖唱，聊以糊口。旧社会穷家子弟，在封建制度剥削之下，饥寒交迫，无路可走，得知里岙设馆教戏，视为绝好出路，前往投师学戏者甚众，彼时杨阿林很想组班出演，苦乏资金，未能如愿。后闻县城於公远，关怀桑梓，一向慷慨，亦爱好京剧遂拜访於先生，详告其事，於先生毫不犹豫，慨然允诺。彼此商定于一九二六年春，将里岙原有艺徒汰弱留强，选定宣芳、阿木、阿银、莹火、新法……等几人，迁至玉环县城东门玄坛庙继续教练，定名为“玉声社”京班。

原定计划，先教学折子戏，后排练全本戏，冀望短期内学成开演。可是原有学徒，全属文盲，又无京剧基础，教学进度迟缓，困难重重，于是决定招收有文化，又有京剧基础者为学徒，加快教学，以期速成，提早开演。其时由县城环山小学校长於文祥、坎门小学校长郭穗谦等人积极支持，分别就学校中遴选有京剧基础的学生章奎元、陈庚桃等数人，投师学艺。同时还向温州京剧界招收青少年艺员三豹、阿霖、阿增、任泉兰等，参加搭配排练。杨阿林擅操琴，对教师一职，未能胜任，於公远不惜重金另聘原温州翔舞台大面宜秋（艺名一声雷），乐城舞台大面宏昌，武老生阿永，花衫志岳为教师，经半年多的精心排练，学成戏剧有：

正本戏《牧羊传》、《忠义堂》、《九件衣》、《五子哭墓》、《龙凤呈祥》、《杀子报》、《狸猫换太子》、《秦香莲》、《斩黄袍》、《红鸾天禧》等。

折子戏《渭水钓鱼》、《梅龙镇》、《法门寺》、《打严嵩》等四十余出。

二、茅庐初出 一鸣惊人

一九二七年农历正月初一日，“玉声社”在玉环城隍庙正式开锣公演，从此玉环第一代京班宣告诞生。当天演出剧目（仅演折子戏）《西川图》、《拾玉镯》、《盗金牌》、《取成都》等。演员仪表清秀，唱做俱佳，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翌晨全体艺员，应邀赴乐青瑶岙白马殿演出，当晚观众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玉声社演员，均属艺坛新秀，服装鲜艳，

扮相英俊，嗓音清脆响亮，演出效果极佳，博得全场观众一致鼓掌喝采，庙主十分满意，赞不绝口。原约演期三天，后再挽留续演五天，以满足观众之愿望。

从此玉声社之名，远近皆知，各地聘演者纷至沓来，尔后即在乐清县城、柳市、白象、虹桥、大荆以及温岭大溪等地流动演出。特别在大荆神庙演毕，庙主置酒款待，鸣炮送行，当地群众赞语：“看到玉声社，夏天喝凉茶”。足见当时观众对玉声社十分喜爱和赞扬，到处欢迎。旋即温岭县戏贾，（俗称戏鼓，）赶来聘演，彼此正在订约，又接温州府戏剧公会专函聘演，为温州市新建东门宫神象开光兼开台，演期迫促，事在必行、于是改道温州。

三、温州一炮 誉满鹿城

玉声社到达温州府城时，全体艺员休息一天，养精蓄锐，全力以赴，温州府城京剧人才辈出，班社如林，玉声社要在温州求得一席之地，并非易事。

东门宫为温州府城新建庙宇，规模宏伟壮丽，四周绕楼，场地宽敞，那夜观众成千上万，挤满剧场，人群不时轰动作浪，盛况热烈。其时适逢温州著名京班天声舞台（即金福连京班前身），大三庆、大高升、胜阳春、琴娱社等，集中府城东门一带演出，各班名角，赶至东门宫，装作看戏，实际别有用心；因旧社会同行之间，互相倾轧，克妒成风，对待后进者，不予扶持提携，而是抑制，仇视，甚至打击。故当时玉声社进入温州府时，被温州京剧界老一辈，视为梨园稚子，乳毛未

脱，岂容跻身艺林，争雄角逐。那夜在场看戏各班名角，企图找出玉声社演艺之破绽，报以倒采，一轰使之垮台，滚出府城。玉声社亦知彼等意图，那晚演出，不同寻常，俱各抖擞精神，发挥优点，一丝不苟，小心认真。当晚演出折子戏，文戏《西川图》《翠屏山》、《打严嵩》，演员嗓音高亢响亮，行腔浓郁有味。武戏《九江口》、《金雁桥》，刀枪刺杀，敏捷灵巧，不论文唱武打，演到精采处，观众喝采之声，此起彼落，经久不息，不仅外行辈，齐声叫好，内行者亦无不折服。剧终，各班名角登上舞台，与玉声社新秀首次见面，握手祝贺。玉声社在温州首演成功，深受广大观众好评。

四、楠溪斗台 奏凯归来

永嘉楠溪，为庙神开光，邀聘玉声社与温州府著名京班大三庆斗台（赛演），玉声社自以演艺不凡，堪与匹敌，毫无难色，慨然允诺。玉声社到达楠溪时，获悉老师阿永，志岳，均在三庆班参演，玉声社自认晚辈，甘拜下风，一到楠溪，先向老师拜谒求教，表示敬意。

玉声社与大三庆双方赛台搭在一处，左右毗连，当晚赛演剧目，悉听三庆一方主张排定。“大三庆演《黄鹤楼》、《打花鼓》、《九江口》等，玉声社演《白虎堂》、《拾玉镯》、《太平天国》等，双方阵容整齐，旗鼓相当，庙首鸣炮开锣。

当时两边剧场观众人数差不多，不分胜负，可是大三庆边，不守信约，先发制人，不待《打花鼓》一剧演毕，遂将武戏《九江口》提前出场，并且不从张定边三盘奸细华云龙起演，而从张定边全身披戴孝服，手持船桨，率领全军，提灯笼举火把，並

夹以鞭炮助威，直奔九江口迎敌鏖战。敌方将领，皆以“台锦”、“小翻”“扞背”，“倒扎虎”等武打场面开场，张定边挥动船桨，将敌兵将逐一打翻落水，顿时三庆边台上气氛高涨，火焰喷射炽烈，演来精采热烈，异乎寻常，当即采声四起，观众犹似浪潮，涌向三庆一边争看武打。其时玉声社边剧场，只留下老弱妇孺，寥寥无几，大为失色。玉声社出于无奈，只得效法三庆，将拾玉镯一剧，草草演过，遂将武戏《太平天国》出场，並截取剧中最热闹一节，从张家祥备马赴宴，火攻商荣起演，剧中敌对双方，均以真刀真枪对打刺杀，並夹以三节棍，上下盘旋，左右敲击，亮光闪烁，铮铮作声，观众为之眼花缭乱，神往入迷。盖三节棍一技，难度较高，非功底坚实，演技精湛，不易使用，为一般武生不敢问津。继即火攻商荣，以鞭炮、兰花筒、火药筒等，接连放射，火光四起，满台通红，比之三庆一边，益见精采热闹，顿时剧场之中，人浪轰动，倒向玉声社边，竟看火烧商荣，三庆边观众走散一空，沉寂无人，大为丢脸。三庆边武打演员，火冒三丈，难以抑制，一齐摒弃刀枪，纵身过台，将玉声社边参演者扭住，拳打足踢，一场真实武打激烈展开；三庆边均属粗壮大汉，玉声社边皆是年轻体弱，少气薄力，双方力量悬殊，玉声社无法抵敌，当即停锣歇鼓，逃遁一空。观众看不服气，登台解劝，庙主出面调停，纠纷始告平息。斗台（赛演），仍继续进行，经商定只许演文戏，不准演武戏，免惹祸事，剧目由庙主选定：大三庆演《失空斩》，玉声社演《龙凤呈祥》，作为两班压轴戏。当即双方重整旗鼓，继续开演。

大三庆演《失空斩》饰孔明者，年事已高，皱纹满面，形态衰老，嗓音粗燥乏味，观众望之却步，不感兴趣。玉声社演

员、均属年未弱冠，扮相清秀，嗓音圆润宏亮，演龙凤呈祥一剧，乔国老启唱：“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一段西皮原板转快板，讲究收放吞吐，腔韵婉转动听，全场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掌声，喝采。大三庆边剧场冷静，观众走散，愈觉羞惭难堪。大三庆见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只得急流勇退，不待《失空斩》一剧演毕，提早停锣歇鼓，放弃斗台（赛演）。玉声社单独演唱至午夜三时许，观众兴致勃勃，毫无倦意，自始至终，剧场暴满。当《龙凤呈祥》一剧演毕，收拾场面归寝，观众尚嫌不够过瘾，全场举手喊叫再演，玉声社不能拂逆观众美意，勉为其难，送演采戏《大登殿》一出，意示大家欢乐团圆，斗台（赛演）遂告结束。

总结这场斗台（赛演），大三庆边武打既未取胜，文唱亦告失败，玉声社始终戏胜一筹，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翌晨庙主置酒饯行，船插红旗，沿溪鸣放鞭炮，送出两里许告别。玉声社载誉归来，名震遐迩，不愧为后起之秀。大三庆斗台失败，出乎意料，声誉大受挫折。

五、洪水冲击 一蹶不振

一九二八年初夏，玉声社被聘在永嘉郭溪神庙演出，此庙背山面水，地处低洼，剧场与宿舍相距约三百多米，那夜演罢归寝，正在朦胧酣睡之际，骤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数条溪流，汇集其间，一时水泻不及，须臾之间，平地水满盈丈，遍野成为汪洋，戏台一半没入水中，剧场仅留守夜一人，喊救无援，束手无策，攀登台顶逃命，眼看全部箱笼，全被洪水淹没。雨止水退，启箱检视，服装尽行变色，靴盔成为废物，不能

穿戴，无法演出。於老遭此巨大损失，並不灰心，仍出资重制服装，继续开演。

六、遭遇不幸 闽北解散

玉声社被洪水淹没之后，消息传开，戏价大跌，销路不畅。于是离开温州，沿瑞安、平阳，直至闽北演唱。后据玉声社艺员陈庚桃等回籍言：玉声社抵闽不满半载，疫疠流行，演员染疫不起，重则死亡，无法登台演唱，道具尽行变卖，艺员资遣回籍，玉声社即在闽北宣告解散。

玉声社从组班教练起，至解散止，历时二年，於公远先生共花费银圆四千元，无分文回收。

於公远先生早年致力地方公益，除创办“玉声社”戏班外，还在下陡门筑过堤塘（即解放塘前身），家中曾开设酒坊，当店。由于用人不当，经营无方，全都失败了，后人曾有“塘塌、戏散、酒翻、当店关的说法。”

“别动队”的来龙去脉

张仁坤 李 平

1937年，玉环县县长方引之发动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方自任主任委员，林式民任副主任委员。下面组建四个抗日自卫模范中队，每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分驻坎门、玉城、楚门以及花岩浦（现属龙岩乡）等地。其经费由各乡镇殷实富户捐收。枪支弹药也向各乡镇所登记的富户缴用。人员则由县长决定任免。

当时，毛止熙被委任为第三中队中队长，中队部驻花岩浦。农历九、十月间，自卫队成立之际，毛止熙、张仁坤（二中第二区队区队长）奉命前往温州办理士兵服装。其间，毛会见了温州（第八区）专员蒋志英。

那时，洞头区（尚属玉环）已被日军占领，大门山、小门山以及乌孙背一带被土匪钟玉丰占据。钟抢劫行商船只，并贩卖名片，十分猖狂。温州的海上航运大受影响，地方舆论极坏。蒋志英想绥靖港口，出入安全，便授权毛止熙将瓯江口一带土匪予以收编，其经费概由专署拨给。毛止熙受命归来，立即派毛向清、周帮兴二人赴大门山与钟玉丰、张梅庭接洽。钟、张愿意投诚收编。收编部队命名为“别动队”，钟玉丰为中队长，张梅庭、江××和王诗忠各为分队队长，中队部驻花岩浦的杨府庙。法山头、山外张各驻一个分队。

自此，瓯江口一带行商船只出入，可告平安无事。这时，毛止熙自恃有功，骄傲自大起来，认为玉环县五个自卫中队（包括“别动队”）中，有四个中队（一中姚绍虞、二中许世雄都是他的老友，加上自己的三中和收编的“别动队”）实力归己，没把县长方引之放在眼里。

有一次，方引之打电话给许世雄时，毛止熙接过话筒。方说：我把楚门警察所长蔡又湘调坎门。毛说：最好不要调。话音未落，方即把话筒搁下，不予理睬。事后，我问毛止熙，刚才你在电话中讲得太过份了。毛瞪着眼睛说：我有四个中队，怕他什么。从此以后，方引之对毛起了戒心，想把他打下台去。

钟玉丰自收编后，邪心未改，日间名为官兵，夜间仍下海抢劫，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一次张梅庭带同手下士兵，脱去军装，在白石乡（属温岭县）樟后，绑架了赵姓两家孩子，关押在夜游洞（盐盘海涂外的小岛上）勒索重金赎取。类似情况，不断出现。因而引起百姓共愤，纷纷写状向县、省控告。方引之把柄在手，便利用董（运铎）毛不和，联董攻毛。又因毛止熙对“别动队”失于检点，促使他们有机可乘，扩大事实，上报省府说玉环遍地皆匪，十分猖狂。省府不分青红皂白，令三十三师整师前来进剿。师部先遣营抵玉，营长年逾五旬，老成有余，他视察当地，看到百姓安然务农、经商，与所报事实不符，即复电省府，不需劳师动众，仅我一营即可解决。

三十三师某营以抗日为名，在法山头、花岩浦、山外张等地山上挖壕沟，做工事，日日如此行动计达一个月左右。

工事完成之后，于1938年8月2日（农历七月七日）举行抗日军事演习。三十三师某连长亲自到杨府庙邀请蔡分队长（当兵出身，补王诗忠缺）参观。两人携手同往山上。突然一

声号响，蔡分队长当场受毙，“别动队”所驻三处，均受国军机枪扫射，除枪毙十数人外，其余全部缴械、被俘。其中有数人查明不是土匪交保释放。可惜蔡分队长不是土匪，受此冤枉而死。

钟玉丰自入营后，把家眷安置在楚门小南门，是日，在家闻风潜逃。张梅庭是个烟鬼，躲在烟馆里未被拿获。

至于毛止熙早在七月五日接专员蒋志英电邀，赴温参加军事紧急会议，已被拘禁温州拟予枪决。幸其胞弟光熙多方周转得免一死。

居士林旧记

叶兆先

居士是佛教信徒在家自修者的称谓。居士林即居士聚集活动的场所。

楚门之有佛教居士林，当忆及先叔叶公惠人，先父叶公稚二人。惠叔弱冠负笈杭州，壮而出仕各地，曾任浙江省参议员，参事、咨议及北监场场长等职，卓有声誉。暮年归乡，潜心佛学，晨钟暮鼓，俨若僧人。他精研佛典，颇有心得。乃于1928年倡议建筑佛教居士林，选址西青山。一唱百和，应者甚多。先父学佛，最具热心者，不惜倾家资助。对于鸠工备材，劈山填土，筑岭造路，栽花植树，无不苦心经营，从而得到众信徒敬佩，亦自愿出钱出力，协力赞助，只花一年多时间，大殿即告落成。1930年春节居士林开放，一登殿堂，便见人头济济，香烟缭绕，人人笑逐颜开。如此盛况，直至二月，继续不衰。后来，惠叔家道中落，谋生异地，委托先父主持林事。先父以身作则，凡事带头，依照佛教清规，坚持戒律，苦口婆心劝人向善。其宗旨，即按印光法师教导，以净土法门为主，不求深奥，老实念佛。自己委家事于妻儿，专心办道，深得群众信仰，使居士林事业蒸蒸日上，信徒遍及楚门全区，南至港南，北至温岭，有许多善男信女长斋持戒，天天聚首，探研佛理，振兴林事。并定下林规：每天下午集体修身净土一堂，每月定四天为

大会日期——初一、十五为男会，初二、十六为女会。每会约有四、五百人，陈仁进居士主持餐事，理得条条整整，终日不倦。有时多至百桌，他亦笑脸迎人，及时完成，使就餐者无不满意。众居士皆捐弃一切，凡事均能轻而易举，很快得到解决。

先后三年，两厢横楼，四周围墙、小屋，连成一片，共计二十余间，地方清洁，天井宽敞，花木掩映，环境幽美。室内装置，亦颇美观，如大殿有丈六金身大佛三尊，法相庄严，出自名手。藏经楼所，藏影印明版《大藏经》全部，为玉环县内所独有。大殿为“西方殿”，两厢为“地藏殿”与“药师殿”，幢幡宝盖，木鱼钟磬，应有尽有。地方虽不宏大，在楚门小镇中也算得难能可贵了。所以游人香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每年举行讲经会一次，礼请名僧来林宣讲佛经。如华清法师、澹云法师，都是浙东大丛林的善知识，戒行与学问兼优，先后曾多次来楚说法。听者人山人海，远方来客，交通不便，步行到此，虔心信仰，忘却疲劳。在玉环佛教史上，可谓盛况空前。当时，楚门的镇海寺、灵山寺、济理寺均已衰落，独有居士林异军突起，声势浩大。由于教义明确，劝人行善，所以赢得广大群众的向往。

居士林课诵之余，兼办善举，如临终助念，赡老扶困，赠衣济食，修桥铺路及建造义冢等，众居士凡力能所及的，无不踊跃行之。某年楚门灾情较重，粮价猛涨，贫困者生活维艰，以致人心惶惶。居士林信徒便自觉集资，设立平糶处，一面向外地采购粮什，一面劝告殷实富户献出余粮，广种福田。这样一来，楚门的贫民受益者何至千百。

居士林殿内，有许多匾额、楹联、书画出自名家手笔，颇有价值，如弘一法师所题“西方殿”三字，见者无不赞好。王

震一亭先生题有楹联一副及佛象多幅。朱庆澜将军、圆英法师各书匾额一方，为“法地庄严”和“愿行庄严”。六指头陀书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笔力苍劲，刚中有柔，别具一格。

居士林地处山上，空气清心，前可观楚门全城风貌；后远眺大海波涛，舟帆来往，群鸟飞翔，海阔天空。四周松柏滴翠，花草清香，每逢假日闲暇，游人不绝，在此浏览风光，或翻阅经书刊物，或静坐听经，或下棋消遣，调剂劳逸，舒展胸襟。外客到此，亦登山入门，留连细览，以解寂寞。

玉环三青团组织史

朱仁畅

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在玉环的组织活动，从它的产生，发展到灭亡，算起来只有十来年时间，短暂得似“昙花一现”，却关联着旧时代国民党统治的脉络。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玉环社会面貌的轮廓。

现就我记忆所及，如实地追记下这篇材料，为研究玉环历史作参考。

一、建立玉环三青团组织的历史政治背景

1938年抗日战争中，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渐积极，蒋介石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采取一系列反共措施，企图遏制、消灭革命力量的发展。三青团的产生，是出于国民党反共的需要。1938年6月为组织三青团告全国青年书中，也明确说明“使全国青年纳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

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手下得力的“复兴社”分子，社会上称为“少壮派”，和党内根基甚深的CC系，政学系矛盾激化，三青团是作为国民党内部一股新兴力量，来抗衡CC系和政学系，以巩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玉环县的三青团组织，也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的国民党玉环县县长方引之，是蒋介石亲信俞济时手下的人。他在玉环建立起三青团组织，是他推行反共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玉环国民党党政矛盾的产物。方引之和国民党玉环县党部及其地方势力的矛盾斗争甚为激烈，他要利用三青团组织的发展，对付县党部与地方势力，巩固並加强自己在玉环的统治地位。

三青团当时提出：“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世界大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家动脉的新血轮”、“用新人，行新政”等口号，来蒙骗全国青年。有不少的青年人，是在这样口号诱惑下而参加了这个组织的。

二、玉环三青团组织沿革

第一阶段 1938年——1940年6月

永玉分队 1938——1939.4

隶属于三青团永嘉县分团

分队长 方引之 分队附 方佛（县自卫队大队长）
在县政府系统军政人员中吸收团员。

乐玉分队 1939.5——1939.7

改归乐清区队就近领导

分队长 方引之 分队附 方佛

开始在城区及楚门区发展团员

玉环区队 1939.8——1940.6

仍归属于永嘉县分团

区队长 方引之 区队附刘骥（县国民兵团副团长）

团员人数已达30来人，编组三个分队，並开始在社会上发展三青团员，抽调吴彭福（三青团省干训班结业）专职办理团务。

第二阶段 1940.7—1946.12

三青团浙江支团直属玉环区队

直属省支团领导

第一任区队长方引之 区队附刘骥

第二任区队长刘骥 区队附牟秉义（三青团省干训班结业，玉环警察局政训员）

第三任区队长陈麟书（县国民兵团付团长）

区队附牟秉义

第四任区队长何黄深（县政府兵役科科长）

区队附牟秉义

第五任区队长牟秉义 区队附朱仁畅

第六任区队长郭顺梅 区队附朱仁畅

第七任区队长朱仁畅 区队附朱树森

1940年扩建为省直属区队后，在城区、楚门、坎门组设分队，並大力发展团员。至1941年方引之调离玉环，人员调动频繁，三青团组织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直至1942年下半年，郭顺梅出任区队长后，三青团又重整旗鼓，再度活跃起来。郭顺梅是以定邦任县长期内的民政科长，操有实权，他利用三青团组织的发展，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1943年5月，三青团浙江支团委任朱仁畅为直属玉环区队队长。

朱仁畅任职后，报委朱树森为区队附，郭顺梅改聘为区队指导员。起用倪振春（鹿西人）为团务办事员。着手整理团

籍，並在大门、沙鳢、坎门、楚门发展三青团员，建立分队组织。

1944年冬，坎门、玉城相继陷于日寇魔爪，三青团随县党政机关撤至楚门。

1945年5月底，坎门敌伪仓皇撤退，三青团搬回县城。

1946年开始，三青团又转入发展组织工作，准备凑足300名团员，上报省支团，作为成立分团的条件。

第三阶段 1947.1—1947.10

正式建立三青团浙江支团玉环分团筹备处

分团设主任一人，由朱仁畅担任，书记（相当于秘书长）一人先由乐清人陈俊才担任，不久陈俊才离职，由蔡蔚文接任。分团设干事会由干事组成。分团部有组训、总务、宣传三股。全部经费由省支团拨发。团员总人数约320人左右，在楚门、城区、坎门、沙鳢、大门组设区队，每区队分管二至三个分队。

分团部实际是1947年2月正式开始工作，到10月就结束团务活动，准备党团合并，头尾算起来不过9个月，其主要任务：一、安排人事和内务，编组区分队，至5月份开始停止吸收新团员，举办团员总甄核，所有团员重新登记，清理团籍，上报以后颁发新的团证。二、按照原定的计划，支持倪文亚竞选立法委员，支持毛光熙竞选国大代表，几个月来，调集力量，全力以赴。

三、党团合并

国民党中央决定，把三青团并入国民党。1947年9月间就

已公开宣布。10月份做准备工作,结束三青团团务活动。11月份由党团主要负责人组成党团统一委员会。按统一规定,所有三青团员不另办入党手续,一律改为国民党党员。县三青团主任改任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县三青团书记改任副秘书长,所有三青团干事改为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三青团监察改为国民党县党部监委,因为当时国民党正在进行党员总登记,尚未整编区分党部,决定三青团的区分队组织暂时维持原状。

三青团并入县党部以后,不到四个月(1948年2月止),国民党全国停发党费,县党部的经费没有了,人员薪金没有了,人员星散,无人办事,整个县党部(包括三青团)就处于瘫痪状态,从此,一蹶不振。

四、尾 声

玉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董运铎和毛止熙两派的争霸,通过竞选国大代表一场火拼,宣告董派彻底失败。毛光熙当选国大代表后,毛止熙当上了玉环县县长,董派失去当权的势力,在玉环无法立足,丢掉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县党部这块政治地盘,出走他乡,连参议会议长吴起芳也因失去依靠,下了台,被林式民接替,至此,国民党在玉环的“正统”势力,濒于溃散。

1987年9月14日脱稿

民国时期(1912—1949)

玉环县历任知事县长

朱仁巴 整理

知 事:

序号	姓 名	籍 贯	任 职 时 间	材 料 来 源
1	詹泰钟		1912.6—	据老人回忆
2	徐育铤		1913—	民国2年11月13日县公署布告第五号勒石碑记。(在烈士墓)
3	汤鼎梅	绍兴	1913—	曹仲渊《小方言》见本辑135页
4	秦联元		1915—	县档案馆资料
5	於振越	台州	1916—	字啸秋、杀害胡姜其据老人回忆
6	丁德威		1916—	县档案馆资料

序号	姓 名	籍 贯	任 职 时 间	材 料 来 源
7	吕 衡		1917—	县档案馆资料
8	丁德威		1918—	"
9	江恢阅	黄岩	1918—1919	"
10	江宗廉		1920—	"
11	李景枚			×县文史资料(待查)
12	卢鸿湜	福建永定	1926—	据老人回忆

县 长:

序号	姓 名	籍 贯	任 职 年 月	材 料 来 源
1	谢乃绩	杭州	1927—	县档案馆资料
2	张 乐	乐清大荆	1928—	"
3	张玉麟	江苏宜兴	1929—1932	"

序号	姓 名	籍 贯	任 职 年 月	材 料 来 源
4	卢云琛	东阳	1933—1936	县档案馆资料
5	赖舜纯	广东	1936—1937	知情人回忆
6	李裕光	东阳	1937—	"
7	方引之	奉化	1937—1941.11	县档案馆资料
8	以定邦	广西	1941.12-1946.4	"
9	姚莲生	瑞安	1946.4.30— 1947.4.30	知情人回忆
10	王思本	温州	1947.5—1948.9	县档案馆资料
11	毛止熙	玉环	1948.10-1949.4	"

说明:

《浙江百年大事记》263页“1937年11月,省府命令调嘉兴县长於树峦为玉环县长”。又286页“1941年11月,省府更调八县县长,孙宾甫为玉环县长”。经查核,於、孙二人並未来玉履任。

陈 屿 旧 事

刘 嵘

近日翻看《玉环文史资料》第三辑，读了《忆林铎先生》一文，不胜感慨，浮想联翩。原来，林铎先生是我在联中读书时的语文老师。他既严格，又热情，至今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林铎先生介绍我进联中读书的。当时，我才（虚龄）十二岁，毕业于玉环县立第一小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校长是林立先生，他就是林铎生的弟弟。

这就触动了我，使我想起四十五年前，在陈屿小学任教的旧事。

1942年初，我毕业于台州中学后，回到家乡。想在家乡读一点书，准备孝大学。刚好，家兄刘峙出任陈屿小学校长，办起高小，既缺教师，又没有什么经费。因此，我就作为义务教师，到陈屿小学，兼了课。兼课的还有来自城里的表兄弟於祖龙等都是义务的。家兄挺慷慨，负担这些兼课教师在家吃住的费用，以振兴家乡教育事业为己任。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家乡虽未被占领，但时受日本侵略军的骚扰，不堪其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就从上海市立敬业中学停学回家乡。接着，就随母亲和弟妹，迁居温岭县亲戚家避难一年。后来，几经曲折，才于1940年初转学台州中学。当时，台州中学已从海门迁到山城仙居县的一座寺庙，寒

暑假来回几乎都是步行的，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环境下，师生抗日热情很高，真是做到：一边认真读书，一边热情抗日。小学办得挺红火。师生最喜欢唱的歌曲是：在松花江上，大刀歌，游击队之歌。我自己特别爱唱在松花江上和大刀歌。大家唱起来，同仇敌忾，声泪俱下。大家也举行时事演讲会，举办漫画展览。我不会绘画，但也凭着一股热情，画了不少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中国人民高举粗壮的手臂，紧握拳头，张着大口，怒喊：日寇滚出去！

我兼的是六年级的算术课，还兼了体育课。我一直爱好社会科学的，但在读高中时，数理化成绩都挺不错，所以兼了算术课。我在读初中时，还只会玩一些弹子游戏。不知怎的，在台州中学读书时，体育成绩突然上升，曾获台州中学校运动会跳高、标枪、110米高栏三项冠军，还是学校篮排球队队员，所以，体育主任特别看中我，几次动员我来读体育专业。可能是旧思想作怪，我喜欢体育活动，但瞧不起体育教师。因此，婉言谢绝说：我已定了志愿读哲学或社会学，没想到，我这一辈子真的以搞哲学为自己的专业。我后来考中山大学时，就是报考哲学系的。可是，我在陈屿小学到是乐意兼任体育课的，这并不是偶然的。

事有凑巧，这年夏天，县举行运动会。因此，我作为六年级的体育老师，自然就是陈屿小学运动队的“主教练”了。当时，陈屿小学还是在—座寺庙里的，没有什么场地。因此，就在旁边的一块牧场上，师生动手，开辟了一个运动场。说是运动场，其实，只有简陋的篮球场；一个沙坑，作为跳高，跳远的场地。没有什么跑道，只撒一点白石灰，作为跑道的标记。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培训运动员。可是，大家的雄

心壮志倒不小，不敢和环山队比，却想和坎门、楚门队比高低，争取第二、三的好名次。

现在，记不起陈屿队在县运动会上争得的具体名次。但是，只有十来名运动员的陈屿队，却称“异军突起”，引起轰动，至今仍留下美好的回忆。

事情过去了40多年，我在前年回乡探亲时，陈屿队的主将之一——张涤鸿同学来看我时，还谈起这件事。没想到，他已先退休了，其他队员同学，都没见到。后来，我参观了陈屿中学，变化就很大了。作为校史，倒有那么一段旧事，因此，作陈屿旧事记，以志纪念！

1988年5月25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漫 说 故 乡 习 俗

叶文玲

参差竹，吹断相思曲。正是难解难遣的乡思，使我毅然告别留居二十四年的河南，回归浙江；正是盘结心头的乡情，使我在萌动创作欲望时，总要先对故乡作一番寻觅，自从我与文学重新结缘后，故乡的天地故乡的人，就是我最关注的对象，故乡的风情故乡的变迁，常常成为我灵感的“爆发点”。十年来，以故乡为背景的作品，占了我创作的大部篇幅，每每检视时，心中似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欣慰。

我曾把故乡比作珠玉般的岛屿，我称誉她青山绿水的地貌和大自然的丰富赐予，更为她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建设成就兴奋不已，我曾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浙江日报等各大报纸撰文，盛赞漩门港的迅速建成和楚门文旦的香飘海外；吟咏楚门这个最有特色的海角小镇的种种变化；而大鹿岛别具风貌的开发和坎门恒古未有的“渔民文化周”的举行，都疾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满怀欢欣长篇累牍地为之讴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凡是我能拿起来的长短“武器”，我都使用了；工、农、渔、盐，凡是玉环人所从事的行业，我都写过了。

这些作品都是直抒胸臆的感奋之作，感情的浓度和真挚的情怀是不必怀疑的，要论有多少资料的价值，就难说了。因此，这次应命为《玉环文史资料》写作，我便愧颜惶然，遥想玉

环悠远的文明史,念及玉环历代大有作为的贤士才俊,我的见识和对故乡的贡献,真乃芥豆之微,拿起笔来又该说什么道什么呢?

“偶然画到江南竹,便想春风燕笋多。”扬州八怪郑燮的这句话,很是我在河南那些年心情的写照。由春风燕笋联翩想来,我常常忆起故乡的一些习俗,那些充分体现家乡风土人情的习俗,那些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的韵味十足的习俗。

风土人情和习俗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极鲜明地代表着那种地域的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即如此。嵯峨青黛的玉环山,河海相接的玉环水,哺育了玉环人的子子孙孙,这块有山有水有海塘的土地,这块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踪迹的土地,沉积着那么厚重的历史,滋生了那么丰富的文化,又沿袭了多少颇为有趣的习俗呵!

在这里,我不可能尽述其详,我生长在楚门,只能限于楚门一隅,而且也只限于儿时所见的印象最深的几例。

一是“谢年”。

谢年二字,大概只有我们故乡人才能意会,要换成江浙人或者大家都懂的意思,便是鲁迅先生的名篇题名:“祝福”。

但不管别处如何叫法,我们玉环人统统称做谢年。

谢年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典礼,富贵人家自不必说,即便是清贫人家,也有“摆两根清水糕也要谢年”的心意。

我记得,谢年时,大都自备或借好一张朱漆八仙桌,把所备的供品一一摆开,那供品,当然是为过年购置的各种食品,除了鸡鸭鱼肉,还有就是做年糕时特意做好的形似宝塔的一对“糕头”;其中最庞大最隆重的供品,便是称做“福礼”的一只烫熟的大猪头。所以“买个猪头谢年”,成了那时所有人家的愿

望;吃了谢年谢过的食品,据说因为得了老天爷的赐福,便可消弭病灾,福乐康寿。

谢年的时间并不划一,早早晚晚均由各家自己选择。谢年时,红烛高烧,鞭炮大作,辟辟啪啪声中,还会有几声很震耳的“天地两响”。热闹声中,一家之主首先跪在拜榻前,念念有词地合手祝祷,祝祷完后,叫过一家大小,依次跪拜行礼,算是全家都得了老天爷的祝福。

谢年是一项很被家乡人重视的祝祷活动,供桌前方,两支燃得通红的大油烛,又很有过大年的隆重气氛。大人们在祝祷时,绝不许孩子随便嬉笑或胡言乱语,这一来,更添了一种庄重而神秘的色彩。幸而谢年过后,接踵而来的一件事,便是长辈们给小辈分“压岁钱”,这时,气氛大变,房院间立刻响彻快乐而喧闹的童音,过年的气氛越发暖融融了。

我想,小时候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那么盼望谢年,一定是忘不了谢年过后的“压岁钱”。

谢年的习俗在前些年,特别是“文革”的十年中,被禁止了。但是,人心是禁不住的,正如文化不能被断然阻隔一样。这几年,家乡人又非常热衷于谢年了。日子富裕的人家,比赛似的,鞭炮买得更多,猪头买得更大,也许跪拜不再象从前那样虔诚,但是,上一桌丰盛的供品,如今却家家办得到。于是,象是为了弥补前些年的疏漏,如今,楚门人的谢年,谢得加倍地热闹。

二是“点间间亮”。

正月十五,传说是“天官诞辰”。不知为什么,楚门又派生出另一项习俗:除了在四四方方的天井中插一圈为地藏王祈祷的线香外,还要“点间间亮”。

天官在哪里?地藏王在何方?这是无人能解的谜。而“点

间间亮”，无非也是百姓们对来年丰衣足食的祈求。

“点间间亮”的仪式很简单，却又十分美妙。

“点间间亮”的人家，常常预备数十支小指头粗细的小红烛，插这红烛，并不需讲究的锡烛台；在一块切好的番薯园片上，插一根铁钉便成了很现成的烛台。

黄昏断黑时，天井中的那圈线香点好了，在天井的四角，各压上一盏这种插着小红烛的烛台；接着，这种小烛台又一一分布在家家户户的每扇门后，每个房间的角落，甚至连厨房的米缸、放衣的橱柜都一一放置。这一来，一条长街便见家家烛火明亮，如果是雪天，那么，在白雪地面的映照下，更显得美丽异常。

说实在，家乡最引我遐想的习俗，便是“点间间亮”。小时候，对着这一圈星星点点的香火，对着这一支支明亮的小红烛，我总觉得分外甜蜜又分外振奋。那香火，那烛光，呈现出一派美丽而朦胧的诗意，圣诞树带给外国儿童的欢乐，我全在这摇曳的香烛中得到了。

据我所知，如今，家乡一带早就没人“点间间亮”了，大概，在电灯大放光芒的今天，人人都懒得再去费这一番心思，人类文明总是向现代化迈进的，可是，痴心的我又想：“点间间亮”并不破费，在有兴致时何妨一试呢？否则，这古老而无诗意的习俗，岂不从此湮没无闻了吗？

三是“做月节”。

权威人士说过，吃也是一种文化。我们楚门人是很会吃很讲究吃的，可见文化之丰富。

楚门人一年到头，除了过年那几天理所当然地尽情吃喝外，还有很多以吃为主要内容的“月节”，楚门人把筹备进行的这种活动叫做“做月节”。月节的日脚，自然是按阴历推算的。

从正月开始：正月半（上元节）、二月二、三月清明（这是个时间很长的节次，人们可全凭自家祭扫祖墓的需要，选择一月中的任何一天，故有“清明长长节，做到端午歇”之谓。）五月端午、七月半（中元节）、八月十六、九月九、十月半（下元节）、冬至、大年三十……算来大家共庆的有十种之多。至于为自家的婚丧嫁娶或庆寿或贺得子添孙做的喜酒、寿酒、满月酒、对周酒、百岁酒……则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只要年景好，生活宽裕，人们自然可以找出各种理由好吃好喝，我惊异家乡人们“做月节”方式是那样顺理成章、习惯成自然、而根深蒂固，因此，相传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

正月半元宵节的吃食是不用太破费的，大都是过年剩余物资的一次清理和扫荡，上桌的无非是几碗荤素菜肴，再加粽子元宵之类的主食年糕。正月半引逗大家兴趣的是舞龙灯，有些年，兴致高的人们，初三晚上就舞起了龙灯，到元宵节再闹一回，算是收场。

二月二龙抬头，比较简单，大部分人家“烫糕头”。所谓“烫糕头”，便是把谢年谢过的那对宝塔状的年糕头拿出来，切成筷子大小的细条，然后烧一锅放了肉丝鱼鲞虾儿青菜等作料的汤，把切好的糕条放进去一滚就成；也有人家偏爱吃“芥菜饭”，说是吃了这种放了肉块和芥菜做成的米饭，不生疥疮疖疤。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此时正是芥菜鲜嫩之时，用这种有特殊香味的芥菜煮饭尝鲜，自然别有风味。

三月清明节，则要做一种糯米粉做的大团子。因为在粉中揉上了马兰青、“地梅”的叶子，整个团子便青绿莹亮很是悦目，上海人叫做“青团”，楚门则更有一个别致的名字：青掩。为何用这一“掩”字？我未专门考查，据猜想，可能是

”掩”住了里边的馅而得名吧？

楚门人蒸青掩，把做好的团子，一个个放在洗净的柚树叶上，入锅炊蒸，求其柚树叶的清香气。青掩十分糯甜可口，且色香味俱佳，实在是家乡很别致的食品。

我在杭州也买过“青团”，吃了一只便不想第二只了，因为里边是稀糊糊的糖馅，而不是楚门做的又香又甜的赤豆豆沙馅；那皮子虽也是绿的，却并非家乡人货真价实的用马兰青或地梅所揉，而是用了青菜汁或食用果绿。自然品味就差远了。

我不厌其详地说及这青掩及其可爱的绿色，是因为实在钦佩家乡人这绝顶聪明的发现：马兰青和地梅都是极不起眼的野生小草，是什么人首先悟出来这东西能食用，而且采用了如此精妙的制法呢？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用苧麻的嫩叶子揉粉，也可达到绿莹莹又香喷喷的效果，不过，苧麻叶只能用来揉在面粉中做麦饼用。五月端午是个大节，别地乡俗是包粽子，楚门却家家户户做麦饼，麦饼有两种，一是用面糊在鏊锅上摊出来的薄如纸的“吸饼”，上海一带叫做“春卷皮子”；二是用面粉揉了煮过的苧麻叶子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然后用一截短短的易于手握的竹筒或木棍（楚门叫做“麦饼卷”），擀出一张张滚圆的淡绿色的薄饼，这薄饼在热锅上一张张贴出来时，原先的淡绿色又成了翠绿色，煞是好看。而且也有股特殊的草香味。

北方人吃煎饼，一根大葱蘸酱就行了，若有盘炒鸡蛋一裹，便吃得满嘴滋味。楚门人吃麦饼，所裹的荤素菜肴，起码要弄上十来碗，配备齐全的各色小菜加上海边小镇特有的海鲜，一桌配裹麦饼的菜肴，真算得是“十样锦”。

家乡的男女老少十有八九爱吃麦饼，我也很喜欢，而且主要是喜欢吃麦饼和做麦饼时的那种气氛；擀饼子时，麦饼卷碰得笃笃地响，炒菜肴时香气四溢，品尝时团团围坐，人人动手全家忙，这种乐融融的气氛，真比北方的包饺子还要胜三分。

以往过端午节，不少人家在门口挂菖蒲剑避邪，在庭院洒雄黄酒消毒，大人们要喝雄黄酒，还要给孩子们鼻头眼脑涂上一星星雄黄以杀虫解毒，饭后还要炒一锅洒上雄黄的蚕豆，让孩子们嚼得满街山响，现在，挂菖蒲剑被认为是无意义的迷信行为，不复有人再做；雄黄经了解是含砷的有毒物品，大家也不问津了。这两样东西的消失我觉得没什么，令人惋惜的是不见了那些巧夺天工的香袋。

小巧玲珑的香袋，实在是件充满诗情和幽思的工艺品。不是吗？潇湘馆主林黛玉为了那只香袋，曾与宝玉生过多少怨嗔？小小一只香袋，制作人完全可以任凭自己的心裁施展巧艺，寄托情思。我见我们家乡人，用各色绸缎绣制出各种小动物，另外，还可用硬纸制成或六角或八角的壳子，再用红绿丝线缠出各种图案花纹，也是很好看的。小时候，母亲曾为我精心制做了兔狗猫虎四只小香袋，这四个玲珑可爱的香袋，在我的蚊帐四角悬挂了好些年，朦胧欲睡或清晨钻出被窝时，我总要望一眼，这四只小小的香袋所唤起的温馨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如今，楚门的女人们，再难有心思做香袋了。我想，不是不会，而是没空，没心思。也许若干年后香袋这种小玩艺，也要在我们故乡一角永远地消失了……不知怎么，我竟这样念兹于兹，怅然若失。

反过来再说“做月节”。

七月半这个鬼节，也是个大节。吃食和端午节相似。主食

也常常仍是麦饼，还多了一种叫“糕干坯”的粉食。所不同的是，端午这顿大餐备在中午，而七月半则是晚餐，而且都得备上香烛、干张；满满的一桌菜肴，敬过作古的先辈和鬼神后，才能全家共尝。

中秋节，楚门人一般在八月十六过，随意烧几样荤素菜肴，也不做什么粉食，买几盒月饼尝新就是。

九月九重阳节，过的人家也是少数，磨磨新米蒸几笼浇成九层的又凉又软的米糕，叫做“九层糕”，无非是尝尝新早米的清香而已。“九层糕”之所以要浇成九层，大概和九月九的“九”字有关。

再就是冬至，冬至几乎和端午一样隆重，冬至也家家做麦饼，家家又都蒸糯甜的“冬至圆”——即大团子。不过，因为此时地头已没有了马兰青或地梅，所以“冬至圆”便是雪白的团子。这团子并不是圆圆的一团，手巧的主妇在收口时，总要捏出一点尖尖的“嘴”，散散排在蒸屉上，真象水上游着一群小白鹅。也有人喜欢花样翻新，团子捏成后，滚上一层浸泡过的糯米再蒸，这就有了新名字：米糰。米糰比冬至圆多了点意思，宴席上的“蓑衣丸子”，想必也是受此启发而来的吧？

冬至过后，恐怕就是全国上下家家为之精心操办的团圆饭——年夜饭了，虽也是七大盘八大碗，因为不体现楚门的特色，所以无须细述。

除了“做月节”，故乡在婚丧嫁娶盖房做坟上也有很多“花头”。如今，这些习俗，有的在时代变革中淘汰消失，有的则因了生活条件的好转而变本加厉，是好是坏，难以一言蔽之。这些枝枝叶叶常常被我写进小说中，此处，就不再絮叨了。

故乡永远是记忆中最宝贵的金沙。话头一勾，竟勾出了这么多琐琐碎碎而不无甜蜜的记忆！春风有路通深意，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家乡的这块土地是如此膏腴肥美，家乡在习俗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是多么有情有趣！

一九八七年岁末于杭州花园新村

身世漫谈(节录)

曹仲渊

这是我对过去几十年经历的回忆和感想的记述:

蒙学时代

七岁上学,第一天礼节繁褥。先在家向祖宗牌位点燃香烛,三跪九叩首,再拜父母,随带香烛,到东头新街蒙师张全泰先生家,先拜孔子,再拜老师,都是三跪九叩首。

不到一年,张老师去世。改拜李时云、张升阶两师。九岁,翻过坎门岭入中西学堂,拜郭文琴先生为师。一年后,步行二十余里至城里进环山书院,后改入考棚中西学堂。

这一年,有一事堪记:父母为我星夜赶缝长袍马褂,马褂是枣红色的显花缎料。因为当年的同知是北平吴蓉号镜江,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理学先生,能写一手妙入化境的颜体字,爱用白话文(宋儒语录),要召见地方上的学童,我被召见了。见他时也照样行跪拜礼数。他摸摸我的头,随出一个题目:“为人子应当怎样孝的”。当时我只十岁,念过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生吞活剥,一窍不通,乱写一阵交卷,居然被录取了,进入考棚上学。

次年八月,吴同知祭孔,我被召唤随班观礼。吴同知袍褂顶戴,还拖带花翎。卯时以前,天犹漆黑,我最看中他的“踱方

步”的风度,但“弯腰曲背”样子不大好看,给了我异样的印象。

这年,在中西学堂读书,使我耳目一新。生平初次见到铅笔、钢笔、皮鞋、皮球,我很喜爱这些。乐清石聘南先生短衣短裤,神气庄严,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是日本留学生,头脑新鲜,介绍了石笔、石板、复写纸等新式文具,又请了一位湖南人来给我们演说,鼓励我们要出远门,长见识,不要怕苦,不要怕穷,穷也何以讨饭达到目的地。他说湖南方面就有许多穷孩子,离别家庭,走到日本读书。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培养我后来爱好出远门的习惯,也增长我一生不怕出远门的勇气。但,中西学堂里也有些头脑冬烘的教师。

我住在学堂里,每一两星期回家一次。

在坎门岭头中西学堂时,同学郭明洲给我的印象最深,影响最大。他比我大四岁,当我在十二岁时,他已会写一手清通的文字。这一年,他便考中了秀才。截着蓝雀顶游街显耀,我很羡慕他。以后,他从上海复旦公学回家,自修《马氏文通》、《明儒学案》、《呻吟语》等,我也照样买来读,一句一句地圈点。他给了我爱好书本的勤学习习惯比任何一个少年朋友都多。

石聘南先生受聘去温州中学教书了,我也跟去投考,但考不取,因为我的中文不通。郭文琴先生原想我十四岁时为我开笔,但我十三岁(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就停止了。因此,我的中文始终没有弄通。

中学时代

我考温州中学失败,转入艺文中学。这是英国教会学堂,属监理会教派。中文是无法在教会学堂读通的。我读了两年,中文仍旧不通。但是音乐,体操,图画,算学门门都好。大考时

每门功课得分都在九十分以上。

校长蔡博敏(Wm. Chapman)英国伦敦人,最喜欢我的铅笔画每逢外国人来校参观,他都把我的铅笔画练习本拿去给来宾看。

旧同学双庙潭陈永车在上海甲种商业学校求学,于暑假回家,极言上海地方怎样怎样热闹,怂恿我也去。(后来,他患天花死在校里。)我心动了,请求父母准我去上海求学。于宣统元年进上海西门外生生里浙江旅沪公学。这是浙江学会里的人创办的。动植物学专家鄞县钟观光教我制造动物标本。马逢伯先生教中文,教务主任是沈祖绵(麇民),汤鼎梅(子枚)教算学。时常有浙江学会里派人来演说。汤寿浩(蛰仙),江春霖(为翰林公)都来讲过话。学会暗中与革命党有联络。

我的中文的进步,是在这里开的门径。

我的资质鲁钝,悟性不高,班中同学有秀才多名,以我的年龄最小,国文程度最差,每次分发考卷,我的一本总是末名,分数最多只四十分,老不及格。

马逢伯先生去东北做官去了,来了另一位姓马的。他的教授法不同,没有象马逢伯先生读桐城派文章时摇头晃脑,拖长腔调,把篇中的起承段落,前后照应一一用声调表达出来,我对于这一种教法大感兴趣,全神贯注于马先生的读文章,他读文章时神态安定,又庄严又和蔼。

后来的马先生就不然,只讲不读,干燥无味。有一天,他对我破口大骂,说我的国文不通,满篇都是“何则”“何则”……,结果,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说:“你不用功,以后要好好用功才是!”

经此一骂,我很惭愧。当夜熄灯铃响后,我私自去教师宿

舍见马老师,请求他指示国文怎样才会读通的秘诀。马老师说:“没有秘诀,只有死读,读得多了,自然会通。”他允诺明日要开一张书目给我。第二天,书目果然来了。从唐宋八大家下手,然后四史,然后三十六子。我即日带了三块银元向扫叶山房买来一部连史纸石印的《韩昌黎文集》。没有圈点符号,我不管看得懂看不懂,从第一页起逐字逐句,逐行逐篇顺序地读下去,先用红珠笔圈点,全部读完之后,再用墨笔圈点,这才使我的心眼稍稍开朗起来,了解了用字造句布局运思的方法。我把一部《康熙字典》翻得烂熟,字汇识得也多了。

我看完唐宋八大家文集后,觉得韩退之的文章以气势胜,但思想陈腐,不及柳柳州峭拔洒脱。苏东坡才气横溢,沉郁有馀而开朗不足,其余诸家都算平平。

闷读的结果,使我也中了一些毒。我喜欢老庄的无为思想,遂影响了我一生不喜欢政治,造成我对政治冷淡的性情。

同学之中,传说复旦公学好。郭闵畴是在复旦公学毕业后升入天津北洋大学学法律专科的。宣统二年下学期,我考进了复旦,他已经北上了。

在复旦,给我印象最深,得益最大的是陈监如老师所教的数学——几何学。他是闽侯人,教得有声有色,容易使我领悟。我对数学发生兴趣是他的启迪之功。

那时的学生,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有一天,马相伯校长为某家银行所牵累,被上海道台衙门抓进去,并把他关起来。复旦教师们带同学生队伍,列队从吴淞步行到道台衙门,雀立不走。我在软禁马校长的房间窗外看见他坐在椅上,神色安祥。带领我们的教师向道尹交涉了一个多少时,终于使马校长恢复了自由。当他离开衙门口,坐上四人轿后,同学们就一

蜜蜂似的拥在轿后一直送到他的家。

当时满清的官吏有点怕学生，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个例子。

这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宣传打进了校门。我开始厌恶发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写信先征求父母同意，回信不同意。我违抗了父母之命，再去信谎言已剪掉了。二次来信并未对我谴责，就干脆私下把它剪掉了。

暑假回家，遭到家乡亲友对我的嘲笑。母亲特地把剪下的头发编成一根假辫，出门戴上去，回家脱下，这样算两全其美。那时玉环县人口总共只有一十八万，他们说我是第一个剪辫子的孩子。一位七十多岁的邱琼山先生（邱文琴老师的老师，算是我的太老师）说，你们大家不要笑曹某某，不多久，我们大家都得剪掉它。果然这一年是一九一一年，八月革命起来了，第二年满清逊位，全国剪辫易服，邱老先生的话说中了。

这里有件趣事，第二年夏天是民国元年，暑假我回家，坎门镇上找不到一个内行的理发师，剪辫子的人又多，于是他们就公推我为义务理发师。老的少的，最多的一天剪过一百多根辫子。最后，手累了，把一位大绅士郭云翰老伯的左耳剪去了一小角。

复旦大学在吴淞镇，因为靠海口，辛亥革命时被迫迁到无锡去。我们同班同学有七个人，联名向马校长请愿，全班转到南洋中学，插进第五年级下学期。

南洋中学的功课，注重数理化。我的物理学半生不熟，化学最差，数学最好，国文这时总算有了门径。教师们都是头把手的：数学秦汾，化学丁文江，物理胡敦复、国文邵力子，英文在大陆报馆当主笔的李植藩。课本除国文外全用英文原本。每晨上课，背上一大捆课本，又厚又重，走一里多路。当时市

上还没有译成中文的外文书本。

一九一二年暑假毕业考试，复旦转过来的七人中有五人要求补课，我不同意。这时，四百多页厚的物理学，三百多页厚的化学都已经读完了四分之三。我冒险参加毕业考试，全班同学六十多人，发榜结果我名列第九。

在南洋中学读了半年就草草了事地毕了业。现在回忆起来，我在这段短期间里进步并不大，各位教师谁给我什么特殊的启发，我实在说不出来。只不过使我一生不忘记的，是校长王培孙先生所给我的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从来不对学生们讲大道理，真正做到“身教”的妙境。

他一手办了南洋中学五十五年，从来不对学生记过一次过，但学生个个对他又敬又爱。

他一方面使学生敬爱，一方面又很自然地一点也没有人为地使学生对他爱戴。一顶小帽子，一件破旧的袍子，一辆颠摆不稳的锈烂黄包车代步。织呢厂街的三间住屋，两间是住学生的，其中有一间是犯小错误，或患轻微疾病的学生住的。每逢夜间，他常常把这些犯错误的学生叫到自己的书房，在煤油灯下坐在一起看书，抓机会当面开导他们，直到感悟才又搬回学校里的学生宿舍。生病的学生，就由师母沈竹书先生亲自煎药调护。病重的，才同学生的家长商量送医院，或领回家。

还有一间宿舍，住的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经常有二十多人。有的要升学，有的要找职业。王校长不但要考虑他们的出路，还要负担他们的生活。这种精神，几十年不间断。

我就是住在这一间宿舍里的一个毕业生，我升学进南京海军雷电学校学习无线电专科就是通过王校长用这种方法为我成全的。

他办的这个学校长达五十五年，毕业学生总共有三千零三人。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十二岁病故，孑然一身。一本年谱叫《王培孙先生年谱》是我替他写的，上下两册二十万字。原稿交由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副馆长以一百元人民币请人誊清装订了上下两册，现在还度藏在该馆善本书库里做纪念。

问题并不只是纪念他办学的精神，还特别写出了他的教育方法。他紧紧抓住时代的特殊环节，对太阿倒持的教会学校作斗争，他提倡自然科学，又不放弃国文的进修，重视青年道德（破私立公）品质的修养。

他能够赢得许多学生家长的尊敬。

他的私生活，除了饮食方面比较不太随便而外，一生睡一张学生床，四十七岁丧偶，不续弦，一生清苦。

找工作

辛亥年（1911）八月，武昌起义时，我乡物价未椿的糙米每一元鹰洋四十二三斤，鸡蛋每元三百只。小学堂伙食一日三餐中晚餐每餐四碟菜，一碗汤，三荤一素，早餐两碟，一荤一素，每月鹰洋三元。据前辈先生言，道光三年的米价，每斗只三钱银子，值现币四角几分。

宣统二年，我来上海，上海鸡蛋每元八十多只，我已云很贵。迨第一次欧战末期，北京彩蛋每元亦可买三十多只，

一九一二年南洋中学毕业后，吃饭还不得其门。曾去杭州访浙江日报编辑王萃（卓夫，仙居人）老师，王老师是上海浙江旅沪公学教过我《左传》的，（他是浙江学会的人物），但不得要领。

那年秋天，我在温州会馆寄宿，一日三餐连宿费在内每日二角钱。生了一场感冒，钱用光了，赶回上海投考邮政局，局

长英国人叫尼克逊，考题是“巴力门”（英国国会）。我的英文不好，对 Par Liament 知识缺乏，乱写一阵交卷，居然会以“邮务生”被录取了。每月工资也有十五两，每两折得一元五角（以海关银两计算），生活忽然富足起来。那时，上海租界里生活并不比杭州高多少。我得到王培孙校长同意，免费寄宿在大东门内王氏宗祠。每晨上班以前，出东门口吃粢饭一团，加些白糖，只要五个铜板，铜板兑价每元可得一百五十几枚。后来逐渐贬值，被日本人收得精光，运回日本制造军火侵华。

那时，一件做好的新的白杭纺长衫只要四元，一套藏青哔叽西装（三件）工料在内只要六元。

然而，物价虽低，找饭吃还是不太容易。

王校长常常为每一个毕业同学的出路而担心。

我所学到的国学，高等数学，解析几何，这时都无用处。在邮政局各部门，每一部门实习一个星期。最后，我被派到“接收外国信”的部门去。从这里，使我学习到不少的外国地方名称。同时，也使我对于这种呆板而简单的机械式工作渐渐地不感兴趣。

考进去的一关，倒不烦难。难在找两家殷实的商家为我担保“偷窃公家财物”的赔偿责任，每家担保五百元。王校长替我找到泥城桥中国图书公司和中华书局两家。我只记得中华书局的担保人是李墨飞先生。我是以感激的心情上门请求的，但同时也有我这个人难道只值得一千元的反感。

正好，倒袁的号角吹响了。二次革命的炮声在沪南江南制造局每夜不停地打到天亮。大东门受到了威胁。所以，每到傍晚，必须出城进入法租界找地方住宿。有时流弹也打进租界里来。一到天明，又进城去。城里秩序很好，没有听说有抢劫盗

窃的故事。

有同乡人回乡，放出谣言，说我的左手中了一颗子弹，急得我母赶叫大哥专程来接我回家，不料对开的两船（永宁和永川）在上海叉过。我半夜到了家，害得我母喜极而哭。哭了半天，再看我的左手，无恙，立刻化悲为笑。这是伟大的母性的表现，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感受！

在我未回乡之前，我正式向尼克逊提出辞呈。我的主管部门的主任姓李，也同意我别干这门工作，给了我一份辞职申请书，还叮嘱我不要向尼克逊说明是他支持我辞职的。

尼克逊说，你年纪还轻，考虑问题不见得周到，我给你两小时的假，好好想一想，辞职好呢还是再干好。

我毫无考虑的余地，在南京路上溜达了两小时，干脆地答复尼克逊我考虑好了，我决定辞职不干。尼克逊说，可惜（pity）。楞了一下之后，又继续说，那两份保单，要到半年之后，才能寄还给你。好罢，祝你前途幸福。

这个英国人，后来听同事说他一直在香港做买卖，和我一别后，始终不再见面。

二次革命很快结束。王校长忽然来信，问我在乡何事。我说我在地方小学做教师，每月八元薪水。一年以十个月计算，共有八十元收入。王校长再来信，不同意我做这一门工作，劝我到上海，住宿吃饭由他负担，并叮嘱我赶快来。

我立刻到上海，住织呢厂街王家。

他问我今后的志愿，我说要进清华大学求学，并准备将来留学。他老人家不同意，理由是清华是有钱人子弟读的，我家贫穷，负担不起，无法进去。

那末，前程茫茫，只有等待机会之一法。

玉 师 回 忆

谢 振 泰

光阴似箭，玉师的往事，如在眼前；但是毕竟事隔将近四十年，又因我今年逾古稀，琐事健忘。现在仅就我亲身经历的，略予回忆。

玉师全称玉环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抗日战争初期，玉环全县小学毕业生，交通困阻，无法去外县求学；全县各小学师资又缺，于是1942年春创办该校，学制初为四年，后改为三年制，每年春秋各招新生一班。选址玉环县城附近的三合潭；第一任校长由玉环县国民党县长以定邦兼任。

至1942年8月，坎门人李劭先生（字君勉）任专职校长，亲来楚门我家，力劝我出任教导主任，共同为家乡办学；我感其至诚，勉予应允。

作为校舍的三合潭三旧庙，仅经草修，菩萨泥身尚在，校具教具操场等都很简陋；且其中两庙隔溪，餐风沐雨，在所常有；三合潭是山乡农村，当时无店无摊，常数日不知鱼肉味；每夜以菜油灯照明自修和备课改作等……食住生活艰苦。

次年李劭先生应外省聘请，坚决辞职；玉环县府定要我继任校长。重修旧庙和操场，添置校具与教具。虽然生活艰苦，但师生痛恨日寇，同仇敌忾，节俭朴素，勤学身教；清晨早读，书声共风声争鸣，课余锻炼，球影与晚霞齐飞，学风教风俱佳。

毕业的学生，详1887年11月玉环县党史办举办的玉师党史座谈会名册和玉师同学录；当时的老师，有林铎（字新民）、高乐民、董仲升、罗帮成、张春莲、姚扬徽、蒋秉忠、董绍平等先生。

但是三合潭终非久留之所，1644年一边开始修理玉环县城文庙，作为永久校舍；一边分班级逐步迁入。正在大兴土木尚未迁毕之际，于当年冬，日寇从坎门镇登陆，直窜玉环县城，加急情报，前哨临时传来，我只得振作精神，立即通知全校寄宿师生，自挑书被，轻装疾走，向楚门进发，以求解决膳宿与生命安全；但刚经芦浦，又报日寇自花岩浦登陆，楚门镇已沦陷，不可前往；县府自顾不暇；芦浦乡既系农村，又人地生疏，师生膳宿无法解决；在芦浦山颠庵堂宿夜后，次晨无奈中只得偷渡外塘，经清港至芳杜，沿途分送师生回家。经此惊心动魄的行军，负此师生生命的重任后，我坚决辞职，于1945年1月批准。

楚 门 八 景

陈 力 平

楚门，靠山濒海，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不仅有江南水乡的特色，且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据《玉环厅志》载，玉环建制始于清雍正六年，但早在明初，信国公汤和就到过楚门，筑城设所，并有“楚门八景”之说。

在楚门的南首，有峰峦高耸、突兀撑天的大山头。遥望山巅象美人立于云端，故称“丫髻山”，俗名“雪溜尖”，又叫“凉帽顶头”。每当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晨曦照在大山头尖，宛如披上了艳装，绚丽多彩；傍晚，落日的余辉总是最后与大山头尖告别。古人称为“离峰红照”，清叶佩衡留有“独占光辉红到顶，朝阳照早夕阳迟”的诗句。山顶筑有一台，可运眺海洋上船只往来。当时因倭寇经常出没在浙东三门湾一带，为了防范突然袭击，建此台居高瞭望，扬旗鸣号报警。大山头西面有龙王坑。山中有吕祖殿，石阶上有一口终年不竭的水井，寒冽澄清。山麓为山下浦（现名山后浦），旧时可通海。潮涨时，海水溢入浦内，潮退时即变为淡水冲。解放初，楚门的南塘头还有城门遗址。城外称南浦，十有九户以舟为家，捕鱼为生，故有“南浦渔舟”的美景。这里还产有鲈鱼可与全国有名的松江四腮鲈鱼媲美。清叶芝芬曾有诗句：

曲折筠岗活水来，

渔歌唱和晚烟开，
此中不减吴淞美，
网得鲈鱼也四腮。

楚门西面平空横立一座小山，名叫“西青山”，旧时树木繁茂，郁郁葱葱。山上有文昌阁，设天香书院，即今之楚门区中心小学前身。当年书院前两侧的悬崖上各有精致凉亭，石凳石桌，飞檐画栋。走上石级曲径，进大门是一条笔直甬道，左右都有桂花树。每当金风乍起，阵阵丹桂飘香，沁人肺腑，心旷神怡。这里称为“高阁文房”。清叶芝芬有诗云：

西山杰阁倚云开，
双桂森森左右栽，
静坐一遍方展现，
天香几阵透窗来。

西青山的北面是天后宫，前面有一道石崖屏障，陡壁数丈。由于山上树木高大，百草丛生，水珠一点一点沿峭壁滴在石窟里，发出清脆的响声，不管晴天落雨，岩上老是岚光发翠，形成一幅天然画图。前人美其名曰：“西崖滴翠”。后有王选青先生（号“独树老人”）在壁上凿刻“滴翠崖”三字，以志纪念。遗憾的是现在已被开山造屋，再也看不到“西崖滴翠”的美景了。

东门桥头，是楚门人熟悉的地方。过去这里是座拱桥，桥上有吊楼设哨，视野开阔，可远眺筠岗、沙河一带。每当皓月当空的夏夜，微风拂拂，水波粼粼；河边白杨参天，垂柳毵毵。一日辛劳的人们，都愿意坐在桥头纳凉聊天，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于这“东桥水月”的夜景。“畴将白玉盘，长向波心掷，往来桥上人，可望不可即。”这是晚清张英凤的诗句，描写圆

圆的月亮映照在清澈的河面上，比作白玉盘掷向水波心，只供往来的人们看望而不能去接近它。寥寥数笔，就把“东桥水月”的夜色描绘得有情有景，有动有静；情景交融，动静协调，写得维妙维肖，恰到好处。沿东门河向北围绕就是水洞门（即现在的汽车桥）。每当河床水位增高，陡门开放时，上游流水激冲至前面围渚，便分成两股左右环绕，恰似双龙戏珠，古人称此为“北渚环流。”

楚门闹市中心——十字街，早年建有一座凉亭，鱼鲜市场就设在这里，故有“中街鱼市”之称。“不问寅与巳，鱼鳞匝地摊”（张英凤诗），足见楚门地处海滨，早就水产资源丰富。不管是什么时候，十字街到处都是鱼鲜遍地，虾蟹满棚。无怪乎现在夜潮鱼虾进港时，大多摆设在这里，在明亮的电灯光下，供顾客任意挑选。

还有一景叫“浦口观潮”。深浦西岸原靠摆渡往返，这里是通往县城的唯一渡口。一日两次，潮涨潮落，年复一年。“寒潮日夕两来去，莫道东流不复西。”（清王咏霓诗），漩门港更是急涡恶浪，形势险要，就是楚门人也常去观光八月大潮。一九七八年全县人民在漩门筑起大坝，斩港断流，气势磅礴。为今南北变通途，汽车往来，摆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坝内碧水微波，养殖着海带紫菜；坝外的悬崖峭壁已新辟码头，停泊着大小船只。路旁鱼贩若市，山间莺歌燕舞，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济 理 寺

冯妙兴 泮昌顺 陈遂雄 林礼唐

据《玉环厅志》记载，济理寺名胜古迹有：

曲径松风	古崖仙迹
迭嶂蟠龙	高岗翔凤
石涧流泉	云潭吐雾
飞来石艇	突峙天峰

楚门出东升桥沿河行至筠岗村，上山对山盘曲幽径，西望重岗相峙，豁然开朗，其中地处平旷。宋祥符元年（1008年），建有四合院的济理寺原名济婺寺。大殿巍峨，供奉观音大士，女尼在此修身。东旁禅房素雅，清幽不俗，男僧趺坐皈依，因座前有两株桂树芳香四溢，名称“木樨香处”。后女尼圆寂，合并为男堂。

寺前山巅有石艇岩据传是远处飞来停泊。寺旁有溪，长数十丈，宽一丈许，流水淙淙，清彻可鉴，底石平滑，宛若龙游，故称“龙游街”。上下有龙潭，瀑布高悬，潺潺直泻，泉深莫测，常年不涸，时兴云雾，称为“吐雾潭”。安基山腰有老僧岩，头颅光秃，目视经典，孜孜不倦。

济理寺是楚门区著名胜景之一，四周山峦嶙峋，树木葱郁，筠竹碧翠，环境幽静，风景优美，游人登此山，心旷神怡，乐而忘归。

禅院附近还有蟠云壁、仙人迹、留云洞、万松径、马鬣冈、独叶包桃等胜景。清道光八年玉环厅同知吕荣赋诗赞云：

“窈窕竹冈曲，犹游兰若堂。开轩眺幽旷，万木郁苍苍。涧道龙身辟，峰尖鸟翼张，智仙如有作，会举醉霞觞。”

1958年间，在此山谷建成水库，济理寺已拆。1984年2月将牛角坑的永福堂改名为济理寺。虽部份胜景淹没于水底，但新址尚存美景，今已开辟康庄大道，车辆可以直达山麓。寺前茂林修竹，落荫缤纷，一山三潭、水光潋滟，融会一体，更饱游人眼福。

灵 山 寺

王 咏 樵

灵山寺历史悠久，声誉颇高，位于玉环田马乡的西岙村，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高僧启爽闻灵山人南钟声，首创古刹。当初善男信女前往朝拜，络绎不绝，香火盛及一时。灵山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其间几经燹灾，数度破坏，名胜古迹残存无几。

北宋熙宁元年（1068）住持僧法成、法敬筑涂成田七亩，以维持全寺僧人生计。宋神宗御赐匾额一方，题书“灵山寺”三字，并赐金扩充建造，名震遐迩。元至治二年（1322），不幸毁于大火，损失至巨。至顺元年到至正二十四年（1330—1364）寺僧一濂、惠宜等四处化缘募款，先后重建三门、两庑、观音大士殿、演法堂、钟鼓楼、藏经室、方丈室、僧房、厨房、浴室等，殿堂宏伟，建筑壮丽，丹青闪耀，辉映林壑。寺东约半华里有明代吏部郎中陈参之墓，墓前立有石马、石羊各一对，神工斧凿，维妙维肖；寺西约五百步有高达二十余米之瀑布，宛如浣纱溪泉倒泻万斛明珠。夏间游人如织，春初游兴尤浓，山青水绿，风光幽雅，游人到此，如醉如痴。寺院背负灵山，左右山峰陡起，环抱其间，树木葱郁，游客远眺，不知有寺。

清乾隆年间，由多才博学之慈明和尚重修，旧貌变新颜，古刹更壮观。新建有三板桥、石牌坊、七宝塔、九株樟、十八踏、擂鼓门、石狮子、大石碑第名胜古迹。

小 方 言

曹 仲 渊

序

曹云阁

先父仲渊公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六个年头了，他是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戴着一顶“反革命”帽子去世的。再隔十二天三年管制期就满了，但他等不到这一天。去世前几天他还憧憬着满了管制期就可以还他自由之身。实际上在人妖颠倒横扫一切的时代，那能这么简单。平反昭雪是在他去世后的第六年——一九七八年的事了。

先父生性秉直，治学谨严，是一个做学问的读书人。他常说人生一世不容易，生当为社会多做贡献，死亦应给后人留下些精神财富。本着这个精神，他一生勤奋治学，着力笔耕，关于无线电方面的著作就有五种*。

一九五八年他因高血压中风而退休。经几年调治，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一九六二年起就动手第六本著作《无线电发明

* 五种书名为：《无线电常识》，《无线电发明史》，《虎魄拾芥考》，《无线电外交失败史》，《马可尼》。

家》的写作。自此以后，他遵循自己制订的作息时间表进行工作和生活。晨五时许起身，去家居附近的复兴公园打太极拳，寒暑不断。早饭后开始一天的工作，中午稍事休息后继续工作到傍晚，这张课程表一直持续到 he 临终前的几天。自然，一九六九年被管制后早晨的锻炼是无法进行的。

先父一生不善敛财，但对文稿资料，来往信件都悉数保存。一九六六年有关部门来抄家时就引出不少麻烦。记得邵力子伯伯写来过一封信，是答复先父去信询问抄家政策的，“造反队”从这封信里“悟”出先父曾投寄过“反革命”信件。这一件事竟成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一大罪行。

《无线电发明家》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大量资料对俄国的波波夫和意大利的马可尼进行论证来探讨究竟谁是无线电的发明者。“造反队”认为这两位学者一位是“苏修”的，一位是“帝国主义”的都属打倒之例。他们要把《无线电发明家》手稿统统抄走。先父将手稿紧紧地抱在胸前，表示一切财物都可以拿走，这本手稿无论如何得留下。又亏得先父在文稿的第一页上夹着一张信条：（1）用毛泽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写，（2）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写。也许是精诚所至，感动了上帝，这本手稿终于没有抄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前前后后被抄了三次家，一应生活用品几被搜竭一空，唯独这本文稿给留了下来。

《无线电发明家》全书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底写成了。先父在这部书的前言里写道：“看了这部书后可以认识到科技落后的国家怎样受到这些欧洲人蹂躏的史实。将来或者有人要编写物理科技史，那么这部书也提供了这方面足够的参考资料。”……老实说，所收史料，繁琐而残缺，采集的经过，困难重重，

甘苦自知。深深感谢多方协助，使我终于如愿完成。”

《无线电发明家》写成了，先父了却了一大心愿。但他並不就此搁笔。他接受我的清求，写些自己一生的经历以给子孙留点纪念，不久，他又开始了新的耕耘，全心投入《身世漫谈》和坎门《小方言》的写作中去了。

在写《小方言》的过程中，先父常常会流露出对家乡的眷念之情。他曾几次对我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作一次故乡行；踏上故乡的土地，会见故乡的故旧……。

我真想象不出先父是怎样能一口气写完这十万字的稿件的。当时除仅有的一部工具书《辞海》外，手头没有片言只字可供参考的资料。他能写成这部书，除了凭着他热爱家乡的一颗拳拳之心，又能作何解释呢？

我读到《身世漫谈》是在先父谢世之后了。对先父的好记性我一直是有认识的。但是读了《身世漫谈》，一位八十老翁，对儿时的经历竟能回忆得那么详细，那么具体，我还是为他有这般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到震惊的。

先父在留给我的遗言中写道：“《身世漫谈》正在起草中，写的成功与否，我不敢肯定，只好写多少是多少，留给你们看看。看完后，请毁掉算了。”

亲爱的爸爸，请原谅您的女儿仅这一次违背了您的遗言，没有将它毁掉。我将它献给了家乡。我深信，您如果得知您写的这本书对研究家乡的地方史有所帮助时，您一定会同意我这样做的吧！

前言

浙江省渔市的集散地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定海县的沈家门，另一个是玉环岛的坎门镇。

沈家门在240多个岛群中（总名舟山群岛从大戢山至六横岛总面积共736平方公里多），靠近宁台两属，地位很好，方言是宁波话，略带台州的黄岩与温岭语腔，坎门镇很别致，通行泉州话，属闽南语系，而隔离泉州（包括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五县）却都很远。

泉州话原来散布面极为广阔：马六甲（maeacca）、打狗（Takao）即高雄港、马狗（maCao）即澳门；（又一说土人称天后宫为妈祖）等最初都是闽南语系开始得名的。

文献失征了，大概公元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玉环尚未展复时，早已有海客从闽南莅临，年代久了，泉州话遂在镇上流行开去，它除上述泉州五县外，又和厦门、永春，台湾特别是台中等处语言，现在大体相吻合。

玉环县境面积不大，南北横贯只有三十里，人口；六十年前也只有二十多万，闽南语系仅仅限于坎门一镇和附近几个小岛屿（平阳腔），出镇北行，进入农村，出现平阳话，腔调俚了，它跟纯粹的永加和乐清话都有显著差别，再向北去，渡海登陆，毗连台州府界，通行着台州话，泉州方言，到此全不适用。试想一个小岛，就有几种方言，真是：“乡音岂但分南北，跨出里门便不同”。

渔民很聪明，都会操流利的泉州话，同时又都会温州话和

台州话，儿童也是，一家人对谈，混用着三种方言，彼此很自然，一点也不觉别扭，有些还会讲蓝青官话。

我生长在镇上的教场头村，屋基濒海，每逢潮候，海水直涨上来，在后门口垂钓，二斤多重的黄鱼，往往会上钩，这里视野宽阔，海滩东西向展开，是众多渔民生产活动的世界。风帆寄碇，从东边黄门山口进入岙来，有天然避风港屏蔽，台风和大潮汛季候，又再朝西进的有里岙可泊，妥贴安全，地理条件十分好，钓艘多时，连云排空，千樯万櫓，煞是壮观。

今日我已年老，乡音未改，请屈聱牙（音敖不入入语）犹能上口，地方文化历史是朴野的，但方言却不尽土俗，古音古字，遗规尚存，这一本《小方言》的编写，旨在试探它们“母舌”的字根和音源。这份工作，可惜旧时村塾塾师没有做。

编写的内容是粗疏的，考证也不完全正确，姑且自我作始，补充和纠正，都有待于后来。

方言和音韵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多民族的我国，方言繁复，若全国各地都分别写出一本小方言，各地演变的轨迹，都是有脉络可寻的。我想现在的辞书编辑社如有余力，何妨兼做这份工作，在二三十年前有些篇幅编写，新印的县志亦附带几页小方言，远远不够，今后也可扩大。

方言的演变，历来有突有渐，大抵本地话的变迁从渐，外来语的掺入从突。交通灵便了，加速了它们的变革，北京话通行面最广，其因又和经济、政治、军事有关系。它在省际的变腔变调，也都有不乱的条贯。

扬雄的《扬子方言》章炳麟的《新方言》涉及全国范围，固然可贵，胡文英撰的《吴下方言考》诠释一个地域，也属难能，而我的这本小册子之所以称小，因为坎门镇原来就是一个

小小的渔村，又因为有些字句，略有走样，不好叫它《武荣方言》，严格讲，今天坎门镇的方言，已经是泉州话的一支旁系了。这支旁系方言搞清楚了，那末，闽南漳泉二府几个县的方言也就联带地搞清楚了。

编者

1970年10月

地貌（玉环岛）浅测

甲、东海水位曾经淹没了半个玉环岛

1、“环山”名称由来

玉环岛孤悬海外，在乐清湾的东南，温州湾的东北，东南两面皆无屏障，遥望太平洋，漫无边际，为南北洋来往轮船必经的主要航道。北端与楚门大陆几乎接壤，深浦渡口，港道甚窄，海潮涨落，水流湍急，常成涡漩，名曰：“漩门”，“危害舟楫”，楚门二字可能即指“漩门”为苦楚之门户。

岛古名榴屿，但不产石榴，其所以得名，殆以全岛地形似榴之故，渡口为榴蒂，中部偏东迤南一带为榴腹，而以极南端的南排山为榴尾，总面积在多岛屿的浙江省中，仅次于定海县。

县境多山，故又名玉环山，传说上有流水，洁白如玉，此说过甚其辞。出城西门外，有瀑布一挂，小如檐溜（尾水留也。）若登城南望，则四面皆山，所称“环山”殆即指此。

雍正五年，张坦熊奉旨前来筑城时，只能筑起一座山城，这一片榴腹大盆地，西北高于东南，四山泻水，汇向东南缺口，奔驰入海，今则泥沙淤积，早已变成耕田，有“天开河”可资灌溉，农民称便。

榴腹原无河渠，志称山洪暴发，自辟河道，向斗门头夺口而出，自是而后，始有闸门启闭，调节农田水量，蓄泄河道，遂成了榴腹腰带。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未废时，城内有“环山书

院”予曾就读其中，正中供奉张公泥塑像，衣冠采色，尚未尽褪，（大小如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塑像）除此盆地而外，全岛其他村镇，都无此“环滁”景象。

盆地由海变陆之后，“洋心路廊”为其中心，北越城脚护城河，南屈“塘洋”共长约十里，今则汽车公路由西北斜向东南，其直如矢，地名“塘洋”可见“塘洋”迤北，原是一片通海的汪洋。

2、筑塘防洪

雍正初年，此一盆地早已成为淡水池塘，鳞介繁殖，草菅丛生，更早以前，海舶可从塘洋与斗门头畅驶，直抵城下及沿山麓村庄，客运网罟，皆所利赖，清季耕牛犁田，每逢土质疏松会突然下陷，农民尚从地下不时掘得锚练烂索，片舵断橹，皆为古时渔民所遗弃，凭证更为确凿。

池塘水满，于是筑堤堰防溢，今“塘洋”陈夏臣前辈，住屋围墙脚向东一面，堤坝尚留陈迹，山地种植甘薯都有此行列塘股，以泄积水，“塘洋”实兼指海水与山水排灌两义。

海水盐分一般含盐3%（左右），盆地由咸水池塘变为淡水池塘，此中还须经过一段期间，直至盆地冲积渐高，高出海面，于是斗门、闸口、防潮排洪，始两全其用。这份沧海变迁的历史资料，仅留象迹，至其变迁的历史年代，可惜都模糊了。

3、海水亦从水孔口直灌上陆

穿过塘洋路廊，再向南行，又有小片狭长盆地，长约四里，中途亦有路廊一座，其南端则为双庙潭与水孔口，古昔都被海水淹没，水孔口即为海潮涨落门户，数百年来，亦逐渐冲

积，今亦早已成为可耕的农田。

4、坎门之门

过水孔口再朝南行，经无人岙，西潭，及车水头，（或作首字）等村落，直达乌沙头村，有两片沙州，从前都洋洋汤汤，沉没海底，海水一面由南北进，涨至乌沙头山脚，与车水头涌灌而来的海潮汇合。另一方面，整片坎门镇，前街与后街，都浸泡在海洋之中，南北贯通畅行舟楫，其东面为二条岭，小丘所阻，西首为坎门岭脚杨府庙后山所截，地势北高而南低，后沙海面宽阔，海滩全片有沙无石，其情形与渤海滨北戴河、上海高桥、普陀千步沙、广东雷州湾及台湾淡水港，皆相形似，可开辟海水浴场，星海公园，大连市青岛市的海水浴场，都是利用海滨浅滩，舟楫无法利用，南面前沙则与此相反，海滩沙石参半，潮水飘荡，鹅卵石壅集西头，此地东高而西低，地面陂陀，则以海潮于大潮汛时从黄门涌进，向西闯出，水势渐杀之故。

有时狂飚过境，例为光绪六年，海潮上陆，前街整条街道沉没海中，势极汹涌，我家门前大石臼，向西不胫而走，如滚皮球，三天之内砂石鳞介满街皆是，沿海民居，瓦背亦多砂石，这一坎陷之门，正合《周易》“习坎”卦名，实是艰险之门。介于前后沙中央，原有一湖，面积数十亩，五十年前被泮家填平，分割出售，即此一湖，亦足证明，前后沙原来贯通，坎门之坎，此其是矣！

东海水位如不在最近几百年间逐渐普遍降落，则玉环几片大小盆地，现在依然沉在海底不得露面，杭州市区的形成，介在杭州湾富春江和西湖之间，其原因与此相同。

5、从某些建筑物基地看问题

玉环厅治山城垣有3/4都在山上，其北门在北门山头，其余1/4的衙署、城隍庙、火神庙、东门内於家巨厦以及若干民房又都筑基在山下陡陂，其南只有一条狭街，长约一里，是在平地上。

封建时代，东岳庙为东岳大帝统摄鬼魂归宿，府庙基附着在东山山麓，则皆因洋心路廊一带盆地，都是水域，无法安基之故。双庙潭之双庙，在山边陡陂，校场头的水母娘娘宫、观音宫、后沙的观音宫、胡公大帝庙、杨府庙、以及早期若干民房，又都靠近山边高地或在丘垄高岗之上，则亦都因海潮冲击无法落足。

“新村无古树”，坎门恰恰如此。

新村一有民居，便有神社，天后宫更是渔民虔诚祈祷的庙宇，坎门镇中有天后宫两座，一在坎门岭背钓舸舫宫山之下，建筑年份较早，另一座乃在校场岙东头海边，出现较迟，迟到了前后沙海水退尽，潮水不再上陆，中街一带沙积成堤，坚实稳固之后，今天将这两座庙貌新旧两相比较，即不难识别其筑成年份之先后，几百年来迷信神祇风习顽固，今则衰退矣！

乙、地质观察

1、农作物：

玉环平地，古昔被水淹没时期以及山地水份不足，皆无法种植，水稻产量，不足供应全县需要，经常须仰赖邻县接济。某些山村居民，终年以甘薯为主粮，甘薯生长宜于山地、沙

坪，正好玉环多山，故甘薯花生产量都极丰富。

1913年，江北告荒，南通张季直先生移文向玉环告赈要求供应薯丝二十吨，当时县知事为绍兴汤鼎梅（号子枚）恐影响本地民食，复文婉辞谢绝。

2、土质

可以说，平地的冲积层，所形成的农田，其土质与海涂并无二致，即上层是沙底层是泥，纯泥地面在向南面的小部份山地挖掘，这些沙层是本地岩石风化以后所沉积，大部分是西北方面从外蒙古一半以及沙漠地带所吹来，沙泥的分布面极广，黄沙从戈壁（满州语叫大漠为戈壁）由西北大风吹向东南，若干万年以来，中原及华南地面沙积（专门名词为LALSS）即黄土，少粘稠，含有石灰及其他矿质有二百公尺以上的厚度，我国黄河以北比较江南地带，冲积得更为深厚。泥有黏性，常向下沉，整个玉环的土质，都是为此。

当平地沉没在海底时，它的土质就与现在的海涂相同。

玉环山脉，以田螺尖为最高，但亦不超过二千尺，如将山顶沙泥扫数铲去，则所剩下的光秃秃山头将尽是瘦削的岩石骨架。可以想象，它们尽是一些不甚高昂的礁石。远古时代，与南北雁荡山的裸岩，如北雁荡的灵峰观音岩显胜门那样，都是水成岩，这一带从平阳到乐清的大陆风景区的岩石，都没有经过火山的焦灼，它们原来是从洪荒时代一起由海底向上涌现而来的，所不同的是，雁荡风景区的岩石，另星分散，而玉环山则偏西偏北，聚集成脉，年代久远了，磳砾为阪，盆积愈厚，逐渐恢廓，试看全县的山头或平地，到处土质疏松，是其证明。

玉环土质，既非纯泥，遂无法造窑烧砖，只有利用砺壳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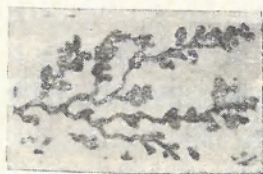
制蛎灰，城砖瓦片，都向邻县购买现成，运来使用。

山地磧砂，有许多是崎岖硃确的阪田，其原因亦可以想见。估计年代，岛的出现，相当于第四纪全新世的某次冰期。

3、花岩礁

花岩礁在坎门镇西南角，多产花岩，其外有一秃岩，孤突海上，名曰“破屿”上无民居，附近民房砌墙石块，多取给于此。

所谓花岩，实为远古海藻附生石面，化石留象，象甚单纯，与云南大理石、四川保山或腾冲的软玉或硬玉的花纹的美丽多采、颜色亦不一致，实无可比拟。（如图）



这种花纹千篇一律，普陀山亦甚多，沿山路闲步，俯拾皆是。

海藻、海萝又名蓴，鲜活时，长五、六分至一、二寸，分岐不规则，其原形如图：



蓴为海藻类、色有红、绿、褐几种，干枯后化石，不只是石面留痕，且深入半寸乃至寸许，地质学上言，这种花岩，大约为新生代第四系的遗迹，原来生长在海底或海面，名曰藻岩，是水成岩，其先亦为火成岩，迨沉入海底成为了沉淀岩，矽藻土亦是。

丙、岛的底盘

1、岛的底盘即海床

玉环岛不是火山岛，也不是珊瑚岛，而是从海底因受大洪水冲刷而冒出来的，初期与大陆相连，后来成半岛，再后来才孤立。它和雁荡山脉同一系统，底盘是岩石层，从深浦渡、乐清湾迤南一带，海床满是礁石。

远古渺茫，姑不具论，现在我人所处的地质历史时代是第四纪全新世，全新世到现在共有一万五千年。

在这一段时期里，曾经几次发生过大海浸和海枯。冰期也发生过三次，我国海南岛与雷州，台湾与福建，舟山群岛与宁波，日本与朝鲜，美亚二州之间与马来半岛，锡兰与印度……都是相连的，都属于地棚地。

玉环岛情形也正是这样，南排山和破屿也都不会不是这样。

2、海床的利用

从乐清湾至瓯江口一带，海床既多岩礁，深浦渡口太狭窄，当潮汛退后，吃水较深的船舶，就不便行驶。

这一带的水产很丰富，黄鱼，鲳鱼……应有尽有。

玉环不产鲍鱼，又无石蛸（音劫即是动物见石蛸条）建议

从厦门移植鲍鱼种子，如果试种，则清港渡口必须先行堵塞，使榴蒂固定在大陆上，消灭漩门海潮冲击，杜防鲍鱼种子流失，又便利通行汽车，避免摆渡。鲍鱼，厦门叫“九孔”，此物亦产在大连海中，秋季下海采取，玉环气候，可以大胆试种，鲍鱼名鮑（音伏，鱼名）亦称鲍鱼，壳即石决明（软体动物），为药用妙品。如能采集到岩城品种那最好，因为鲍鱼全世界以日本岩城鲍鱼为最佳。朝鲜亦有，罐头鲍鱼有一种叫“金钱鲍”即岩城特产。海参种类甚多，以我国的红旗参为最名贵，乌参亦是好品种。朝鲜、日本亦产，但非主要产地，而是集散居间牙贩，我乡亦可试种。石蛎生在瑞安沿海岩石间，亦可试种。

岛有坚固的岩石底盘，除非地壳骤变，否则，它是永恒固定的。崇明岛与此相反，它无固定底盘，海沿线随潮涨缩，有所谓“永泰”沙……者，并不永泰。这个岛从明代由江阴下游，逐渐东移，仅历数百年短短期间，便成了今天长江口外的新客。

“沙”是由水冲积而成，流动性甚大，犹如湖南的长沙，古时亦是一片泡在海底的沙洲。崇明由“里沙”多片所并成，而“外沙”则积蹙为启东县。这两个县将来如何变迁，尚难逆料，所以崇明特多讼师，双方争夺，新涨成的沙洲，长期纠葛不休。玉环岛有固定岩石层底盘，无此缠扰。

玉环岛的底盘形势，东面涨沙，全是浅滩，南北洋往来船舶，只能在外线深海行驶，东面浅滩，陡斜而上，海涂生物如沙蟹、海蜈蚣、弹鲈、蟛蜞、蚶、蛏、各种海螺……亦无不应有尽有。

地盘变迁，其势甚渐，地方老成人多半凋谢，世代绵邈，旧闻散佚，亦地方文献一大损失也。

方 言 鉴 别

玉环岛没有自己特殊的𠵹(音决)舌土话，街巷交谈，只有客籍言语，并无土著方言。

它在古代是荆楚闽越的化外版图，全岛人口，以坎门一镇繁衍最速，他们经常以这样来划分自己：“海边人”、“山头人”、“城里人”。从地区职业及人情风俗加以划分，倒不如从方言类别分辨客籍的来源，更为明显。

江苏省崇明县的居民有王、顾、董、施、陆、宋众家大姓，他们来岛最早。玉环则未闻有大小姓之分，陈岙山头，理该姓陈的住户最多，但事实则不然，住户最多的是姓刘，而陈姓则没有一户。

“山头人”生活朴素，性格诚实，是成群徙来的客籍。洪荒年代，久为不毛之地，当二百五十多年前展复时，官方向邻县平阳征募而来，专事山地垦荒，海边人则先有南北往来商船路过樵汲，登岛流寓，其后渔民继至，渐因生活安定，长久落户。以此现今“山头人”及附近几个小岛屿，通行着平阳话，而“海边人”则专讲闽南话，“城里人”则用台州话，各各分别清楚。

上述的几种客籍，以“海边人”最有冒险性，他们不怕惊涛骇浪，经常与海作斗争，渔船遇风浪失事，并不能阻遏他们飘海捕鱼的雄心，这种冒险精神，高贵品质，应当跟远涉重洋，向外拓植的广大华侨受到我们的同样尊敬。

至于商人，则以台州帮居多，卜居地点看主顾对象，坎门

一带，以渔民为对象，城区方面则以农民为对象，他们的足迹，分布开去，南北都有。

“山头人”世代居在山上，其情形与寻常所了解的高山族，例如台湾从屏东山猪门到花莲港就有一百二十多种的高山族完全不同，而“山头人”住居山间，其地位、文化及其他一切待遇的都与平地住户平等，彼此之间，毫无歧视。而高山族是半开化的蛮族，生活习惯人情风俗，都与平地居民绝异，他们没有日历没有教育文化……语言亦各族不同，例如屏东山猪门的高山族，生活习惯、服装都与日月潭和花莲港的高山族不相同，乃是当初被逼迁上山头的。而玉环的“山头人”则是自愿上山开垦的，这是他们不同的基本原因。

山头人中有头缠黑色粗布，将发辫随布绕额缠入头顶，如戴帽然，与上海英租界里的印度守门者相似（惟印度人多用大红色或纯白色布缠头），并与云贵一带所见者（用白布）略同，这些人，数目不多，有时亦入海捕渔，文化低，疑系少数民族之畬民，原散居浙江平阳、丽水、青田一带，亦称社民或余民，来源遥远。相传为瑶族，明王守仁征徭，被迫散居溪山中，与我人混居，风俗习惯久已同化。婚姻亦无畛域界限，其人为数不多。

云贵少数民族额头缠布，作为顶戴箬笠，运输货物之用，并将带的两头打结挂垂一边耳旁，而我乡畬民则否。

我童稚时，犹见老人妇女，山头人、海边人都有，两耳挂着银质大耳环，环径约有二寸左右，冬季，常披玄色粗布护巾，缠头盖住双耳御寒，及肩而止，他们皮色略带棕色，鼻梁塌、嘴唇厚，也是畬民。不过人数不多，最近六十多年来，他们的打扮都同我们一样了，不过鼻梁下陷，犹有遗迹。此与河

南省某些地方人具有特大的大鼻子，恐怕跟唐宋以后大批犹太和希伯来民族流落下来的人种有血统上的关系。玉环有少数畬民，道理也是这样，当年开封府就有至少三五千这些犹太人，陆地回国途经已断，海路又不通，流落下来的原因在此。现在呢，这些外来少数民族都跟我们汉族同化了。

（未完待续）

墨 香 飘 四 海

——介绍玉环籍画家叶尚青

郑祖武

春风拂露开新派，
毕竟大颐是导师。

这是当代老一辈大画家唐云先生在叶尚青个人画展时的题词，对叶尚青在艺术上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赞颂了导师泮天寿先生。

叶尚青出身于浙江玉环城关东岙里一个普通农家，兄弟姐妹七人中，他为长兄，家境虽然贫寒，其父见他天资聪明，从小酷爱书画、篆刻，就省吃俭用，供尚青念书。读小学时，他推崇玉环民间绘画艺术，启蒙老师陈希贤的门神画深深吸引着他。1947年，叶尚青读“玉环简师”时，受地下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久，与班上一些同学共赴括苍山“三、五支队”参加革命。在浙南游击队中，他加入了共产党，并积极从事文艺宣传与美术编辑工作。1949年解放后，他一度在温州和“浙江青年”搞美术工作。1954年他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他先攻中国人物画，后专事花鸟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60年代开始，叶尚青跟随中国画大师泮天寿先生学习花鸟画，得到亲授，使他对书法、金石、画理、画

史，指画等方面，都研究有素。

当我们走进叶尚青的画室里，映入眼中的是一幅八大山人入的《荷花翠鸟》的水印复制品和《面壁钝学》的隶书条幅；桌上堆放着徐渭、石涛、“扬州八怪”、任伯年、吴昌硕等名家画册，他常临摹，不断吸收诸家优秀传统技法。在学习人文画的同时，叶尚青还不断深入生活，执着追求中国画的创新。

西湖是诗之湖，西湖是画之源。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诗人、画家为杭州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制作了无数诗篇与画幅，供人欣赏。你瞧，叶尚青拿着画板，在盛夏季节，来到西湖的“曲院风荷”，被丽日映红的荷花临风摇曳，翠叶摆舞，清香四溢，别有风韵，促使画家创作起《欣放图》、《西冷风荷》、《风荷一向翻》、《曲院风荷》等作品来。我看过《西冷风荷》，他大胆运用泼墨作荷叶，数支水草，衬托成趣，几瓣朱莲，生意盎然，画面上留出大量空白，似觉莲塘无际，意境深邃。叶尚青对画荷十分拿手，在他的现有作品中，荷花的题材占了一大部分，有巨幅的，也有册页，有着色的红莲、白莲、粉莲、佛座莲，又有雨莲、风莲、墨莲，有九秋风露的枯荷也有子夜开花的睡莲。著名中国画家程十发曾在尚青画的荷花上题字：“出污泥而不染”，道出了画家颂荷真谛。

画家叶尚青有一方常用印章，是“浙南岛上人”，他不忘故乡玉环的养育之恩，也不忘故乡的父老兄妹亲友，他的画作《姣姣渔姑》和《网得鱼虾作饭餐》，就是叶尚青深入家乡的海岛生活后而画的佳作。

1984年，当叶尚青读了蒋加伦南极探险归来的报道，深受感动，于是他四次登门访问，对画南极企鹅产生极大兴趣。后来，他又找出自己在1981年赴加拿大写生时画的一些企鹅速写

资料，用中国画技法，即兴画了起来，反复地画，终于画出《南极居民》、《昂首南极》、《企望南极》等作品，这是前辈画家未曾问津过的题材，由于对表现时代意识和生活气息有了新的突破，终于博得广大观众好评。

画家叶尚青今年56岁，在浙江美院任教三十年，现为副教授，担任花鸟画课教学和担负外国留学生教学。他多次为中央电视台合作花鸟画技法讲座，还出版了《泮天寿论画笔录》、《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以及《花鸟画基础技法》等著作。他的画作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画展，有的被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收藏，有的被选送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巴拿马等国展出，他的墨香飘四海，深受外宾称赞。

刑法学家——高铭暄

江 石

高铭暄，男，一九二八年五月出生，浙江省玉环县人。一九四七年考入浙江大学法律系，一九四九年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学习，一九五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法学组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总干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兼职教授，杭州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北京人文函授大学名誉教授兼法律系函授教材总编审。

高铭暄教授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法学家，始终参加了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立法经验，并对《刑法》的立法原意有准确而深刻的把握。他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出版），阐述了刑法的制定过程及其涵义，为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司法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好评。

高铭暄教授治学严谨，科研工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倡并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刑法学科的理论体系，注意不断探索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新问题。他近年来著述甚丰，撰著、主编和参加编写的书籍二十余种，在法学期刊上发表的

学术论文数十篇，总字数已逾二百万。其中，他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截至1986年底已印行72万册，为全国绝大多数政法院校（系）和司法人员所选用。

高铭喧教授的教学工作十分出色。他虽然有了几十年的教学经验，仍力戒半点马虎与应付态度，坚持认真备课。他的授课，内容丰富而新颖，注重结合最新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注意综合、评介最新的学术动态，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心得，而且逻辑严密，层次分明，观点鲜明，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此，曾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优秀授课教师。

高教授十分重视对刑法研究生的培养和对年轻法学工作者的扶持。近年来，他和同事王作富教授精诚合作，联合招收和培养四十余名刑法硕士研究生和研究班研究生。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84年1月批准的我国第一位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此后他即于1984年至1986年招收了我国前三届共七名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他与王作富教授一起摸索和总结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指导和培养刑法研究生的方法，他们的经验为兄弟院校的同行专家、教授所称赞和借鉴，他们所培养的研究生已经开始在我国刑法界崭露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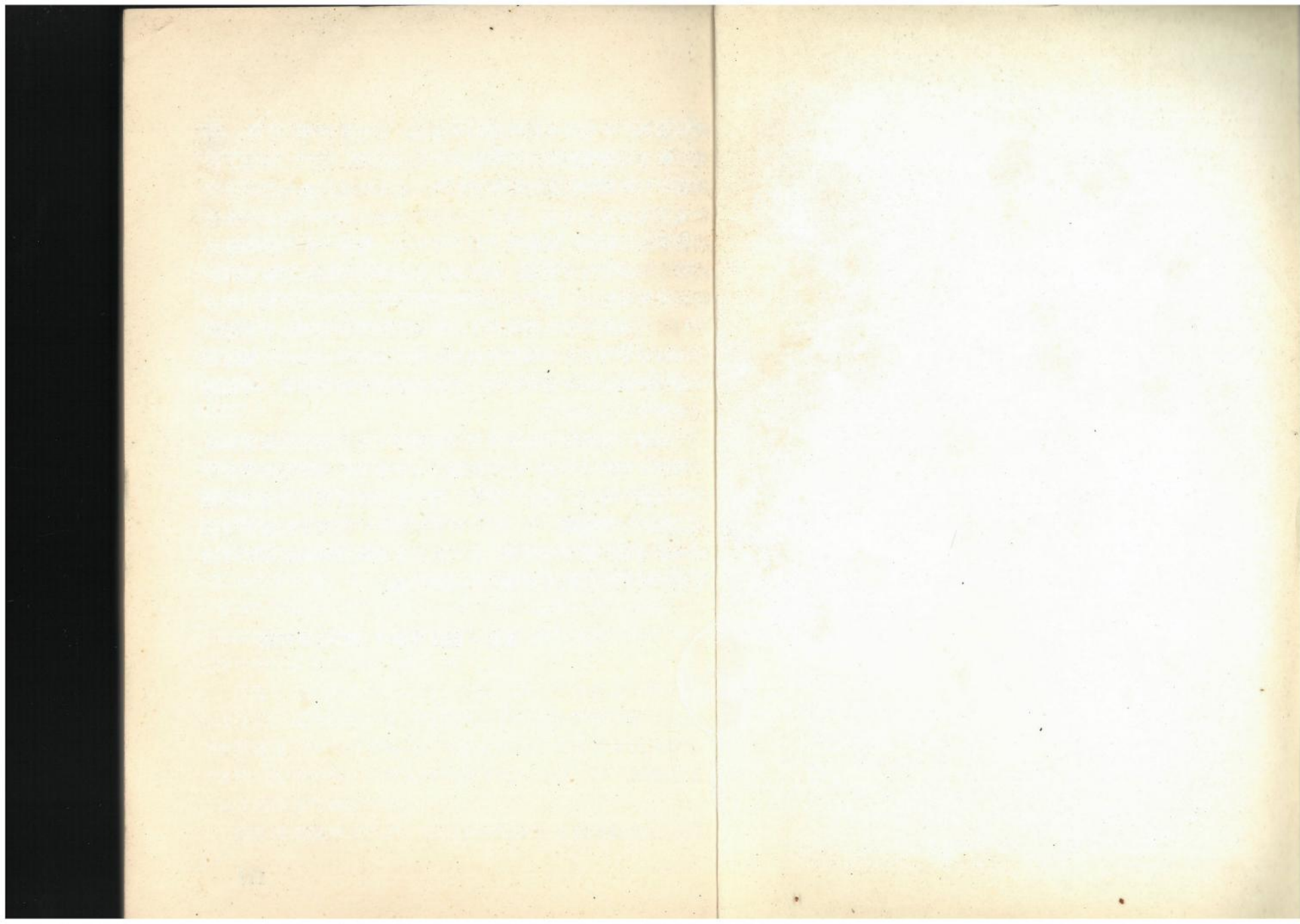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的总干事，作为刑法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高教授近年来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协调和刑法研究会的组织建设，为我国刑法研究与国家中心任务和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全面与深入进展，作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高教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法学要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在立足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面向世界，研究、参考与借鉴别国的法学成果和法制经验。因此，他除了在其教学和科研中注意比较研究以外，近年来还注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他在1983年至1986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期间，就建立了本系与美国、香港一些大学法律系的学术和学者交流关系。近年来，他曾作为中国法学教育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作为中国法学家代表团成员访问英国，作为中国著名刑法学者应邀出席了由国际刑法学会等国际学术组织于1987年5月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性刑法学术讨论会。他还接待过许多国家和香港来访问、讲学的法律专家和学者，与他们交流法学与法律情况。

目前，高教授正在着手研究《刑法》颁行以来我国法律对《刑法》的修改补充，打算把原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修订，续上“发展”篇；他正在带领教研室集体完成二百万字的国家“七、五”科研项目《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多卷本的研究与写作；他正在注意我国关于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研究工作的开展和人才培养问题。

摘自《浙江法学》1987年第五期



封面题字：姜东舒

封面设计：王元良

168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地方国营浙江玉环印刷厂印刷